

FROM 从 **书籍史**
HISTORY OF THE BOOK

戴联斌
——
著

到 **阅读史**

TO HISTORY OF READING:

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OF READ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 戴联斌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33-2474-8

I. ①从… II. ①戴… III. ①图书史—研究—世界②阅读—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G256.1②G25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8693号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戴联斌 著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5

字数：218千字

版次：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474-8

定价：4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目录

| | |
|---------------|-----|
| 致谢 | 001 |
| 则例 | 003 |
| 序言（安·布莱尔） | 005 |
| 引言 | 009 |
| 脱困第一 | 022 |
| 论人第二 | 029 |
| 说史第三 | 041 |
| 划界第四 | 051 |
| 设问第五 | 066 |
| 立规第六 | 074 |
| 取材第七 | 092 |
| 琢玉第八 | 115 |
| 著说第九 | 136 |
| 赘语 | 163 |
| 参考文献 | 170 |
|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 189 |
| 索引 | 205 |

图版及示意图

- 图 0-1: 书籍的三要素及核心 (见第 12 页)
- 图 0-2: 让·博丹《天地法则》拉丁文原版书影 (1596) (见第 20 页)
- 图 1-1: 查禁与阅读自由 (1820) (见第 24 页)
- 图 3-1: 印刷术与英国文艺复兴 (1741) (见第 44 页)
- 图 4-1: 书籍史是历史学、目录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 (见第 52 页)
- 图 4-2: 书籍的传播循环 (见第 53 页)
- 图 4-3: 书与社会经济环境 (见第 57 页)
- 图 5-1: 书轮 (Daudet 绘刻) (见第 68 页)
- 图 5-2: 书轮 (王徵摹绘) (见第 69 页)
- 图 6-1: 卷子装和册子本 (见第 77 页)
- 图 6-2: 美国公理会差会达科塔教团报告 (见第 87 页)
- 图 7-1: 华兹华斯私人藏书目录 (见第 96 页)
- 图 7-2: 法国贵族夜读《圣经》图 (见第 101 页)
- 图 7-3: 洛克《书钞新法》(1706) 书影 (见第 104 页)
- 图 7-4: 汉考克书钞手稿 (见第 105 页)
- 图 7-5: 鲍斯韦尔《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传》(1807) 皮奥兹太太批本 (见第 107 页)
- 图 7-6: 十八世纪英国乡村读书会 (见第 111 页)
- 图 8-1: 《哲学家》扉页 (见第 118 页)
- 图 8-2: 《哲学家》插图 (见第 119 页)
- 图 8-3: 贺兰勋爵家藏书室 (见第 131 页)
- 图 9-1: 妇人伴书慵睡图 (见第 140 页)
- 图 9-2: 连写抄手卷 (见第 144 页)
- 图 9-3: 福克斯《殉道录》(见第 147 页)
- 图 9-4: 谷腾堡印本《圣经》书影 (见第 152 页)
- 图 9-5: 十九世纪英国的阅读公众 (见第 159 页)

致谢

这本小书，起初并没有照着一本书的模样写，不过是一份很长的读书报告，目的不外总结一下自己对欧美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研究，尤其是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研究的认识，以为日后的参考。读者最初也只有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师和魏希德 (Hilde De Weerd) 师两人。他们当时督导我的学业，不得不读这一百多页的文字，虽然不希望我在别人的园子里泡得太久，还是很乐意见到从外面耘获的收成。但我的决意把它变成一本小书，还是受了朋友的启诱，而且自己也许了诺，于是就有了动力，持续改写了几年。

从一份专业报告到一本书，从英文到中文，从为我的教授写到为非专业的朋友讲解，这中间需要做很多改动。读书报告本来是有系统的；在写这本书时，我调整了原来的结构体系，又细分了章节。更多的改写则涉及知识背景和行文风格。欧洲的历史以及形形色色的相关理论，对许多中文读者或许比较陌生，我在改写时尽量加一些简短的介绍。至于行文，彻底改变枯燥的学术写作风格，尽可能使用口语，力求清晰、简洁，就像冬夜与朋友站在厨房闲聊时讲到专业问题一样。

原来的读书报告，是在 2008 年夏天完成的，但我接触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是在 2004 年，当时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求学，英文系的韦熙 (Mark Vessy) 教授带我入门。后来随卜正民师转到牛津，我仍然关注这个新兴的领域。牛津丰富的藏书满足了我的阅读需求，我特别感谢波德林 (Bodleian) 图书馆、历史学部 (History Faculty) 图

书馆和泰勒研究所 (Taylor Institute) 图书馆。史恺悌 (Catherine Swatek) 师，还有张海灏 (Desmond H. Cheung) 博士和张德伟博士都浏览过报告，给我鼓励。

全书中文初稿在哈佛改定。我在这里开设中国书籍史讨论课，学生很少，但他们的问题很多——我很感谢。为了推动讨论，我重新思考相关的理论问题，包括“书籍”和“书籍史”的界定，其中一些在读书报告里谈过，我觉得有不足，就回头做了修订和补充。哈佛的安·布莱尔 (Ann Blair) 教授、普林斯顿的安东尼·格拉夫敦 (Anthony Grafton) 教授，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和我讨论过关于书籍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对我多有启发。

读书报告是在泰晤士河边的一间小公寓里完成的，两个月后儿子出生。真正动笔用我的母语写这本书，是在盐泉岛 (Salt Spring Island)，时间当在 2011 年 12 月，不久女儿出生。如今书稿完成了，却是一人羁留在查尔斯河边。米盐寝席，雨丝风片，谗论私语，苦泪怡情，都见证了这本小书，也都糅进了这本小书。床头的微笑，桌边的细语，温软的手，光润的脸，姗姗的步，铭心刻骨，溶在血肉里，从离岸小岛，到菲莎河谷，从悠长的海堤，到迷眼的草甸，从多雨的温哥华，到寒冷的波士顿，随我一路走来，陪我挨过困窘和孤寒。身无长物；这本小书，得益于心中这阳光的滋养，也是献给这阳光的礼物。

戴联斌

2014 年 4 月记于麻省水镇

本书出版，得到了刘丽华、陈卓、孙志鹏、李建安和汪欣的支持。舍弟联海代为办理琐事。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亨廷顿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都灵大学图书馆、巴黎工艺美术博物馆和美国公理会差会授权使用书中书影和图像。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这本小书不会面世。

2016 年 10 月补记于埃德蒙顿

则例

注释。这本小书文献来源多。为节约篇幅，注释尽量简化，仅首列作者或编者名，空一格，列出版年份，逗号后为征引页码。所有注释置于页下。相邻引文如出处相同，则尽量汇成一条注释，标出所有页码；如按一个页码没有检索到引文出处，请查看所列其他页码。

书目。所附参考书目，均以外文原文录写，以免翻译反生歧误。首列作者或编者名，次出版年份，次书名，末具出版地及出版者；或作者名，次发表年份，次篇名，次掲載学报，末具起讫页码；或作者名，次出版年份，次篇名，次收录书名，次编者，次起讫页码，末具出版地及出版者。此“作者一年份”格式与注释所用相应，便于对照查找。

译名。本书人名、术语众多，正文中尽量使用相应译文，仅人名、术语首次出现时附注外文原文，余则从略，以求行文流畅整齐。书末附列“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使用汉语拼音排序，读者可轻易检索并找到原文参酌。

个别译名，本人觉得旧译或有歧义，遂斗胆重译，比如，popular culture 通常译为“通俗文化”，本书则称之为“时俗文化”，以避免将文化区别与社会分层简单对应，并强调其历史特征；reception 一词，文学批评界多译成“接受”，本书借用日语“受容”(じゅよう)，以强调读者的主动性，且字面比前者更具表现力。又 appropriate 一词，迄今未见通行译法，暂译为“拈借”。

杂项。书中提到欧美很多历史人名和理论流派，尽量简短介绍，但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今互联网发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轻易搜索到相关信息，不必浪费纸墨，徒溢书价。

序言

安·布莱尔 (Ann Blair)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书籍史发端于欧洲早期近代史研究，由此上溯下及，遂蔚为大观。为此学科之建立而贡献卓著的历史学家，都曾钟情于十五世纪中期欧洲印刷术的发展及其影响，费弗尔 (Lucien Febvre, 1878-1956) 和马丁 (Henri-Jean Martin, 1924-2007) 在 1958 年出版《印刷书的诞生》 (*L'apparition du livre*)，1979-1980 年艾森斯坦 (Elizabeth Eisenstein) 和丹顿 (Robert Darnton) 先后出版了他们的书籍史研究专著。在英语文学研究中，至为精细的分析目录学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研究一直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中心，譬如查尔顿·辛曼 (Charlton Hinman) 就曾逐页对比现存五十部初版对开本莎士比亚戏剧，以追究印刷中勘误正讹的方法。^① 但书籍史研讨的问题，涉及文本的生产、流播、受容和存佚，涵括各种媒介、各种形制、各种语言文字、各种文体，以及复杂的历史背景。近几十年来，书籍史研究涉足的历史时段和地理范围都有很大的扩展，这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于特定时段和地方书籍史特色的认识，也增益了我们对屡见于不同历史传统的诸多书籍史基本问题的理解。比如，关于印刷的本质和历史，所有研究都强调印刷术的传播有不同的历史节奏，取决于诸多的文化、经济和技术因素。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大的分支，正趋勃兴，但也特别具有挑战性。东亚书籍史中阅读

^①Charlton Hinman, *The Prin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史研究的进步，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东亚诸文化传统的了解，也增加了与其他文化传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在西方，研究阅读有文学批评和历史审视两种取径，戴联斌对此作了详瞻沈达的梳理。他首先追述次第出现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新批评（New Criticism）、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和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这些批评理论，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关注真实读者（real reader），与作者（author）脑海中的理想读者不同；也越来越重视文学文本多重多变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正是不同读者创立的，他们把自己的关怀和背景带进了文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学家首次审视近代早期欧洲留传下来的廉价印刷品，试图描述当时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自此便出现了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阅读行为。历史学家往往采用别样的史料，来质疑早先的历史阐释，并细检不同社会背景下的阅读行为——诸如女性和工人的阅读行为，初学者和学成者的阅读行为，上起古代，下至二十一世纪。最近的研究还指出，书籍除了阅读，还有其他的使用方式。^① 由于学科性质不一样，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研究阅读，使用的工具和探讨的问题也不同，但他们在许多大型研究项目中互相合作，很有一些成果，譬如“阅读经验数据库”（the Reading Experience Database），收罗了许多星散、孤立的史料，缀合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阅读行为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阅读行为总是飘渺恍惚的，因为它终究是一种内在体验，其完整的影响可能稍纵即逝，即便最有自我意识的读者也把握不及；另外，大多数阅读行为并无文字记载，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无从分析。即便在批注书籍并不罕见的文艺复兴时代，英格兰流传至今的本子中大约也只有百分之五十有批注（并且有些批注还不一定是阅读书中文本时留下的）。^② 批注在内容厚重的书籍中最常见，而印制低廉、昙花一现却曾广为流传的各色文本是很少有批注的。独立成册的阅读笔记也有存世，它们在某些方面与中

^① Leah Price, *How to Do Things with Books in Victorian Brit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William H. Sherman, *Used books: 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国传统的笔记类似。戴联斌特别关注西方阅读史家使用的各种史料，包括藏书书目、销售书目、描绘读者和阅读行为的绘画和小说，以及读书法。每一种材料都需要仔细阐释。举个例子，戴联斌指出，关于读书法的小册子，既可以用来证明当时当地倡行的读书方法，也能反证这些方法并没有人遵从，因为郑重其事地提倡一种行为，正好说明另有不同的行为正大行其道。在阅读史研究中，一个特别的挑战就是搜寻史料，以回答谁读、读什么、什么时候、在哪儿，特别是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问题。戴联斌特别关注史料，因为这也是研究中国阅读史的一大难题。有些史料是阅读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比如边批（*marginalia*）和阅读札记；另外还有书信、文学社档案、表现阅读的图像和小说，以及关于理想藏书的文字论述、读书指南（*reading instruction*），等等。目录学和各种各样的书目则有点似是而非，很难与以上史料类型相提并论。在欧洲近代早期，有些书单只代表理想化的藏书，或是对现实藏书的讥诮；另外一些则是出于实际需要，以便追录旧藏，或在故主死后标识其藏书价值几何。^①

西方的阅读史研究，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活色生香的花边，也有一些新的创见，但坚实的理论概括还是少数，因为从多样的个人体验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模式，还是很艰难的。欧洲中世纪出现了从朗读（*reading aloud*）到默读（*silent reading*）的变化，近代早期则有从精读到泛览的转变，但在描述这样的发展时必须有所修正，须牢记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有多种阅读模式和类型共同存在，同一个个体读者，即便有自己的阅读习惯，也是根据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识字率随时地不同差别很大。瑞典在1700年以前已经没有了文盲，因为宗教规定，年轻人要想结婚，就得识字；而俄罗斯直到十九世纪，识字率还一直不到百分之十；到了近代，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呈现的总体特征，是城镇识字率高于乡村，男人识字率高于女人。阅读史的贡献，可能不在于社会学统计，而在于精细地分析（一）具体读者如何赋予文本以意义，（二）共同的文化实践，比如机构、群（人）际合作以及其他人类组织形式如何赋予文本以意义。当今数字媒体使用着

^① François Géral, *Figu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ans l'imaginaire espagnol du siècle d'or* (Paris: Champion, 1999).

新的技术，促生了新的社交方式，这些都在悄然改变阅读经验，我们也都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同样地，历史上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变革也不断地影响阅读行为，包括图书馆书籍陈列、居室中家具陈设的变化，甚至照明和交通方式也影响了阅读行为——电力的发明和火车旅行的出现，就与阅读速度的提高特别相关。阅读仍然是许许多多文化活动的核心，不管是宗教活动还是艺术活动；也是信息采集的核心，不管是新闻还是各种实用手册；更是研习各门智力学科的核心。寻求认识阅读行为在不同历史时间和地点如何演变，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史上诸多人类经验以及文化交流的认识。戴联斌这样梳理西方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启发更多的中国研究专家循着类似的思路投入阅读史研究。

(戴联斌 译)

引言

这本小书不是研究西方阅读史，而是探讨西方阅读史研究的学科基础和发展状况，它的理论和方法，中心问题是为什么阅读史能在欧美成为一个学术领域，有哪些成果吸引了来自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的众多学者。理论假设和学科规范是本书要讨论的重点，这不仅是回答中心问题的需要，也是为了宏观地把握阅读史研究的基本规则，希望不仅对中国书籍史和阅读史学者有所启发，也能吸引专业外的读者。互联网时代，电子媒体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印本书籍（printed book）和其他纸媒体严重衰退，传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以及相关的政治和法律规范也面临极大挑战。这些变革，不仅会改变社会生活，也会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更会挑战自有书籍以来形成的人与文本、人与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模式，进而重塑人、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阅读对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而历史考察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分支。历史上的读者都已经不在人世，阅读又是一个认知和心理过程，后人很难模拟和重建。除了少数精英人物，普通读者留下的阅读记录极其稀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阅读史的理论基础还非常薄弱，现有理论框架、概念和范畴，大抵是从文学批评理论，具体讲就是读者反应批评理论（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借用的。文学批评理论往往罔顾历史环境，生搬硬套标榜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闹“关公战秦琼”的笑话。阅读史家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

如何调和文学批评理论和史学研究规范。研究历史上的阅读行为，首先就得设法摆脱游移在文学和史学之间的困境，这是本书最初的动因。

研究阅读史，当然得知道什么是读者，什么是阅读，但首先得了解什么是书籍，什么是书籍史。这是我们在引言里要谈论的内容。说到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目录学当然首屈一指。倘若追溯目录学的起源，人类对书籍的认识可谓源远流长，但书籍史成为一门学科，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为“国际书籍年”（International Book Year）；1979-1980年是现代书籍史研究的起始，先是艾森斯坦出版两卷本《印刷术与近代欧洲的文化变革》（*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讨论印刷对近代欧洲文化的影响，随后丹顿出版《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追溯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百科全书》的出版史。^①1980年6月，来自英国、法国、西德和美国的学者在波士顿开了一次研讨会，主题就是历史上的书籍与社会。这些人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书籍史对研究社会史极其基本，号召学者、图书馆专家和相关机构支持书籍史研究。^②1981年，美国分析目录学家谭瑟尔（G. Thomas Tanselle）发表专文《书籍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The History of Books as a Field of Study: A Paper*）；^③1982年，研究近代法国文化史的丹顿发表《何谓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不同学科和学术传统关于书籍史学科的争论呈现在世人面前。1986年，丹顿发表《阅读史初阶》（*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提出阅读史研究模式，指出读者反应批评是阅读史的理论支撑。^④争论在所难免，因为各个学科和学术传统对书籍、书籍史、读者和阅读行为都有不同的界定和假设。这本小书不打算参与这些理论争论，只是摆摆不同的观点。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对

① Eisenstein 1980; Darnton 1979.

② Tanselle 1998, 41.

③ Tanselle 1981; 后收入 Tanselle 1998, 41-55.

④ Darnton 1990, 107-135, 154-187. 本文原揭载于 *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23 (1986):5-30.

书籍、书籍史、读者和阅读行为有初步的理论认识，因为它们是本书结构和观点的基础。

书籍的要素

什么是书籍？每个以书籍和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不同的定义。做文学批评的人认为，书籍就是写就的文本，有特定的文体特征，与其他文本互相影响，互相联系。批评家的看家本领，就是字斟句酌地阅读要评论的文本，并借用一些理论对其加以阐释。目录学家只是把书籍当作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他们寻找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证据，以解释各种版本的特征，试图解决文本的真伪和权威性问题的，偶尔也会考察一下针对该文本的阅读过程。历史学家则把书籍看成文化的产物，其制作、流传和使用都隐约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变迁。至于什么是书籍史，更是众说纷纭。在实践中，书籍史专家都会自定义书籍和书籍史，以免引发歧义。

《牛津英语大词典》对 book 一词的解释，涵括了书籍的文本特征和物质特性，很典型。根据这部词典，写就或印刷的文字篇章，不管是附着在纸张上还是其他物体上，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物质形态的整体，这就是书籍。广义地讲，在任何时代和国家，书籍都可以理解为写在任何物体上的文字篇章，这些物体可以是羊皮或其他皮革，可以是莎草纸，可以是棉丝片，可以是丝帛，还可以是棕榈叶、树皮、竹简木牍，甚至象牙、石板和金属。把它们连缀起来的方式也各种各样，比如说，连成长卷，或者干脆做成散页或活页，或者把这些散页用线穿在一起，也可以缝在一起或粘在一起。这部权威词典还说，只要是采用这类方法做成的物体，就叫书籍；不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即便里面什么字都没有，全是空白页，也是书籍（无字书其实是个很后现代的观念）。书籍也可以单指作成的文字篇章，不论长短，也不管它附着的物体是什么。

文本和承载文本的物质形态，是书籍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分别是文本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和传统目录学关注的对象。这是由来已久的认识。

因为有了文本和物质形态，书籍才变得可触可感，才实实在在可以使用。但书获得存在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得以实现，却是读者的功劳，书籍的所有意义都是在阅读和使用过程中生成的（有些书籍不是为阅读而制作的，而是有其他的使用方式，但大多数书籍都是为了阅读而出现。为行文简便，本书只用“阅读”一词，但并不否认其他使用方式的意义）。没有读者和阅读行为，书籍的物质形态和承载的文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书籍的生命包含三要素，书籍是三要素的统一体：文本、物质形态、阅读。文本和物质形态是为了传达意义，阅读是为了生成和获取意义，因此意义是这三要素的共同目标，是这三要素互相作用的产物，是它把这三要素联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书籍（见图0-1）。在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的三角中，意义毫无疑问处于中心地位。作者写作、出版商决定出版、印刷商承担制作，抽象的文本有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就是为了更好地传达意义；读者也想着从成串的文字符号中抽绎出意义。书籍的终极目标就是生成意义，为了这个共同目标，作者、设计师、印刷商、书商、读者纷纷参与书籍的生命史，参与一本书从诞生到死亡的各个环节。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书籍就是历史上具有物质形态的人工制品，它承载符号或文本，为了流通而制作，供读者从中寻求符号或文本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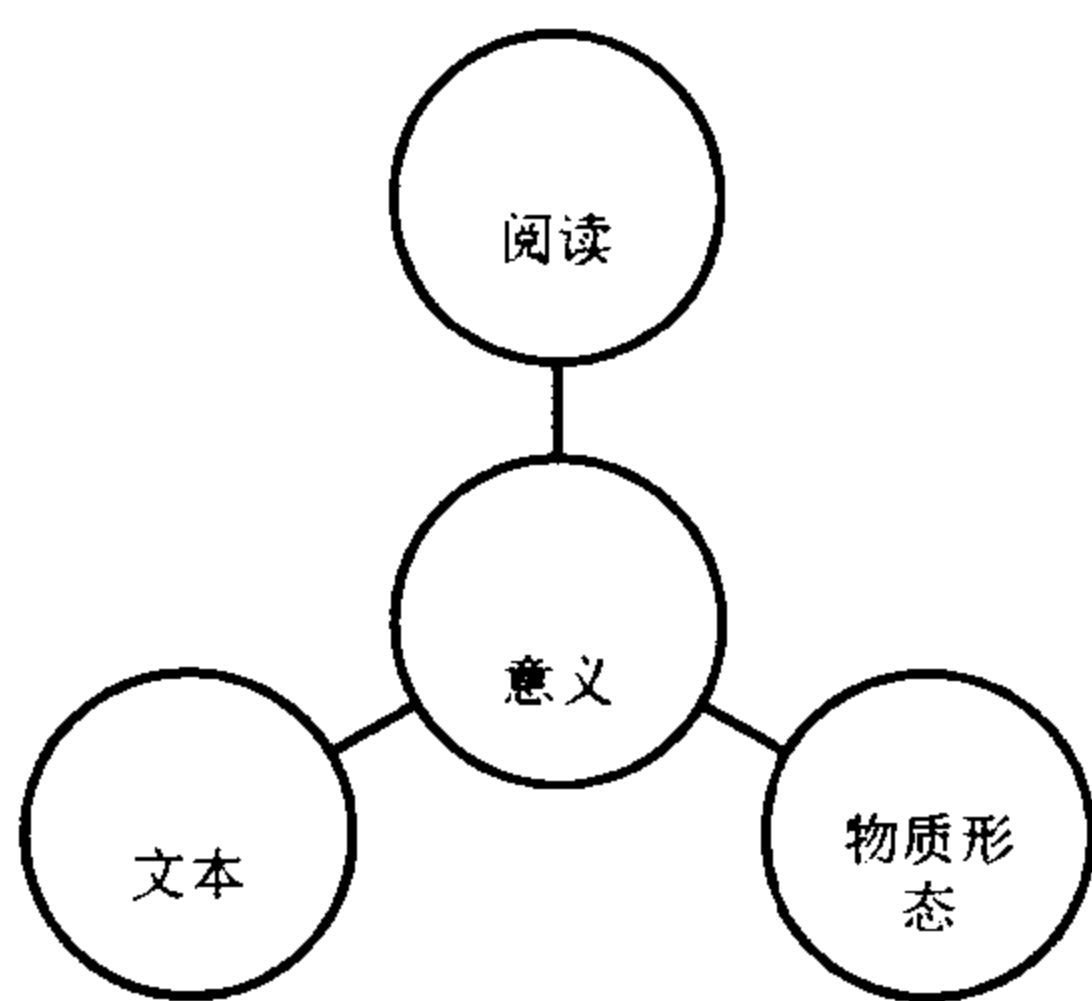


图0-1：书籍的三要素及核心

文本、物质形态、阅读是书籍的三要素，意义居中心地位。

书籍史界定

专门研究书籍的学科，首推目录学。欧洲和中国都有很悠久的目录学传统。欧洲的目录学，至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编就的希腊文著作目录。^① 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一般都认为是刘向（公元前79-8）。不管是哪一种传统，编制目录都要求开列书名，并按一定的规则排序，方法也都不外两种：一是把书籍当作物质实体，一是把书籍当作信息载体（也就是文本载体），但这两种检查和描述书籍的方法，都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

欧洲人关于书籍的历史认识，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先是关注抄本，后来又增加了印本，欧洲古典文献研究和《圣经》研究也相应地向人文主义转变，奠定了近代欧洲学术的基础。十九世纪末，分析目录学在英国兴起，二十世纪终于成为英美目录学的正宗。分析目录学把书籍看作物质实体，把书籍生产过程遗留的物质证据用于解释文本传播过程的特质，目录学研究得以具备现代史学的特征。因此，分析目录学理论是书籍史的基础理论之一。

法国年鉴学派把书籍史研究从目录学引向社会史和文化史。1958年，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出版《印刷书的诞生》，专论1450-1800年印本书籍的历史。^② 这是第一部欧洲新书籍史，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基于抄本学和印刷史的书籍史研究。两人的研究，是年鉴学派在书籍史领域的代表，焦点是谷腾堡印刷术对近代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假设主导了后来的书籍史研究。比如，艾森斯坦就试图证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印刷术的产物，而不是促进了谷腾堡印刷术的产生和推广。^③ 在年鉴学派的学者看来，书籍是推动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动力，也是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播思想，改变人的观念乃至社会。这个假设，也直接影响了书籍史的学科界定和任务，代表人物是丹顿，他提出的“传播循环”（communication

^① Blum 1991.

^② Febvre and Martin 1958.

^③ Eisenstein 1980.

circuit) 模式成了书籍史研究的主流, 尽管有目录学家对此颇有微词。

根据丹顿的传播循环模式, 书籍史就是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印刷术的传播功能, 目的是认识思想观念如何借助印刷得到传播, 印刷又是如何影响人类思想和行为, 研究对象自然是十五世纪中期谷腾堡改革印刷术以来的印本书籍。这完全契合费弗尔和马丁两人的主旨。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目录学的局限。他们的兴趣不在善本, 也不关心一本书籍的生产制作过程, 而是书籍生产和消费的模式, 不管这模式是普遍的, 还是特殊的。他们研究的书籍都是普通书籍, 设定的读者也都是普通读者。在他的传播循环模式中, 丹顿强调的是参与书籍制作、传播过程的人以及人厕身其中的社会, 而不是书籍本身, 这似乎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弄丢了。他还忽略了一个事实——书籍在谷腾堡之前就已存在, 印本是书籍, 历史更悠久的抄本也是书籍。他强调书籍对社会的影响, 却忘记了社会也会规范书籍生产和流通。

年鉴学派这样关注书籍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 却忽视文本价值和书籍的物质形态。这让目录学家, 特别是英美传统的分析目录学家, 有点不痛快, 于是提出了自己的书籍史研究模式。这种分析目录学模式, 以书籍为中心, 强调社会对书籍生产和流通的影响, 与丹顿的模式正好相反。根据这个模式, 书籍是历史环境下的物质实体, 书籍史就是研究书籍制作、出版、发行诸方面的历史, 涉及从著述到阅读到最终影响社会所有的阶段。强调书籍的物质形态在文本传播中, 与文本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是这一研究模式的特色。基于分析目录学原则, 他们认为, 书籍史不仅要研究印本, 也要把抄本和其他形式的文献纳入研究范围。

德国的书籍史研究传统, 偏重印刷技术和图书贸易, 谷腾堡的技术改造以及历史悠久的书展一直是德国人的骄傲。但德国学者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贡献, 与法国年鉴学派、英美分析目录学的史学贡献同等重要。德国的读者反应批评为阅读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概念和范畴(见第二章)。因此, 书籍史, 尤其是阅读史, 是历史学、文学批评和目录学(也可以还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产物, 本质上是跨学科研究, 参与其中的人也来自各个学科。这种跨学科性质, 自然会引起学科之间的领土争端。前面提到

的英美分析目录学家对丹顿传播循环模式的批评就是一例。此外，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也彼此不满对方的研究缺陷。但无论争论有多激烈，维护自己学科立场和学术传统的态度有多坚决，大家对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跨学科性质倒都表示认同。由于各种学科立场和学术传统共存，现在欧美的书籍史研究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目录学、历史学、文学批评争唱主角，许多新的学科也涉足其中。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状况，越发头绪纷繁；也正是这纷乱的状况，需要爬梳整理。这本小书关注阅读史研究状况、理论和方法，就是一个尝试。

基于书籍的三要素和书籍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我们不妨重新定义书籍史这个学科：书籍是历史环境下的人工制品，书籍史要历史地考察书籍的文本特征、物质形态和阅读，考察这三个要素在书籍的生命历程和社会环境中如何相互作用生成意义。这个界定，也是这本小书得以展开陈述的一个前提假设。

读者身份

阅读史首次正式界定，是在1986年，这一年丹顿发表《阅读史初阶》。此后欧美以及澳洲都出现了文章，概述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状况。这些综述，关注点和主旨不一样，但大抵罗列了新近的成果、争论的主要问题、使用的材料以及主要的观点。把这些综述贯穿起来，就是一篇阅读史研究简史。^①我们没有必要重复这些已经公诸于世的综述，而是想用这本小书，说说阅读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引发的一些争论。具体地说，就是它的学科疆界、理论假说，它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史料、方法和成就。

要讲阅读史，首先得明白阅读行为的主体，也就是读者，是什么。阅读史研究的读者，当然应该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真的接触过书

^①重要的综述有 Allan 2003; Allen 1987; Jackson 2004; Price 2004; Raven 1998; Rose 1992; Rose 1998; Rose 2007; Rubin 2003; Hall 1995; Hall, "Readers and Reading in America," in Hall 1996.

籍，读过其中的文本，并且生成了自己对文本的阐释。这当然与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里的读者不一样。读者反应批评家研究读者、阅读过程和读者对文本的反应，其实都是基于批评家自己对文本和作者的理解，而不是历史上真实读者对具有历史特征的文本作出的具有历史特征的反应。因此，读者反应批评家说的读者，都是他们想像的，或者他们认为是作者和出版者设想的。读者身份的认定，一直是阅读史研究的一个难题，也是区别阅读史与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标志。但阅读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倘或对阅读和读者感兴趣，还是共同承认一些理论假设。这些假设本都是来自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如何把它们引入阅读史研究，一直困扰着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学者，这也是本书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

历史上只有很少的读者留下文字描述自己的阅读过程。当下的文学批评家和阅读史家都会根据文本、副文本（paratext）和书籍的物质形态推断读者身份、阅读过程和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这种研究门径，本是读者反应批评家的发明，他们当然最擅长，并且有理论体系作支撑。阅读史家借来复原历史上的读者及其阅读行为，就得谨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文本特征就暗示谁会是它的读者，读者藏身在文本中，而不是独立存在于文本之外。因此，这样确认读者身份，只是基于批评家自己读到的文本，而不是基于实证史料，当然悖离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规矩。至于阅读过程和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读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最终取决于他和作者的关系、和文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作者意图和文本。而所谓副文本，都是特意设计的，在书籍制作过程中作为主文本的辅助加进书里，目的不外是为了有效地向目标读者传达作者和出版者的意图。在实际阅读行为中，是不是所有真实读者都这样认可作者和出版者设定的意图呢？当然不是了。真正的阅读行为要比理论假设复杂得多，文本和作者意图并不是决定阅读的惟一因素，读者自身的阅读技能、阅读目的、知识和社会背景，还有阅读环境，都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因此，仅仅基于文本和副文本揣测读者和阅读过程，并不符合阅读行为的逻辑。阅读史家都意识到这个理论缺陷，在选用史料、设置和解决具体问题时，各显神通，但大多以书籍的三要素为切入点，焦点仍然

是读者如何生成意义。

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只存在于作者、出版者和印刷商的头脑中，并不能代表历史上的真正读者；反之亦然。历史上的读者很难确认身份，即便如此，仍然要坚持这个任务，以有别于文学受容研究。

阅读行为

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因人而异。阅读行为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终究是集体意识的产物。读者先于文本存在，在他接触文本前就已经受文化的熏陶，他的阅读技能、阅读观念、阐释策略（interpretive strategy），无不具有鲜明的文化烙印，阅读史研究也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不再是简单缀集超强大脑和学术精英的奇闻轶事。关于阅读行为的集体属性，德国的读者反应批评家发明了很好的理论。一方面，他们强调文体与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关注人为划定的阅读公众。他们认为，阅读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现象，个体读者只是阅读公众的一份子。有了这个理论，我们才可能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的阅读行为和阅读习惯。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考察阅读行为，首先应该考察读者自身，然后检查他的阐释策略。关注的焦点也随之转移，先是读者与作者的互动，然后是读者所在社群（social community）。就这样，阅读过程赖以展开的文化或文学背景就站到了前台，文本和作者则退居幕后。读者在阐释文本时，都会遵守一些规范。这些规范是在一个阅读行为开始之前就设定了，但绝不是先验的。研究阅读史，当然不能忽视历史上阅读规范的产生过程。在读者开始读一本书之前，各种社会机构和制度已经教给他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有很多是通过阅读习得的。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经过消化和吸纳，改变并丰富学会的东西。^①

作为获取和更新知识的主要手段，历史上的阅读行为无疑是研究知

^① Goodman 1984, 80.

识史的一把新钥匙。知识社会学家，从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 1858-1917）到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都主张知识的社会或集体属性。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也都强调知识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因此，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往往把知识生产简化成一套社会行为，比如，有人说它类似经济行为，是为了夺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常用的比喻）；也有人说像政治活动，是为了争权（尼采之流就这样说）。为了更圆满地解释知识生产过程，也为了更准确地预测知识体系的变化，曼海姆开始把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结合起来。这种综合分析的趋势，在卡琳·诺尔-瑟梯纳（Karin Knorr-Cetina，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法国科学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更加明显，但关于知识生产的中心特质，他们的观点还是有些摇摆，有时受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影响，采用经济生产的模式分析；有时又倒向福柯，使用政治分析模式。^① 不管采用哪一种模式，还是双管齐下，其实都忽略了知识获取过程的内在特征，忽视了其中的自主性质。知识生产受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但其方式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所遵循的有本质区别。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分析模式，不足以解释历史上真实的个体读者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阅读经验不同，个人的知识构成也就不一样。因此，从历史上真实读者的阅读行为和阅读习惯着手，了解他们遵循的规则，就有可能突破传统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局限，更接近知识生产的微观真实过程。既然阅读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阅读规则和阐释策略当然会影响读者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过程。而阅读规则和阐释策略，正是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读者决定知识的归宿。知识借助印刷传播，其中有很多偶然性。传统观点认为，欧洲的印刷革命促成了近代科学革命。但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认为，两者不具备因果关系。印本的权威性，既不是作者给的，也不是出版者的功劳，近代欧洲的读者经常在印本中发现异文歧义，怀疑印本的可靠性。知识传播的效果，最终取决于读者如何受容知识，如何使用

^① Pels 1997.

知识。因此，印本是否正当、是否权威，最终的决定权在读者手里。^① 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的《天地法则》（*Universae naturae theatrum*, 里昂，1595）在欧洲列国的传播和受容过程，也支持约翰斯的观点。这部百科全书，本意是整理总结十六世纪的科学知识，原本为拉丁文，后来有法文译本，再后来有德文选编本，读者既有学术精英，也有村塾陋儒，不同类型的读者获取的自然哲学知识，各不相同。^② 因此，书籍史和阅读史能很明晰地显示历史上的知识传播。读者接受训练，采用特定的阅读策略，会否定、认可或者改变他读到的东西，要么把这些东西吸纳进自己的知识储备，要么排斥，弃之如敝履。外在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并不能完全左右读者的取舍。

阅读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历史上真实的读者，而不是文本和副文本暗示的读者，更不是作者和批评家想象的读者。阅读史应该研究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阅读行为，而不是设想可能发生或应该发生的阅读行为。可以从个体读者着手，但应该着眼于阅读的集体特征，着眼于读者社群共有的阐释策略。在阅读成为获取和更新知识的重要手段后，阅读规则会融入读者的血肉和气质，成为丰富读者的阐释策略和阅读期待的主要因素。

本书构成

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各有自己的假设和规范。要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可行的研究模式，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读者反应批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的演变，它和其他批评理论的关系。我们还要大致了解书籍史专家、阅读史学者，以及文学史学者采用的方法，还有阅读史研究的现状。这本小书的立场是史学，因此考察诸种批评理论时，只集中讨论那些有可能植入历史研究的假设；而述评欧美阅读史研究成就时，也只是列举相对带有普遍性和概括性的成果，尽量避免过于冷僻和特殊的个案研究。

^① Johns 1998, 30, 408, 427, esp. chap. 6.

^② Blair 1997, chap.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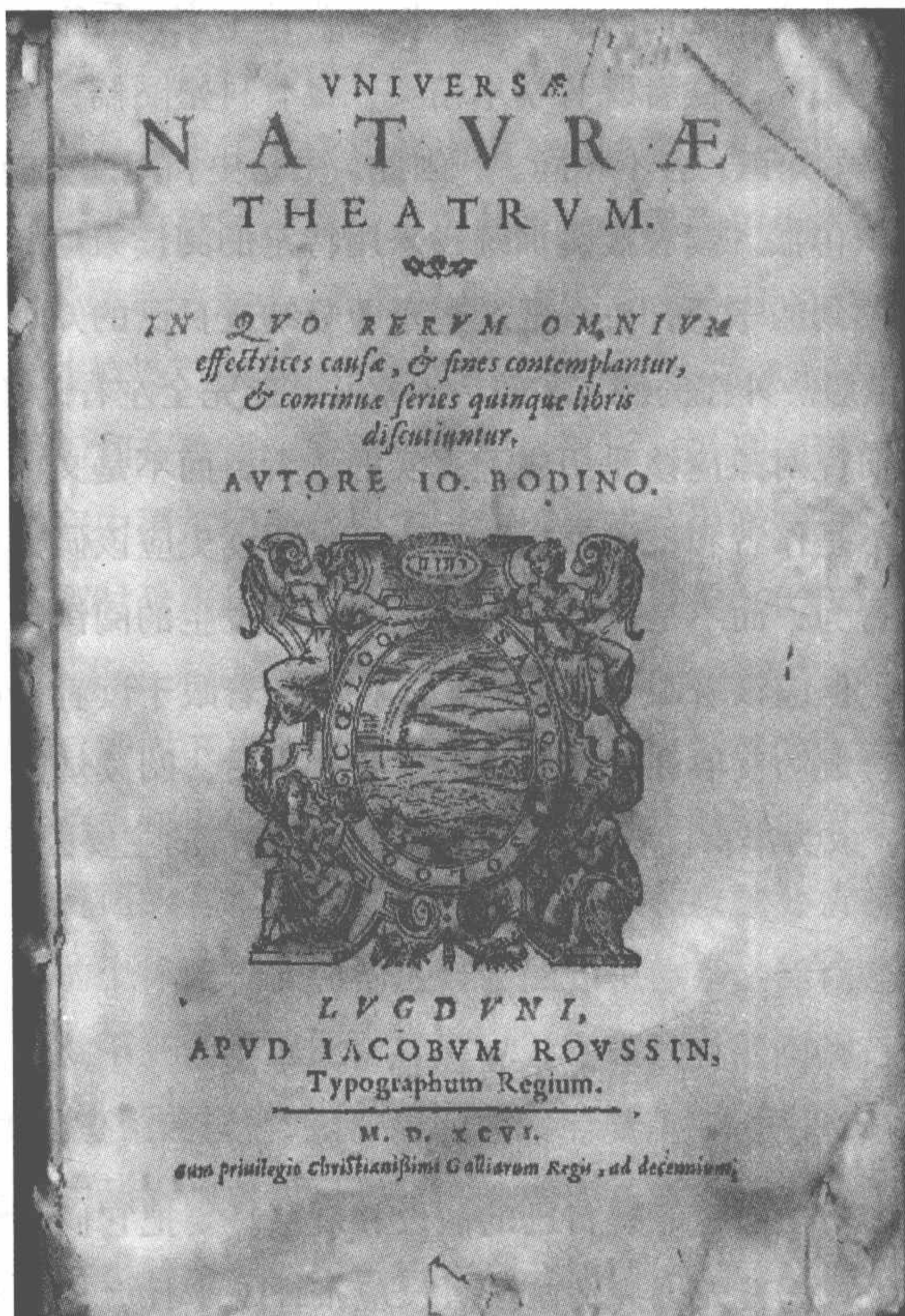


图 0-2: 让·博丹《天地法则》拉丁文原版书影（有题献）

取自 Jean Bodin, *Universae naturae theatrum in quo rerum omnium effectrices causae* (Lugduni: Iacobum Roussin, 1596)。意大利都灵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orino) 图书馆藏本。

这本小书，文献来源于英文专著或欧洲其他语种专著的英文译本。这些研究探寻的主要是大西洋两岸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阅读史和书籍史。我的视野并不拘囿于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而是试图从这些研究中寻求启发和建设性的思考。任何个案考察或多或少都蕴含一些理论原则，有助于认识过去的阅读实践。这本书的初衷，是讨论阅读史的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关注如何将文学批评和阅读史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其他具体观点和争论，例如读者的社会分层对阅读行为的影响之类，与具体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紧密关联，纷繁芜杂，很难综合辨析，因此基本没有涉及。

除引言和赘语外，本书共九章，按阅读史研究实践的逻辑展开。第一章讲阅读史家面临的理论困境，即如何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将理论范畴和概念纳入历史环境中加以改造，重新界定，赋予历史内涵。第二章讲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贡献和缺憾，在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中，读者反应批评首次赋予读者主动积极的角色，阅读成为与写作同等重要的创造性行为。第三章讲阅读史家如何改造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以适应史学规范。第四章至第八章分别讨论阅读史的学科界限、研究的问题、基本操作规范、可用史料和研究方法。第九章评述阅读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赘语除了总结前九章内容，还评述近年欧美学者对中国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重申阅读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学科界限。

脱困第一

阅读史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本质上是历史学的一个领域，但理论预设大抵是从文学批评，特别是读者反应批评或接受美学借来的。研究阅读史，原始材料很缺乏。历史上只有少部分读者留下文字记述他们的阅读经验，大部分读者的阅读行为我们都无从了解。不论是作为个人经验还是社会行为，历史上这种精神活动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历史学家基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和历史环境作考古式复原和逻辑推演，才可能再现。但是，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的学科差异，直接导致阅读史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史学出身

在欧美，最先是教育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尝试考察阅读行为对教育和人类认知过程的重要性。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采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阅读行为。此后，近代语言学及其各个分支（语音学、音系学、词法学、语法学和语用学）也都讨论读者在解读书面和印刷文字符号时采取的各种语言策略。这类研究，有时触及历史上的阅读行为和阅读方法。^①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阅读行为则以史学界最早；其他相关科学关注这个问题，则要晚二三十年。

^① 比如 Huey 1922, pt. II.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道格拉斯·华普勒斯 (Douglas Waples, 1893-1978) 借用社会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图书馆和阅读行为的社会效应，开创了一种社会知识论 (social epistemology) 的方法。华氏及其同志的研究，不再关注阅读技能，而是把图书馆和阅读行为纳入社会学的领域。当时，他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在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等人的影响下，势头正劲，俨然芝加哥学派，华氏及其学生自然也受到影响，他参与创建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也借势成了当时研究阅读行为的重镇。1940年，华氏等人出版《阅读之于人》(What Reading Does to People)，便是把阅读看成一个社会过程，作经验主义的考察，试图回答一个很大的问题——阅读对人会产生什么影响？^① 六十年代，杰克·古迪 (Jack Goody) 认为读和写这两种技能是古希腊文化成就的动力。^② 在传统悠久的欧美抄本学界，对于阅读的历史研究还局限于探讨抄本的流传和释读。随着欧洲印刷术普及，印本书籍数量大增，流传益广，其社会效应为人始料不及，结果印本阅读和文本意义成了文化史家和社会史家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③

在史学界，1910年，丹尼尔·莫讷 (Daniel Mornet, 1878-1954) 罗列了法国旧制度时期流行的一些书籍，试图分析它们在当时法国读者中间如何流传。^④ 在莫氏看来，这些颠覆性的文本广泛传阅，在很大程度上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了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起源。^⑤ 同样的方法，费弗尔也用来探寻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和异端的起源。^⑥ 莫氏和费氏的研究，是阅读史的滥觞。这时，阅读史还只是探讨法国精神生活史 (也译为心灵史，history of mentalité) 的一个门径。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同时期的英国学者对读者和阅读行为也同样有兴趣，但他们更关注阅读的对象，即抄本和印本，甚于阅读行为本身及其社会效应。他们的研究保留了英国目录学传统，甚少开掘社会史和文化史内

① Waples et al. 1940.

② Goody &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 后收入 Goody 1968, 27-68.

③ Grafton 1997, 139-140.

④ Mornet 1910.

⑤ Mornet 1926, 英文本 1969; Mornet 1933.

⑥ Febvre 1942, 英文本 1982.

TO CHECK THE CIRCULATION



OF LITTLE BOOKS,

图 1-1：查禁与阅读自由（1820）

这幅讽刺画中，拿铗链的是韦尔斯利 (Arthur Wellesley, 1769 - 1852)，举斧子的是斯图尔特 (Robert Stewart, 1789-1822)，挥匕首的是坎宁 (George Canning, 1770-1827)，三人都曾任英国首相。原刊 *The Man in the Moon* (London: 2nd edition, 1820)，威廉·洪 (William Hone) 刻印。大英图书馆藏本。

涵。^①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阅读史在英国还没有被承认是一个专门的学科。1957年，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的美国泰斗理查德·阿尔提克 (Richard Altick) 分析文本的生产和传播，力图证明大众阅读的扩展史其实是英国的民主演进史。^②这也是法国莫讷和费弗尔的思路，但阿尔提克首次明确指出，对阅读的历史研究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广阔天地。^③与之相呼应，普罗大众的文化，在当时被简单地描述为受容和消费各种信息；信息都是外来的，普罗大众在受容时，只不过抵制外界侵染和卫护自身传统的程度不尽相同。^④到了六七十年代，新的史学问题以及新的目录学文件和目录编制技术，深化了对阅读行为的历史认识。这时候，各领域的学者都认定，阅读行为本身是有历史的，从古到今变化很大，而简单地罗列一些具体的文本，并不能揭示个体读者或读者群是怎样读这些东西的。^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阅读有兴趣的历史学家，开始糅合法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年鉴学派传统、英美目录学传统，以及新兴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历史上的阅读行为。

糅合这些不同的传统和学科，可行不可行，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现身说法。他们的《印刷书的诞生》(1958; 英文本 1976)，于新书籍史可谓有筌路蓝缕之功。^⑥新书籍史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文本生产、流通、受容的方式，不像传统书籍史和目录学那样汲汲于文本的物理表征 (physical features)。考察实际的阅读行为，便是这新书籍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为欧美的同行树立了榜样，而这新书籍史在德国又融合了接受美学，在英国则又吸收了印刷史和分析目录学传统。^⑦美国学者认可新书籍史，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抵是在承绪法国年鉴学派探讨历史上普通人的精神生

①譬如 Collins 1928; Bennett 1952-1970.

② Altick 1957, 3.

③同上, 8-9.

④ Hoggart 1957.

⑤ Darnton 1971; Birn 1976.

⑥作为一个术语，“新书籍史”在欧美书籍史研究界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可。罗伯特·丹顿称费弗尔及其同行开创的书籍史研究为“新书籍史”，意在把它与十九世纪英格兰传统的书籍研究和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书籍的认识区别开来。传统的书籍史都把书籍视为物质形态的审视对象，并不开掘书里书外的历史内涵。见 Darnton 1990, 108.

⑦ Feather 1980;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1982), 见 Darnton 1990, 108-110.

活时,强调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性。此后,专攻法国文化史的大腕,譬如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罗伯特·丹顿、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等人,作为新书籍史专家,在美国影从者甚众。^①到了八十年代,书籍史和阅读史领域终于确立了两种史学传统并峙的格局,各领风骚:一是英国传统,中心问题是印刷品的权威性;^②一是法国传统,关注的是印刷如何引发文化变革。^③这种粗略的划分,当然不是地理区分,而是超越了国别,以学术兴趣为标准。

文学血缘

与费弗尔和马丁的书籍史研究同时,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一些变化,首先也发生在法国,这便是罗伯特·伊斯卡丕(Robert Escarpit)开创的文学社会学登场。^④伊斯卡丕认为,基于宏观的数理统计分析,社会学(或社会学视角)有益于解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他假定,社会环境塑造了文学,文学在各种环境下又都是可读的,因此文学社会学家要探讨作者,文学的生产、传播及消费诸环节,以及文学的商品属性。面对这些问题,文学社会学家大抵很尊重书籍史专家对于文学产品和文学实践研究做出的贡献,其中文学实践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但有的时候,有的社会学家又担心数理统计分析会抹掉文学产品的文学和意识形态特质,^⑤也质疑书籍史专家以个别的阅读经验代表同时代所有阅读实践的研究倾向。^⑥另外,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有了转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阐释学(hermeneutics)、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相继兴起,各种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应运而生。这类新的批评理论探寻

① Rubin 2003, 556.

② 比如 Altick 1957.

③ 比如 Davis 1975; Darnton 1979.

④ Escarpit 1958; 英文本 1965.

⑤ Williams 1980, 11-30.

⑥ Sutherland 1988.

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而不是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在此之前，是形式主义（formalism）和新批评（New Criticism）理论主导文学研究，强调文本自成一体，主张从文本中寻找其意义，否认文本对读者的效应与阅读环境相关。相反，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则强调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角色，因为意义只能在读者的头脑中最终实现，此外它便不能有效地存在。^①这其实是一种以受众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其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读者”、“阅读过程”和“读者反应”，相关批评和研究也是围绕这几个关键词展开。^②

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大抵与社会经济史年鉴学派的相类。这一套，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当然熟悉。相比之下，读者反应批评对于一些共同问题的理论假设，对他们更有启发。此前，书籍史专家的理论储备和研究技艺一直都很简陋，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则唤起了他们将批评理论与历史研究嫁接的冲动。丹顿便是最先试验的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之一，他主张借用文学批评家提出的读者理论。^③詹姆斯·史密斯·艾伦（James Smith Allen）则与之呼应，认为借助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文化史家和社会史家依据特定的历史背景，引用虚构的文学作品作为主要史料，也可以重构读过这些作品的普通人的精神世界。^④三年后，丹顿建议将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理论移植到阅读史研究，用来考察读者抱着什么样的动机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文本互动。这样的嫁接，理论上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正如丹顿说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能够揭示对于文本的潜在反应会有哪些，而历史研究则能描述有哪些阅读实际上发生过。^⑤

实际操作起来则困难重重。文学批评不注重历史属性，也鲜有实证的兴趣。因此，并非所有的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都喜欢从文学同行那里借用一些理论框架；有些史家则干脆撇开理论，只讨论一些可以通过实证来检视的问题，对文学理论提出但无法完全回答的疑难，则弃置不顾。^⑥这种差

① Tompkins 1980, ix, 223.

② Tompkins 1980, ix-xxvi;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3-45.

③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1982), 见 Darnton 1990, 131-132.

④ Allen 1983.

⑤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1986), 见 Darnton 1990, 181-182.

⑥ 比如 Lyons 1999, 51; Sherman 1995, 55-59; Brayman Hackel 2005, 9.

异，部分是因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视角各色各样。有的学者关注历史上对于阅读的态度变迁，以及寻常阅读行为的演进，他们就会极其倚赖大量的阅读经验和实证材料；有的学者的兴趣在于特定的文本对历史上真实读者有何影响，以及读者阐释和使用这个文本的特定方式，他们往往强调独特的阅读体验，也就不可能对读者反应批评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要分析文本，读者反应批评是最有用的；而微观地分析阅读行为，文本分析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鉴于能够发现的材料有限，关注个体阅读（individual reading）案例，不可避免地要和讨论普遍的阅读习惯彼此扞牾。^①

阅读行为有个体差异，阅读群体又表现出共同特色，里面的道道很复杂。想对各种文化中的阅读习惯作一番理论说明，现在还不现实，但把个体阅读体验或某种阅读行为与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对于揭示文本对受众的影响，至关重要。^②而揭示文本对受众的影响，正是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目的，正如文学批评旨在挖掘文本意义一样，其中的难点在于如何把历史研究和非历史的文学批评融合起来，以探讨阅读习惯，这是很多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需要直面的问题。

① Gerrard 1998, 53-54.

② Jackson 2004.

论人第二

读者反应批评，本是为了反对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理论。新批评理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主导着英美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文学（通常以诗歌为例）的生产和消费与外在的社会环境没有关系；一个文本，永远自成一体，永远独立，而它蕴含的意义确定、有限。新批评家关注的，不是诗歌的效应，而是诗歌的本质，忽略读者在文本展示和阐释过程中的作用。有些极端的新批评家，甚至坚信诗歌本身既不“言志”，也不是什么工具，它自身就已臻至善至美，任何读者反应对诗歌本身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只强调文学作品在形式和语义学上的独特性，文本阐释就成了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的批评家的一份特权，他们似乎是可以专享“文学科学家”这一称号的。

新批评理论把读者排除在文本阐释过程之外，终于成了读者反应批评攻击的靶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读者反应批评初露端倪，后来有人誉之为“读者归来”。^①但读者反应批评家常常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饱受讥评，所以八十年代有了“回归历史”的呼声，相关批评理论基于实证材料作了修正，读者反应批评也藉由书籍史和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重出江湖。^②

① Freund 2003 (1987).

② Machor 1993.

这一章讲“读者归来”。^①

六种方法

作为一个术语，“读者反应批评”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是泛指关注读者、阅读过程及读者反应的文学批评家所作的研究。^②苏雷曼(Susan Suleiman)曾对这些研究作过一个概述，提炼出六个变种(或曰方法)：修辞(rhetoric)类；符号学(semiotics)和结构主义类；现象学(phenomenology)类；主观主义和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类；社会学和历史学类；阐释学类。这些变种或方法，都不是纯净如处子，彼此也不一定排斥。

修辞类的方法，将文学文本视为一种传播形式，一种信息，作者编码，读者解码。采用这种方法作文学批评，其目的是考察作者如何传达他的意思或制造特定的效应；其理论假定是，能否成功地解读一个文本，取决于读者是否认同作者的价值观和信仰。主张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的人，则考察文本与文化或文学背景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一部作品的作者和读者共有的规则和习惯，判定作品的可读性；规则和习惯不同，对既定文本的阐释也就不同。修辞类、结构主义类的方法，都关注文本、作者，及其产生的环境，而现象学的方法，则以与阅读有关的诸问题为中心，尤其关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结合。这里的读者是抽象的、被普遍化了的个体；他与文本的结合，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存在。阅读就是一个生成意义的过程，而文本中的不确定因子导致解读千变万化。主观主义的批评其实就是心理分析批评，考察特定个体读者真实的阅读经验和他对特定作品的实际反应。在主观主义批评家看来，阅读就是个体读者接触一个文本并予以阐释的一种私人经验，与读者自己的性格、生活经历以及文本意义紧密相关。社会学

^① Tompkins 1980,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这两部读者反应批评论文集，对综合认识六七十年代的理论状况很有帮助。其中收录的一些文章，我在读到这两部论文集之前也翻阅过。这部分评述，有些引文出自这两部论文集；有些引文，即便这两部集子收录，为行文方便，也采用我以前参考的本子。

^② Tompkins 1980, ix;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6.

和历史学的方法，则把阅读当作一种集体现象。借助这种方法，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考察特定的阅读群体与特定作品或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以不同方式关注作品与阅读群体关系中特定方面的学者，还有信奉接受美学的德国批评家，都属于这一派。阐释学的方法，则关注阅读、阐释的性质和多种可能性。传统与现代阐释学的分野，在于用不同方式检查文本的形而上学地位、写作和阅读主体。传统阐释学的目标，是基于写定的文本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阐释，而现代阐释学则消解文本的权威、写作主体的独特性以及认识过程的形而上学特质，质疑找到普遍有效阐释的可能性。^①

上述各种批评理论，方法各异，使用的术语也不相同，其理论假设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差异，甚至彼此冲突，但把它们结合起来还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它们讨论的是一些共同问题的不同方面，都与读者—文本关系有关。^② 对这些理论，我觉得，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不应该划地为牢，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方法和理论，因为我们考察这些文学理论的初衷和目的，终究不是为了研究文学作品，而是为了研究阅读史。当然，在“拿来”之前，我们应该对上述方法中的术语界定和理论假设有个大致的了解。

读者其人

在发明一些工具和方法分析读者反应之前，批评家先得知道什么叫读者。读者反应批评中的读者概念，大抵脱胎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③ 因此读者是基于文本想象出来的，而不是文本之外真实的人。文本是这种读者观念的基石，实证材料在此并不重要。读者在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作用，自然会在他与作者、叙述者（narrator），或他与文本的关系中界定。

沃克尔·吉布森（Walker Gibson）就是这样一位批评家。他提出“模

^①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6–45.

^② 同上, 6.

^③ Tompkins 1980, xi.

拟读者”（mock reader）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理论维持的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边界。他说的模拟读者，当然是虚拟的；为了体验文学作品的语言，现实中的个体读者应该装扮成模拟读者，主动采纳文本语言要求他采纳的那一套态度，具备文本语言要求他具备的品质。给这些虚拟读者说故事的人，是虚拟的叙述者，在作品中是单纯由语言构成的，并非作者本人。叙述者与模拟读者之间的对话，略加概括总结，就可发现作者如何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他期望读者受容或拒绝什么观念。^① 吉布森的模拟读者概念，凸显了阅读体验的价值，并预示了读者反应批评随后发展的方向，即关注的焦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②

吉布森设定叙述者与模拟读者之间的关系，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也有类似的假设，他勾画了叙述者与受述者（narratee）之间的关系。普氏把文本可以对话的读者分为三种：真实读者（real reader），他们手里把着书；虚拟读者（virtual reader），作者就是为他们创作了文本；理想读者（ideal reader），他们能完全理解文本，并印证文本意义的任何变化。普氏对读者的分类，似乎偏离了他的受述者的概念。他说的受述者，就是叙事作品或明或晦地预设的对象，和吉布森的模拟读者一样，也附属于文本。^③ 他认定的真实读者如何接触和阐释文本，仍然不清楚，这是新批评时代就出现的问题。^④

韦恩·布斯（Wayne Booth）把理想读者称为隐含读者。隐含读者是作品的衍生物，是文本预设的读者，是阐释作品的理想人物。布斯的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相对，又与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相应。这个隐含作者，其实就是真实作者的第二个自我，是以特定立场、方式或者面貌来创作作品的真实作者。为了完美地理解作品，真实读者应该扮成隐含读者，认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和信仰（这同时也是隐含读者的），其结果最终决定整个作品的意义。这样的认同，是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之间协商达成的，而真

① Gibson 1950, 265, 266, 267-268.

② Tompkins 1980, xi.

③ Princ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arratee," 出处同上, 7-25.

④ Tompkins 1980, xii-xiii.

实读者在阅读行为中又首肯这一协商。^① 在布斯的理论中，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都是模子，用来阐释文本，因此必然都是虚构的。^② 其隐含读者的概念，后来被沃尔夫冈·艾瑟尔（Wolfgang Iser）借用。两人的区别在于，艾瑟尔把阅读描述为一种将文本与隐含读者结合以寻求意义的活动，而布斯则界定为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协商达成一致的过程。在艾瑟尔看来，隐含读者不是具体可感的，也不是历史的，而是超越了历史，他的阅读行为是亘古不变的，没有时空的差别。^③

布斯假设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达成一致，顺理推论，就会认为对一部特定作品的阐释是普遍的、永恒的。这样的推论，现在人们都知道是错误的。为了解释解读为什么千差万别，苏雷曼提出了“嵌入式读者”（inscribed reader）的概念。这样的读者，连同其他因素，决定了文本的可读性；就文本阐释而言，它并不占什么特殊的地位。苏雷曼的这一概念，是基于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受述者理论。在热奈特的理论中，受述者是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直接倾诉的对象。^④ 这个对象是臆想出来的，是一个观念中的人物，只在文本中才会存在。事实上，有些叙事作品是戏中有戏，故事之中套故事，这样就出现了叙事层次，主叙事作品当然是第一层次。苏雷曼认为第一层次的受述者就是嵌入式读者。^⑤ 在此意义上，嵌入式读者也是臆想的产物，观念的产物。

并不是所有的读者反应批评家都喜欢虚设一部作品的读者，忽视解读纸上文字获取意义的真实读者。艾瑟尔意识到阅读过程和读者反应的历史特征，便修正了他先前的隐含读者理论，区分出两类读者：与文本同时的读者（他称之为参与者 participant）、后世的读者（他称为观察者 observer）。对于前者，文本揭露了当代主导思想体系或规范体系的缺陷；而于后者，文本能再造彼时彼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而正是这环境产生文本本身关注的问题。因此，前一种读者会在文本中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不

① Booth 1983.

②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11.

③ Iser 1974.

④ Genette 1972, 265-267.

⑤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13-16.

曾看到的東西，而後一種讀者會抓住他從未曾耳聞目睹的東西。^①艾瑟爾對讀者做了歷史區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發現了考察真實讀者的新方法。他的劃分過於簡單，對每一類讀者反應的描述也只是邏輯推理，很抽象，和描述隱含讀者的反應差不多。^②

讀者反應批評所謂的讀者，是基於作者意圖和文本虛構的。這樣的讀者，對歷史學家來說，很難用實證的方法來證實。真實讀者在歷史上當然存在，大多數作者在寫作時腦海中也都想着普林斯所謂的虛擬讀者，但讀者反應批評家更關注他們臆造的讀者，甚於歷史上的真實讀者。閱讀史家在參考隱含讀者及其對文本的解讀時，還需要將批評家自己的解讀與隱含讀者的區別開來——其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家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解讀強加給他說的隱含讀者。幸運的是，大多數書籍史和閱讀史專家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見本章稍後）。艾瑟爾把當代讀者和後世讀者在理論上區分開來，有可能启发其他批評家基於歷史差異對隱含讀者作歷史的考察和描述。即便如此，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這就是怎樣才能利用歷史和實證材料，而不是僅僅借助理論假設，來證明隱含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有着怎樣的精神世界——這聽上去就有違歷史研究的常識：一個不曾真實存在的東西，怎麼可能用實證材料去證實和考察呢？

閱讀過程

上述關於讀者的理論假設，通常會被演繹為分析的工具。讀者反應批評認定是讀者和閱讀過程賦予文本以意義，因此把閱讀作為一種行為來考察。這種行為，首先是讀者自身的行為，其次是闡釋策略的體現和應用，批評家的焦點也隨之轉移到讀者社群，而不再是個體讀者與作者的互動。

^① Iser 1978, 78–79.

^②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25–26.

与此同时，阅读环境，不管是文化环境还是文学环境，只要影响了阅读过程，都会吸引批评家注意，而文本和作者（有时甚至包括读者）都不再是关注的焦点。阅读过程终究是文本意义得以产生的过程，因此我们还得谈谈关于阅读过程的种种理论假设。

在阅读过程本身被赋予文学价值之前，批评家一直认定读者是被动的。读者能成功解读某一文本，得益于他认同隐含读者的角色，而隐含读者又完全认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和信仰。这就是说，读者需要顺从作者的意图——修辞派的批评家就是这样认为的。^①有些批评家则认为，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阅读行为和文本都是文学价值的来源。艾瑟尔是最早提出这种理论的批评家之一。根据他的现象学理论，读者和作者一齐创造了作品，构建作者没有形诸文字但确实寄寓其中的真意。阅读行为本质上就是寻求文本意义的一个活动。在此过程中，读者选择、组合、期待、回顾、规范、修正他在文本中读取的东西。阅读行为随着读者的个体差异，随着阅读环境的变化而千差万别，这又导致对文本的解读五花八门。为了从理论上描述阅读的这个精神过程（也就是个体读者与某一文本的关系），艾瑟尔又提出文本不确定性（textual indeterminacy）理论，即所有文本都包含不确定的因子，艾氏自己称之为“留白”（gap）。读者的行为是创造性的，就是因为他总是想方设法填补这些空白，以找到一个规范性的意义，并把文本转变成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说实现该文本的文学价值）。^②虽然说文学文本是开放的，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但读者填补的空白，是作者在文本中没有设置规范的部分。这就是说，读者的行为最终还是受文本的约束，都是作者预先设定好的，而读者的行为之所以千人千面，只是因为文本是不可穷尽的。^③在此意义上，艾瑟尔理论中的读者是主动的，但不独立自主，批评家只是用这样的假设来揭示文本中隐晦的意义。^④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比艾瑟尔更关注阅读行为本身，他主要

^① Booth 1983 (1961); Booth 1974; Suleiman and Wimmers 1980, 7-11; George Poulet, "Critic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teriority," 见 Tompkins 1980.

^② Iser 1972, 284-288.

^③ 同上, 285.

^④ Tompkins 1980, xv.

讨论读者逐字逐句和文本对话时，如何从语句中对文本作出反应。这种反应被费什称为“事件”，这是文本的意义所在。费什的批评技巧是将阅读体验延时放大，其中的事件就可以分析审视了。平时人们都不会注意这些事件，但它们在阅读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依照费什的理论，读者主动参与创造文本意义，文本意义和文学本身也随之都得重新界定。作为一个事件，意义是在字句和读者意识之间产生的，不是字句的简单组合演绎，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体验。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一定是因为读者在意识中展开了他体验意义的过程。艾瑟尔的隐含读者填补文本中的空白；费什理论中的读者则不一样：他们是所有意义的源头，因为决定文本有没有意义的，是读者的意识，不是印刷的书页，也不是一本书封面和封底之间所有篇幅。^① 费什的研究，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读者反应批评的焦点从文学文本转移到读者的认识活动。^② 但费什理论中的读者，终究也不是自由自在地创造文本意义，其语言背景形成的一套规则最终还是约束他们。费希说，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遵循同一套规则，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地把这些规则融进自己的心灵，这样的话，他们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趋于一致。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解是基于这些人共有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约束读者对文本作出反应，也划定了反应的范围，甚至规定了方向。换言之，这些规则使得读者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因为它们符合一定的规范。^③

如果意义确实像费什假定的那样是阅读过程中的一种体验，那读者又是怎样获取意义的呢？费什试图从读者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来寻找答案，而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则提出了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的假设。这些文学能力，其实就是阅读文学文本需要遵循的一套规范。卡勒认为，读者的语言能力是理解字句的能力，而文学能力，也就是内化的文学规则，要复杂一些，是读者将语言次序转化为文学结构和意义的的能力。因此，文学的意义，不是源于读者与文本、作者的融合，而是制度化和内化规则的产物。但是，卡勒的目的，不是检查读者在解读文

① Fish 1970, 126–127, 128, 134.

② Tompkins 1980, xvii.

③ Fish 1970, 141.

学作品时如何应用这些规则，而是要弄清楚文学效应赖以产生的潜在体系。他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真实读者的行为，而是理想读者为了阅读和阐释作品必须默认的规则。理想读者阅读和阐释的方式应当为世所容，与文学制度相一致。^① 阐释文本时遵循的原则不是读者创造的，而是制度和体系教给他的。

借助卡勒关于阅读规则制度化和内化的理论，文学批评家得以大大地扩展他们考察的读者范围。以前受阅读影响的人，作为读者反应批评的焦点，只是一些个体的读者，这时则成了一群，他们有相同的文学语境，因为任何规则都不会是个体的决定，而一定是一种群体现象。这正是费什的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理论要说明的问题。根据费什的说法，这阐释社群只是暂时稳定，随着个体读者在这里进进出出，社群也相应地扩大和缩小。^② 所有符号体系都是社会的产物，个体只是或多或少把它们融进自己的意识，因此，个体的感知和判断，只是他所在社群共有观念作用的结果。前面说过，费什把文学的意义界定为一种体验；读者和文本对话，便产生了文学的意义，它不是在读者体验文本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尽管文本的特性也会影响读者的体验。^③ 他的阐释社群是由拥有相同阐释策略的读者组成的，而阐释策略又生成意义。但费什一再强调，这些共有的阐释策略，最初不是为了（在传统的意义上）阅读文本，而是为了写作文本，是为了构建文本的特性，表现文本的意图。换句话说，这些阐释策略先于阅读行为存在，因此它们决定要阅读的东西如何形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首先决定读什么、怎么读。^④ 费什进一步解释说，阐释策略孕育了阅读的模式，也正因为孕育了阅读的模式，它又赋予文本以特性，它创造了文本，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源自文本。读者体会到文本不同，不是因为文本的形式结构，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同的阐释策略在起作用，生成了不同的形式结构。费什相信，自己的这个理论模式，既能解释解读的稳定性，也能说明其多

① Culler 2002 (1975), 137, 132, 144.

② Fish 1976b, 484.

③ Fish 1970.

④ Fish 1976b, 483.

样性。^① 根据他的理论，文本的形式特征、作者的意图、读者的阐释策略，彼此关联依赖，共同生成文学的意义。^② 这个观点，与大多数读者反应批评家的主张大异其趣，他们中很多人都曾试图把读者反应与文本分离开来，把文本阐释与被阐释的文本割裂开来，^③ 但费什提醒我们，甩开文本和作者侈谈读者反应，是不可能的。

卡勒认为，是制度教会了读者去阅读。同样，费什也声称，阐释策略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世的，而是读者后天习得的。^④ 读者必须获得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在费什看来，这解释了阐释社群的不稳定性）。我们可以推论，制度教会了读者阐释策略，但这种阐释策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怎么规范写作和阅读？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了“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s）理论。所谓期待视域，即一部作品的读者怀持的一套文化、伦理和文学期待，在此基础上，读者创造、受容作品。^⑤ 根据姚斯的理论，为了阐释一个文本，读者会牢固地持守一些主观的模式、范式、信仰和价值观，这些东西都来自他们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必然有局限性。姚斯认为，读者有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歪曲或误解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因为读者解读总是与作者意图有差距，理论上不存在歪曲和误解之类的问题。事实上，偏见还有正面的建设性的影响，会确立读者的主观视域。^⑥ 重建期待视域，有助于我们发现文本最初要回答的问题，进而揭示历史上的读者如何看待和理解作品，这样就突出了过去和现在理解文本的方式在阐释学上的差异，消解了文学永恒且意义客观这样一种传统观念。每部作品都有其活生生的、受历史和社会拘囿的受众，每个作者都倚赖读者的背景、观念和意识形态而存在，而文学作品要成功，就要符合读者的期待。只有读者的文学期待成为他生活期待的一部分，形成他对世界的解读，

① Fish 1976b, 481-482, 484.

② 亦见 Fish 1976a.

③ Tompkins 1980, xxii-xxiii.

④ Fish 1976b, 484.

⑤ Jauss 1970, 18.

⑥ Jauss 2001.

进而影响他的社会行为，文学的社会功能才得以实现。^①

姚斯的期待视域理论，容许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的受容史。采纳他的理论，我们可以借助史学寻觅作者的生活踪迹，考察对其作品的理解经历的变化及赖以发生的历史条件。理解有变化，便是因为读者的期待视域发生了变化。姚斯的这个理论，也有助于解释同期出现的作品，为什么有的风行一时，有的很快被遗忘，而有的又很超前。这些现象都和读者的期待视域有关。在某个时期内，一部作品如何迎合、悖离或逆料阅读大众的期待视域，决定了它在读者眼中的命运。^②

文学批评潮流从新批评到读者反应批评，这一演变的哲学基础，沃尔特·本·麦克斯（Walter Benn Michaels）作了论证。麦氏认定，形式主义批评家总是惦记着保留文本的客观性，其哲学根本在于美国历史悠久的实用主义害怕主观，害怕个体阐释中的自我。如果不存在什么确定的意义，阐释者就可以随心所欲，想把文本说成什么就说成什么。人们自由自在地把他们自己的主观阐释强加给任何文本，这样的立场，简直就是惟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是对文学批评的粗劣模仿和滥用，更坏的是纵容了一种无孔不入、破坏性极强的道德怀疑论。在麦氏看来，这种实用主义的恐惧，实在是杞人忧天；事实上，阐释者的自我是由共同的认知和判断标准构成的，并受它们制约。所有读者都逃不出价值体系的手掌心，所有的陈述都有价值取向。^③在这个意义上，考察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我们知道读者的认知和判断标准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的话。

以上关于读者和阅读过程的几种理论，视野从个体延伸到社会，从个人能力扩展到制度体系。念念不忘将文学和文学批评政治化的批评家，对这样的理论当然是一见倾心。^④对研究书籍史和阅读史的人来说，这不仅是个机会，更是个挑战：要把非历史的、纯理论性的假说加以史学改造，需

① Jauss 1970, 18-19, 15-16, 31.

② 同上, 19n.29, 29; Tompkins 1980, 36-37.

③ Michaels, "The Interpreter's Self," 见 Tompkins 1980, 185-200.

④ 同上, xxv.

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已经触及关于阅读机制的一些理论，其中，卡勒的文学能力并不是指真实读者借助其文学观念阅读文本，而是指理想读者为了阅读一个文学文本必须事先知道的东西。费什提出阐释策略理论，本不是为了考察阅读，而是为了讨论写作，它决定了阅读的形态，进而形成了文本的形式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拥有共同阐释策略的阐释社群由什么人组成，这是很难确定的，费什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因为惟一能找到的证据，只有一个解读，并且还是过去的解读。^① 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或明说或暗示，都不是读者和阅读，而是作者和写作；不是史学，而是文学和美学。卡勒和费什的理论，都没有考虑阅读的历史特征。这些理论本质上都是工具，提出来是为了揭示文学意义，而不是从社会层面描述历史上的阅读行为。

史学的方法，要求我们承认阅读行为是变动不居的。就这一点而言，期待视域这样的理论大抵能够用来综括历时的变化。研究作品的受容史，有一个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期待，但是，正如姚斯自己承认的，对于文学的期待，与对于生活的期待大不相同，因为前一种期待不仅保存了真实的文学体验，而且预示了未能实现的可能性，并藉助新的愿望、要求和目标以开阔社会行为的范围，进而打通未来阅读体验的通道。^② 姚斯只关注期待的美学层面，他没有从史学的角度提出考察期待视域的方法。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期待视域理论，连同卡勒的制度化文学规则假说和费什的阐释策略理论，对于研究阅读史和书籍史没有一丝的启发。他们到底是提出了问题，我们可以思考这些问题，从史学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答案。事实上，有些学者已经这样做了——这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回归历史”。

① Fish 1976b, 485.

② Jauss 1970, 33.

说史第三

读者反应批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当时也有人意识到这些理论在史学和实证方面有很大的缺陷。比如，艾瑟尔就承认，阅读过程在历史上是变化的，时代不同，阅读过程也不一样。^① 姚斯的期待视域理论认为，各种阅读期待是历史地形成的，受美学文本规范，又受文本作者改造。期待视域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出现了了不起的文本。否定熟悉的阅读体验，或者培育新的体验以达到有意识的层次，都会引发期待视域的变化。^② 关于社会秩序的观念似乎不可变易，但美学体验能产生新的期待，丰富社会秩序的内涵。^③ 在姚斯的理论中，文学文本的意义源自读者建设性的行为，源自创作的历史环境，以及读者的阅读模式、范式、信仰和价值观。

姚斯的理论，后来有人发扬光大，用来检查不同读者的视域差异。有人把这类批评归类，总称为现代受容研究（modern reception study）。^④ 不过大体说来，在批评实践中，读者反应批评，不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强调读者反应中的美学层面，甚过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经济和物质因素对受容的影响。他们中间没有人成功地描述过隐含读者、阐释策略、期待视域的历史变化。这意味着他们形形色色的理论假设，根本没有回答现实生活中谁读以及怎么读之类的问题。批评家只是把自己当作理想读者，把

① Iser 1974, xii.

② Jauss 1982, 25.

③ Jauss 2001.

④ Machor and Goldstein 2001, xi.

他对文本的解读强辩为真实读者的解读。

读者反应批评，也没有考察历史环境如何影响读者和阅读行为。八十年代兴起的书籍史和新历史主义，则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书籍史和新历史主义都强调社会和物质因素在文本生产和消费中发挥的作用。两者都被视为读者研究（study of readership）和阅读研究转向历史研究的标志。^① 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书籍史把书视作一个物理实体，把阅读视为一种社会行为。对于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来说，读者与书本的关系，就是指过去的读者如何使用阅读材料，就像他们如何使用商品和手工艺品一样。但人们如何阅读，文本又如何根据语义学（semantics）的原则把自己的意义传达给具有历史特征的特定受众，目前学界认识得还不够深入。^② 新历史主义学者参照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试图认识历史上的文本生产和文本阐释等物质实践。他们的理论关怀，着眼点是文学批评，但与书籍史和阅读史学者关心的问题有不少重叠。新历史主义在欧美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有不少奉行者，但这一章只评述新历史主义在阅读史研究中的运用，看看它如何让读者研究和阅读研究“回归历史”。

亦文亦史

在书籍史和阅读史领域，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后现代受容研究。关于文本，它假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在传播中彼此交织，密不可分。它强调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同时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意图矫正新批评和解构主义采用的纯形式和纯语言的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重新建立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联系，打破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传统壁垒；这种壁垒，以前的文学批评，披上史学的外衣，都会默认其存在。和读者反应批评一样，新历史主义也不是一个文本阐释理论体系，而是一套关于文本

① Machor 1993, ix.

② 同上, x.

与历史关系的理论假设，往往参考文学文本，试图从史学掌故和人类学故事复原文学文本的历史生产过程。它的思想渊源可谓十段锦，很复杂。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从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 到福柯的法国哲学，都对新历史主义有所贡献。^① 尤其受福柯哲学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关注文本生产和流传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生态，核心问题是权力及其在文本生产、传播和受容中的分配。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列述其哲学基础和理论流变，只描述其作为方法论对阅读史研究的启示，并评估一下受新历史主义启发，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有没有可能在阅读史领域跨学科对话。

新历史主义这个词，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的发明。格氏是研究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专家，其学术兴趣主要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和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史如何互相印证，研究的课题包括英国伊丽莎白时代 (1558-1603) 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如何与文化生产互动。受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的启发，格氏及其同志特别想弄清楚文学作品如何与当时的权力关系牵连在一起。他们说的文学作品，不是反映什么一成不变的世界观——这是次要的，而是社会共同连续创造、意义不断更新的文本。毫不奇怪，新历史主义也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关注颠覆性的观念或异见最终如何受权力关系支配这样一个过程。^②

格林布拉特提出新历史主义，本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与旧历史主义划清界限。他批评旧历史主义不能充分与历史对话。他的新历史主义也是为了与形式主义的新批评区别开来。格氏批评旧历史主义时说：

早期的历史主义往往是自说自话；也就是说，它致力于发现一个单一的政治图景；这个政治图景通常又据说是整个文学界乃至所有的人都认可的……这样的政治图景，虽然偶尔也被认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聚合而成的，但最常见的假设是它具有内在一致性，永恒不变，有着和历史事实一样的地位。人们不认为它是历史学家阐释的结果，更不会把它看作是

^① Pieters 2001, 198-249.

^② 如 Greenblatt 1987, chap. 2, "Invisible Bullets".

新学类人研研类人研
且 类类类
类



图 3-1：印刷术与英国文艺复兴

十六世纪中期，印刷术已经在英格兰广泛应用，无疑为英国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技术支持。这幅画表现的就是印本书籍促进了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传播。画幅右边描绘的是英格兰的一个印刷铺，使用活字，有排字、上版、着墨、干燥、印刷等工序。原刊 *The Universal Penman* (London: 1735-1741)，乔治·毕克汉 (George Bickham, 卒于 1758 年) 刻。此处所引或为 1743 年印本，大英图书馆藏本。

代表某个社会群体的特定利益而与其他群体相冲突。不需要阐释，也不和其他利益相冲突，超越了偶然性，这个政治图景就可以充当一个稳定的参考点，文学批评可以放心参照。^①

根据格氏的新历史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不再是一套不可刊改、独立于其他表达形式、意义确定不变的文本，也不是固定反映单一的历史事实。^② 这就是说，他的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上文学文本、文学形式以及文学意义的多样性。

格氏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是他的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理论。新批评假设诗歌（以及其他文学文本）是自足的整体；格氏提出新历史主义，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假设。格氏认为，诗歌毫无疑问应该被看成诗歌，但这远远不够：社会历史环境孕育诗歌的方式，以及诗歌获取意义的方式，比诗歌本身更重要。格氏的文化诗学理论，旨在揭橥文本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认为文本不仅记录了孕育和构建历史和社会的力量，而且在社会进程中被烙上了鲜明的印记，既标识了个体身份，也代表了社会历史环境。^③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文化诗学探讨社会如何将文学文本呈现给人，以及社会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呈现人。这便是文本的历史性。因此，格氏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更有文化意味和人类学色彩的批评理论，理应成为文学批评的目标，少讨论风俗和制度的力量，多关注社会成员应用于个人体验的阐释结构。与此个人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它自己也就是一种阐释，带有某种意图，文学只是建构特定文化的符号体系的一部分。^④ 这便是历史的文本性。

举个例子。格林布拉特曾经分析过自我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十五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文化权力中的角色，当时自我或是融入文化权力，或是为文化权力消灭。格氏的方法，有意忽略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

① Greenblatt 1982, 5.

② 同上, 6.

③ “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 见 Greenblatt 1990, 146.

④ Greenblatt 1980, 6, 3-5.

而牢牢地基于他关于文本意义的假设，即在某一文化中文本的意义是多重多样的，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为了更有效地运用他的批评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认识一个文学文本，格氏认为在方法论上应该警惕三个单一化倾向。他认为，文学文本在文化体系内发挥功用，有三种互相关联的方式：（1）它展示了作者自己的一次具体行为（即写作）；（2）它表现了规范这次具体行为的诸多规则；（3）它同时也在思考这些规则。文学作品的这三个功用是一直存在的。如果局限于作者自己的行为，解读就会简化为传记；如果局限于社会规则和指令，解读就有沦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危险；如果局限于对主导规则的孤立反思，解读就会阻碍我们领会艺术对于个人和制度的功用。很显然，格氏的解读方法，偏重文本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直接体现为作者个人的写作行为，但也是诸多社会规则作用于作者写作行为的结果，是作者与这些规则之间的对话。“读其书，知其人”固然重要，知其人何以成其人，其文何以成其文，其书何以成其书，对于认识历史上一个文学文本的生产和阐释，均不可或缺，不可偏废。避开这三个单一化倾向，格氏将传统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等而视之，兴趣和着力点都在于阐释背景材料，比如传记资料、源作品（source work）、文化和历史事件、行为方式、习俗，以及个人活动，尽管他声称也关注艺术表现作为特别的人类行为具有的内涵。^①

在考察伊利莎白一世（1533-1603）和詹姆斯六世（1566-1625）治下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时，格林布拉特仍然运用自己的文化诗学理论，集中讨论社会如何构建文学。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管个人的创造才能和私欲如何给它们打上明显的印记，都是集体协商和交流的产物。他认为，经典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强制力量（compelling force），这种力量超越了文化背景，也明显地超越了历史的偶然性。这样一种自足独立的存在和跨越历史的生命力，当然不是脱离偶然性而产生的（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涵括了偶然性。一部作品，孕育于文化观念和社会实践，并参与其中，因此会蕴含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体现阅读体验的力量和深度，从而为生

^① Greenblatt 1980, 3-5.

命提供价值和意义，这对构建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也很有必要。社会能量是在文化协商和交流的过程中聚集的，主要表现为作品中的某些语词，不管是口头的还是视觉的，都能够开创、塑造、组织对于书籍的集体体验，身体的和精神的体验。^① 社会能量在所有领域（zone）流动（比如，过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领域），每当一个领域中的社会能量和其他领域中的建立联系，它们之间就会有一些临时的排列组合，或曰协商。其协商有三种机制：曰拈借（appropriation），曰购买（purchase），曰象征性获取（symbolic acquisition），与商品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流通一样。

格林布拉特提出文化诗学、强制力量和社会能量这些概念，本是为了探讨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的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这些概念只是代表格氏对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理论阐释，并非真的就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一部分。^② 学者有志于对文学文本作史学审察，自然会从新历史主义获益匪浅，但这种理论，最初也只是被看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理论革命（也就是读者反应批评）的一次重要流变。^③ 新历史主义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对于“历史”和“历史主义”等术语的界定和使用，对专业历史学者来说，似乎不得要领。他们强调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偶然性，其历史叙事呈现为碎片，缺乏历史学应有的宏大叙事。他们总是抓住一点花边、佚事就小题大做，把文本关于历史的记述与历史学家关于文本的评述割裂开来。在他们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互为因果、前后连续的事实和事件的缀合，而是历史记述、规则和关于这些记述和规则的观念的演化史。这终究偏离了传统的史学观。^④ 但这并不是说，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史之间的学科对话在阅读史领域就不要做了。

作为格氏的理论核心，文化诗学其实从柯利福德·季尔兹（Clifford Geertz）的理论演化来的，^⑤ 简而言之，就是人本身是文化的产物。^⑥ 人的行

① Greenblatt 1987, vii, 3, 5, 6.

② Veenstra 1995.

③ Howard 1986, 19.

④ 比如 Ross 1990, 487-492; Lehan 1990, 535.

⑤ Geertz 1973.

⑥ Greenblatt 1980, 3.

为、事件、各色产品，都是文化的产物，都可以置于一定的背景下予以阐释。人的生活和文学文本都有人工的痕迹，这共同的特性不仅使得它们彼此连接，而且将它们与个体行为、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对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阐释，都有彼此呼应、互相支持的潜力。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可以参考文学文本，因为文学文本具有历史属性；而文学学者在阐释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时，也可以涵括非文学文本，因为历史本身具有文本属性。

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真做起来还是很难。在研究阅读史的人看来，新历史主义者连刨带挖地从文本中找出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这种研究路子，还是有些形式主义，有些新批评的痕迹。格林布拉特试图把文学文本内含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受众联系起来，认为文本一经吸收，就创造了读者，他更强调这创造的方式。^①专业的历史学家嘲笑新历史主义者缺乏历史的深度，而新历史主义者则指责旧历史主义的方法过时、保守。彼此都看不上眼。这种僵持的局面，提醒我们在突破既定的学科界限时，要遵循一些规则。约翰·本德（John Bender）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

[新历史主义的研究]需要坚守三个立场：第一，要有积极主动的理论意识，包括一定的自我反省意识；第二，要广泛地使用原始材料，包括文学类的和非文学类的，采用这两个领域的分析方法，同时尽量减少将背景和前台对立起来的老式方法的影响；第三，反复阅读经典作品，或者尚未被视为经典的作品，以重新界定经典，这些文本都与文化密切相关，而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审美对象。^②

这三个立场，都很有想象力，也很谨慎，对文学文本有兴趣的历史学家和关注非文学文本的文学专家，都会觉得这些建议很有意味。研究阅读史的人运用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关键还得看在研究中如何阐释和使用文学文本。就阅读史而言，新历史主义认为，具有历史特征的文学文本，如果记述了阅读材料和阅读行为，或与之相关，就可以用来考察历史上真

^① Greenblatt 1980, 100-104, 119-120; Machor 1993, ix-x.

^② Bender 1992, 4.

实的阅读习惯；而具有文本特性的史料，反而需要更多的考察。这就是说，研究阅读史的人，照理应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利用，在非文学类文本中用得了解读文学文本的技巧。事实上，研究阅读史的新历史主义者，对于重构阅读行为赖以发生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有很多的贡献，^①对于考察文学、文学品味和阅读行为在政治文化中的作用也很有功劳。^②他们的研究，使得阅读史呈现新的面貌。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见第八章）。

互有短长

新历史主义当然跨出了丹顿在《阅读史初阶》一文中划定的研究疆界（见第四章）。^③研究文本受容，各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理论都维护阅读的历史特性，反对纯粹的形式主义方法。和读者反应批评相比，新历史主义并不是以读者为中心，而是以文本为中心，尽管有些新历史主义研究也关注历史上的受众。另外，读者反应批评有个预设，认为经典文本能促成人的解放，打碎自然、宗教和社会的桎梏，强调文学的道德启蒙效应；而新历史主义和其他的后现代理论则关注社会史和政治文化内涵，以及阐释社群，不管这些内涵来自传统经典文本，还是来自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文学和文化。^④新历史主义鼓励我们把研究投向更广阔的视野，藉以在社会、文化、经济 and 历史的脉络中考察文本的流变和受容，而不是把文本与读者的互动看作简单、静态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看，研究阅读史，对读者反应批评和新历史主义都不应该忽视。读者反应批评忽略了历史因素，这是一大缺憾。历史学家在对阅读行为作历史调查时，如果应用文学能力、阐释社群、阐释策略和读者期待视域等假说，必须将它们置于历史脉络中，基于获得的实证材料，描述这些因素历时的和共时的变化。新历史主义假定，文学文

① Jardine and Grafton 1990.

② Sharpe 2000a; Sharpe and Zwicker 2003.

③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1986], 见 Darnton 1990, 154–187.

④ Machor and Goldstein 2001, xiv.

本的意义，不是单由文本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环境产生的；意义是所有文化产物的集体结晶，里面杂糅了所有社会和个人因素。除了文学文本意义的复杂性，新历史主义还警示研究阅读史的人士：受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影响，阅读文学文本也具有复杂性和偶然性。并非所有的阅读行为，都遵从阐释策略或读者期待视域。它也认为用非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文本是可能的，反之亦然。

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怎样才能把读者反应批评的一些概念放到历史脉络中考察呢？怎样利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考察纷繁多样的阅读行为呢？考察一下阅读史的学科疆界、史料、规范、方法以及研究实践，也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划界第四

书籍史是个交叉学科，是目录学、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共同哺育的。这三个学科，传统上对书籍有不同的定义，但书籍史及其分支，都以这三个学科为基础。它们的方法和理论假设也都在书籍史研究中彼此杂糅，分歧和争论不可避免。^① 作为书籍史的一个分支，阅读史自然也有交叉学科特征，融合了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目录学和文化史的方法。^② 在实际研究中，阅读史又表现出一些弹性，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其中发现了不同的意义。研究的性质决定对阅读行为的界定和认识。专攻阅读史的人，总是被指责不守规矩捞过界，思想史、时俗文化、性别研究、文学史，以及其他许多学科都会沾点儿边。^③ 一些目录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觉得阅读史的学科疆界太模糊，就试图给它勘定个边界，以维护自己的地盘。

新生混血

书籍史研究的交叉性质，郝山（Leslie Howsam）在她的小书里面描述得很清楚。根据她的说法，和书籍有关的许多新兴学科，都是文学批评、历史学和目录学彼此交叉的产物：历史学和文学交叉，繁衍出文化史、文

① Howsam 2006, 16–27.

② Chartier 1994, 2–3.

③ Hall 1996, 16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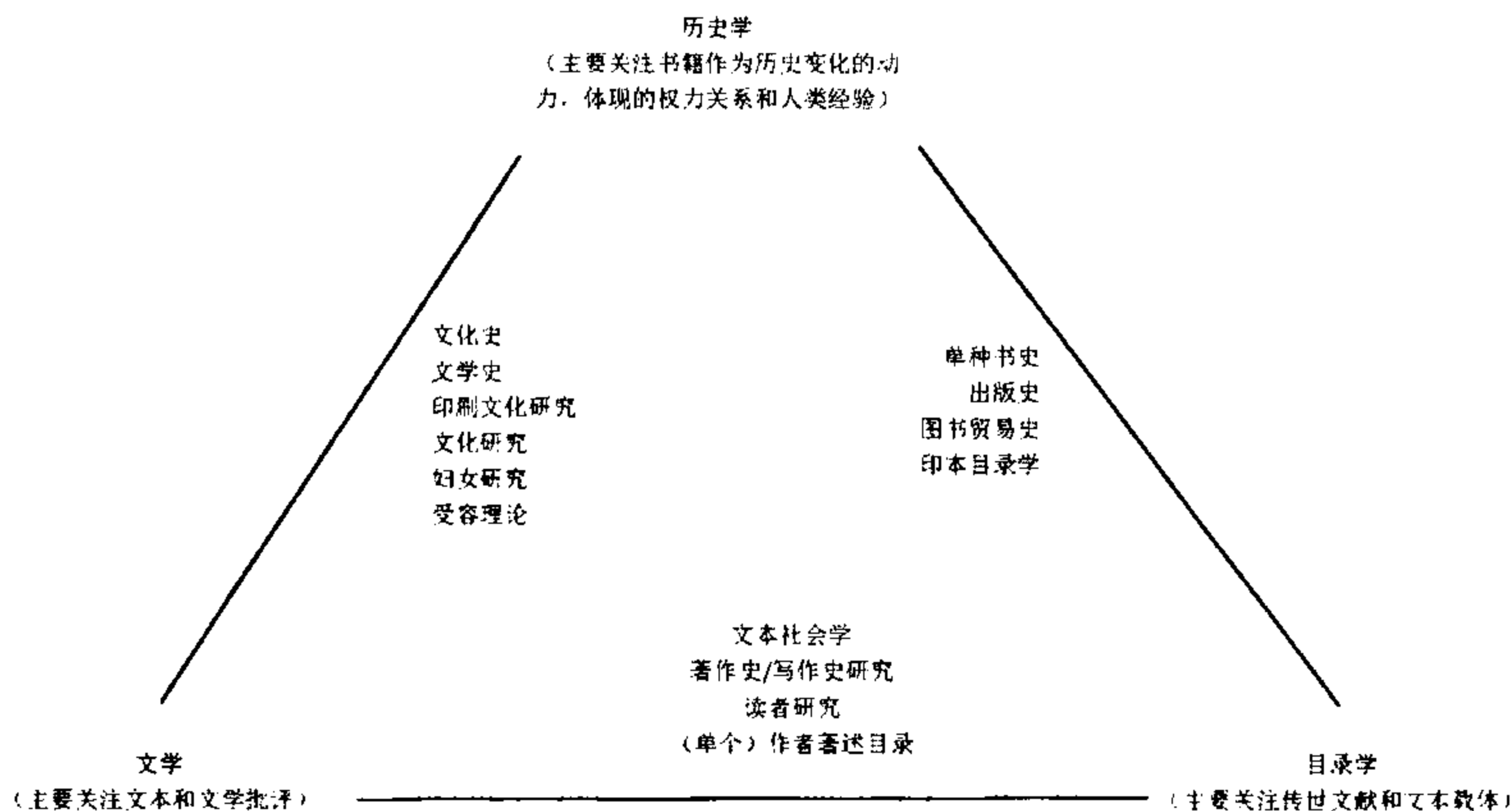


图 4-1：书籍史是历史学、目录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

来源：Howsam 2006。

学史、受容理论和妇女研究；文学研究和目录学交叉，产生了特定作品的著述史研究、基于书籍物质形态的读者研究、以及单个作者的著述目录；历史学与目录学结合，诞生了单种图书的历史研究、书籍文化史、出版史、图书贸易史、印本目录学（见图 4-1）。根据郝山的说法，所有这些交叉研究都应该是书籍史的分支。不过，书籍史学科真要是这样无所不包，反倒让书籍史的学科界限更加模糊，更容易与相邻学科发生领地争执。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理清书籍史学科交叉性质，找出书籍史与三个母学科之间的差别，这样才能划清界线。

与目录学

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总是把和书籍有关的很多研究对象圈进自己的领域，目录学家首先就有异议。甚至有英美分析目录学家认为，他们的学科已经发展到足够涵盖书籍史；分析目录学和描述目录学关注的问题，与法国年鉴学派的书籍社会史和文化史性质上是一致的，根本没有必要人为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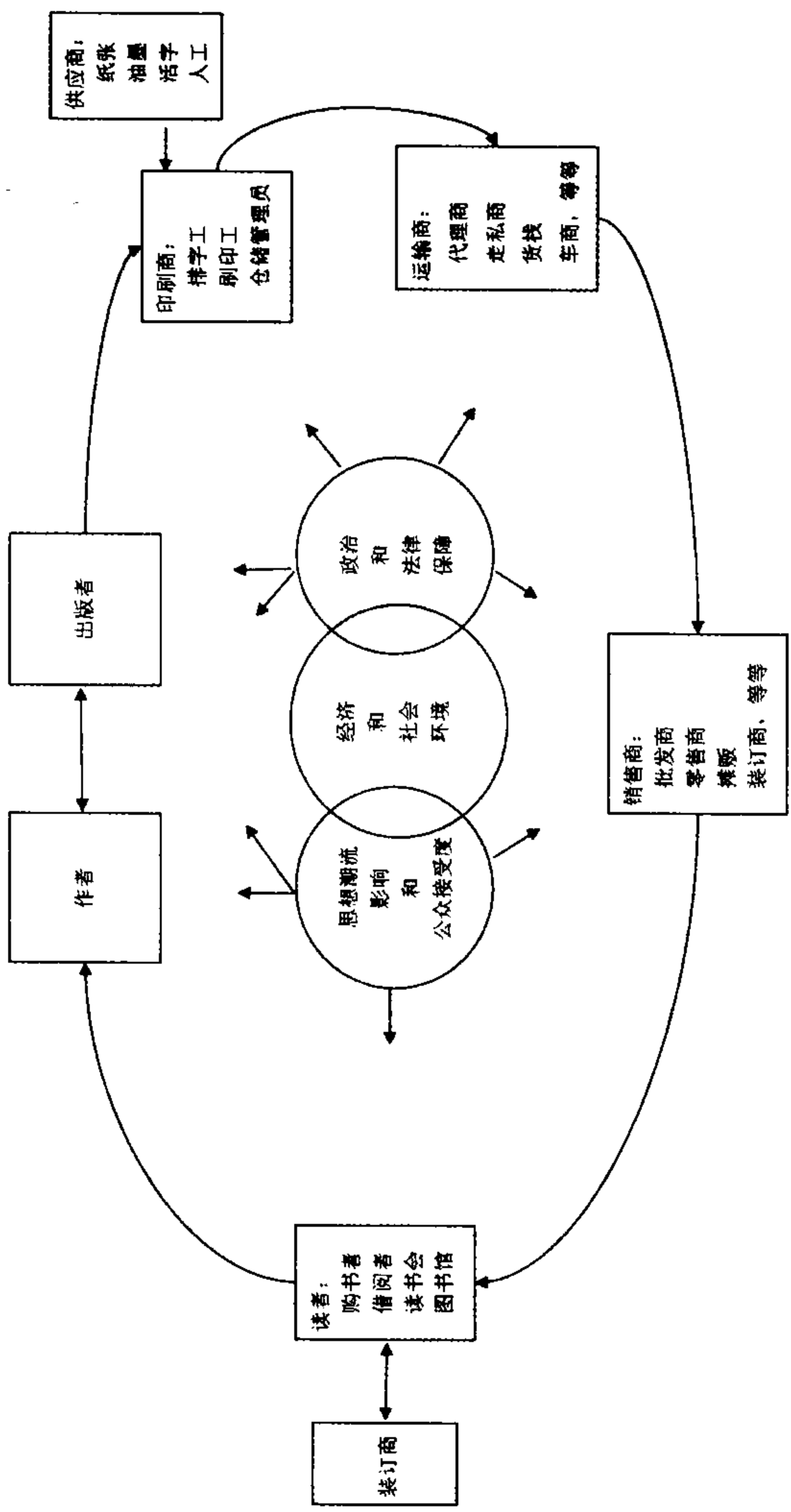


图 4-2：书籍的传播循环

来源：Darnton 1990.

裂，新创立什么书籍史学科。^①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书籍史（包括阅读史）与目录学终究还是有区别的。

作为近代法国文化史专家，丹顿在1982年发表的《何谓书籍史？》一文中，基于自己对十八世纪法国图书业的认识，界定书籍史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模式。他认为，书籍史是印刷传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目的是了解印刷如何传播观念，印刷文字如何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这个定义关注的是十五世纪中期谷腾堡改进印刷术以来欧洲的印本书籍。所有参与印本书籍制作、销售、传播和阅读的人和机构，都是丹顿书籍史研究的对象，他们的活动一齐组成书籍的“传播循环”（见图4-2）。^②这其实是一种研究模式，丹顿自认为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印刷文化传统，尽管需要依据具体地域和时段作些调整。

丹顿的传播循环，从作者开始，经出版者、印刷商、运输商、销售商，书籍才到达读者手中。读者是这个循环的终点，因为他们影响了作者——作者提笔前会大致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和需要，书籍出版后他会收到读者反馈，一次循环就这样完成，新的循环又从这里开始。顺着这循环路径传递的当然是信息。在这样的过程中，书籍是思想观念的物质化表现形态；经过阅读，书籍又转化为思想观念。因此，丹顿认为，书籍史要研究这个循环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以及整个过程，它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化，它与周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关系。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一般只考察其中一个环节，但丹顿强调，一个环节，只有与整个循环过程联系起来，只有与这个过程中的其他环节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每一个环节也都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才能捕捉到。在所有环节中，阅读当然是最难考察的。^③

丹顿的传播循环模式，作为法国年鉴学派在书籍史研究领域的代表，在欧、美、澳都有影响。他的研究模式强调图书贸易流动甚过书籍本身，在英美分析目录学家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并带来方法局限。（1）

① “The History of Books as a Field of Study”，见 Tanselle 1998, 46.

②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1982), 见 Darnton 1990, 110-113.

③ Darnton 1990, 122.

我们已经提到过，它只关注印本书籍，排除了手稿和其他形态的书籍。(2)相应地，它只关心1450年以后的印本书籍史，忽视了谷腾堡以前的书籍史。(3)它最终讨论的是书籍背后的社会和人，而不是书籍本身。(4)它强调书籍对社会的影响甚于社会对书籍的影响。(5)它忽视书籍承载的文本，也忽视了书籍的物质形态。(6)模式中涵括的参与者，缺乏历史特征，因为有些行业在书籍史中出现得很晚，比如排字工和运输商。(7)这是一个传播史研究模型，不一定适合书籍史研究。(8)这个模式是以欧洲经验为标准，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

目录学家，特别是英美分析目录学家，不认可丹顿的模式，认为书籍史的焦点应该是书籍本身作为人工产物具有的全部意义。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研究书籍，看重书籍对社会的影响，而目录学家则认为书籍史研究应该讨论社会对书籍的影响。根据这个假设，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和尼科拉斯·巴克爾(Nicolas Barker)提出了他们的目录学模式(见图4-3)。这个新的模式，基于书籍的生命历程，强调五种人类活动，即出版、印制、发行、受容和保存，它们共同决定书籍的生命。而这五种活动，又都受大环境的限制和规范。大环境有四类，即思想环境，政治、法律和宗教环境，商业环境，以及社会行为和读者口味。为了维持书籍史研究的目录学特征，亚当斯和巴克爾甚至用“目录学文件”(bibliographical document)取代丹顿模式中的传统术语“印本”。根据这两个人的说法，以印刷或手抄的方式复制多份，而参与制作的人，不管是作者、书商、印刷商、出版商，还是同时充当多种角色的多面手，为了公众消费而生产的产品，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单张片纸，都是目录学文件。他们认为，研究书籍的受容过程，对评估书籍的影响固然重要，但用来评估的相关证据，包括直接的阅读记录、流行程度、书籍的影响和使用，都来自目录学信息。^①根据他们的模型示意图，两人把丹顿的模式从里往外翻，外部因素被放到书籍循环的外围。丹顿看重被传播的思想观念，而亚当斯和巴克爾则强调文本，认为文本才是书籍循环流通的惟一缘由，文本能向读者传播，就在于它能

^① Adams and Barker 2001, 8, 13-32, 27-28.

够开启新的书籍循环。因此，这个目录学模式，到底是以文本为中心，而不是以读者为中心。其中，在书籍的生命历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参与制作的人的意图，而不是受众的主动阐释。就阅读行为而言，这是一种分析目录学式的考察，而不是历史学的研究。

拱卫书籍史研究中分析目录学传统的学者，当数麦肯锡（Donald McKenzie）贡献最大。他是新西兰人，后来到了牛津大学执教。他的文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理论，注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血液，拓展了目录学的研究领域。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也很推崇，视之为自己领域的基本理论假设。麦肯锡认为，目录学是惟一持续关注文本的形成、形式、流变、传播及其对读者的意义的学科；它应该和历史学兼容，但这并不是说它应该摇身一变，转而对书籍及其物质形态的形成和使用作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说目录学万万不能蜕变成书籍史。书籍史自是书籍史，目录学可以转换成文本社会学。麦肯锡认为，这样转换，将赋予目录学强大的功能，通过检查文本流传的过程和文本受众遗留的物质证据，可以复原文本的生产过程以及不同时期读者的受容情形。文本社会学有独特之处，比如，它要描述有案可据的所有文本，要解释文本的物质形态以确定其阐释功能，要涵括所有的新出文本及其形式，要将文本视为社会产品，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书籍史研究能做到的。这样说来，麦氏的文本社会学，就是研究文本的物质形态、流传，以及生产与受容的一种方法（参考第六章）。^①

与文学批评

书籍史专家把相邻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理论假设径直拿来为己所用，^② 文学受容理论家对此颇有微词，说他们在搞学术上的殖民扩张。^③ 有书籍史专家声称，读者和阅读行为应该成为书籍史关注的中心，

① McKenzie 1986, 2-4, 19-20, 51-52.

② 比如 Finkelstein and McCleery 2006.

③ Machor and Goldstein, 2001,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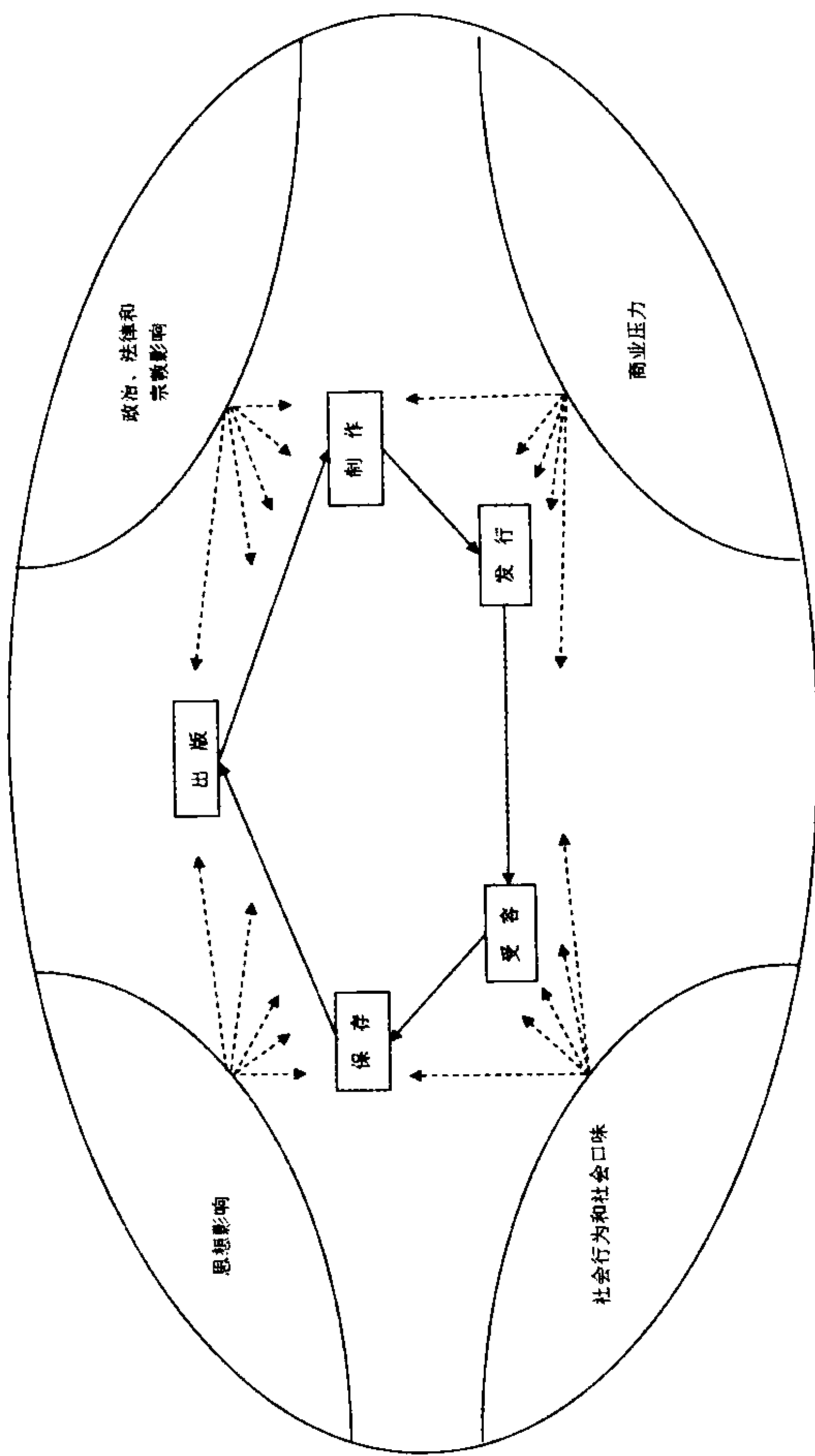


图 4-3: 书与社会经济环境

来源: Adams & Barker 2001.

这是新书籍史和旧书籍史的分水岭，^①而这正是读者反应批评或接受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文学批评和书籍史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有文学理论家就出来圆场折衷，说文本受容研究和书籍史研究应该互补，可以部分重叠。他们期望，为补充文学批评的不足，书籍史专家应该去考察历史上受众接触、消费手写文本和印刷文本时所处具体环境和所持具体方式，去关注一些具体的历史因素，比如说，读者如何接触不同的印刷品，他们买书时受什么经济因素影响，读写能力（literacy），读者如何对待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书籍，以及印刷品审查、禁毁、升级为经典等现象产生的机制和制度。在文学批评家看来，阅读史能为认识历史上的阅读行为贡献一些实证，但压根儿就揭示不了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反应过程，也再现不了历史上受众行为因文本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多样性。^②书籍史专家也指责受容理论有相同的局限（见第二章）。

上面列举的一些历史因素，受容理论专家觉得是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地盘，事实上早就另有所属，分别是社会经济史、识字教育史、目录学和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要想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阅读史家必须无中生有，提出别的学科没有提出的问题，并给出其他学科无法给出的答案。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什么叫阅读。只有对阅读的性质有了独特的认识，阅读史才能划定自己的研究领域。

什么是阅读？阅读是读者针对以物质形态呈现的符号以精神和身体做出反应的过程；其先决条件是语言能力，结果是阐释和认识。这就将个体读者与社会规范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紧密相关的问题是，谁是阅读史该研究的读者？毫无疑问，阅读史应该研究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读者，而不是文学批评家基于文本设想的子虚乌有的隐含读者。隐含读者不能被当成真正的读者，反之亦然。大卫·诺德（David Nord）在研究《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的读者群时就发现，这本仅为精英读者创办的刊物，其真正的读者有很多属于劳工阶层。^③历史上真

① Hall 1996, 31.

② Machor and Goldstein 2001, 156–157, 158.

③ Nord, “A Republican Literature...,” 见 Davidson 1989, 114–139.

正的读者很难一一确认身份，尤其是因为绝大多数阅读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有幸存留的材料很稀罕，即便不稀罕，也都是被时间淘洗过的。精英读者留下的痕迹少，普通读者更是没有留下关于他们阅读经验的任何记录。^①但是，要区分阅读史和文学受容研究，关注历史上真实的读者仍然是阅读史的第一个标记，这些读者是阅读行为的主体，阅读史家首先应该确认他们的身份，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研究文本受容史的人，大都绕着职业知识阶层转来转去，比如文学批评家、社会批评家、学者、神职人员之类，他们的身份都很容易确认；关心的文本，也都是经典化了的。为了考察阅读对非职业读者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建议将关注点转移到“普通读者”（common reader），也就是那些不倚赖阅读谋生的读者。^②普通读者这个词，过于宽泛，表现不出历史特征，后来有人代之以“历史读者”（historical reader），这样不仅把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读者与基于文本设想的隐含读者区分开来，^③而且强调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读者具有历史性。使用历史读者这个术语，阅读史家在描述过去的读者及其阅读行为时，脑子里就会意识到读者及阅读行为千差万别，就会把单个的读者放在个人生活史以及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比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都会导致读者和阅读行为的差异。^④

确认和描述历史读者，主要依据关于个人阅读经验的现存历史档案，而这些档案又证实了阅读实践千差万别，阅读社群（reading community）多种多样。^⑤为了认识历史上的读者和阅读行为的总体特征，我们还需要超越个体的阅读经验，弄清楚阅读行为的社会维度，而不应该对这广阔的背景不闻不问。在阅读史家看来，阅读并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简单精神活动——它需要人的身体参与其中，是在特定的空间进行的，背后是读者本

① Machor 1993, xxi-xxii.

② Rose 1992, 51.

③ Colclough 2007a, viii.

④ Colclough 2007b, 53.

⑤ Davidson 1989, 17; Raven, Small, and Tadmor 1996; Colclough 2007a.

人与其他人的复杂关系。^① 将历史读者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当然是经典的研究技巧，其主要内容是检视现存的材料，确认一部作品的实际读者，然后把他们按阶层、性别、民族、种族、职业、地域、社区或者宗教信仰分类，这样就能推断一部作品读者群的社会学特征。^② 夏蒂埃则倾向于按照费什的阐释社群或者保罗·利科（Paul Ricœur）的“读者世界”（world of the reader）来复原和划分读者，这样一来，历史读者就成了一群有共同阅读能力、阅读习惯、阅读规则和兴趣的人。^③ 夏氏认为，研究阅读史，应该着眼于重建书籍在特定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④ 阅读行为形成社会网络，阅读自有规则，这些都与读者自处的社会一一相应，有精神的、思想的、职业的种种特征，阅读行为的社会差异必定体现在实处，体现在具体的环境里。^⑤ 确认历史读者当然有各种方式，每种方式又都体现了特定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反过来又形成了阅读史研究的各种面貌，夏氏的研究就大不同于科尔克拉夫（Stephen Colclough）及其他英国同行的研究。这一点毫无疑问（见第八章和第九章）。

为了和文学研究进一步划清界线，阅读史家还需要认定文本与书籍不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两者有距离。没有物质载体，文本不能独存；有了物质载体，文本才能给人读，给人听。作者写的不是书，而是文本；文本又转变为“书写物体”（written object），就是我们说的抄本、碑刻、印本之类。活生生的读者有各种各样的阅读习惯，把持这些书写物体的方式也千姿百态。^⑥ 文本与书写物体之间的间隔，也就是制作、生产、流通和阅读过程，这正是生产意义的地方。新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都是基于文本，以美学为旨圭，恰恰忽视了这个间隔，忽视了文本的物质形态。物质形态是文本的物理表现形式，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读者的期待，招徕新的阅读公众，

①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4.

② Davidson 1989, 19.

③ Chartier 1999, 276.

④同上, 269.

⑤ Chartier 1994, 5, 23.

⑥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5.

催生新的文本使用方式。^① 读者最先接触的，就是这物质形态的书写物体，然后才目及文本。因此，研究阅读史，想弄清楚读者怎样读一个文本，就应该把这物质形态看作影响阅读的第一因素。丹顿在研究一个叫让·兰森(Jean Rason)的人怎样阅读卢梭(Rousseau)时，采用的就是这方法。^② 物质形态对于构建意义的重要性，麦肯锡作了很精彩的理论证明(见第八章)。正是麦氏的理论，把书籍史、阅读史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挟持下解救出来。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忽略了社会历史背景对读者和阅读的影响，说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文本物质形态的重要性也不公平。麦甘(Jerome McGann)的“文本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texts)理论，专门讨论文本的社会角色，指出物质形态的书籍从一己之私转为天下公器，是文本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对阅读当然有影响。在这社会化的过程中，读者阐释的不是文本，而是物质形态的书写物体，也就是书籍。文本中的字句以特定的物质形态呈现，而物质形态的书籍也具有特定的属性，这些都影响意义的构建，形成可能产生诸多意义的元素。^③ 麦甘是麦肯锡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朋类，但他的目的只是揭示文学文本的美学意义，与其他批评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文本生产以及它的物质形态，和他的文本社会化理论一样，都是文学探索的工具，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与书籍史

为阅读史划定学科疆界，最后一段是把它与书籍史部分剥离，明确它作为书籍史分支的独特任务。

把阅读定义为一个行为过程，这足以决定阅读史家要提出的问题和涉足的领域。丹顿认为，阅读并不单单是一种能力，而是在传播体系内积极构建意义的过程。历史上的读者怎么阅读，他就怎么思考，就怎么借助白

① Chartier 1994, 10.

②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见 Darnton 1985, 222.

③ McGann 1991.

纸黑字传达他的思考。^① 读者对于一部作品的反应，能说明印刷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因此阅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简单的个体识字行为。阅读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文本的读者与生产者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读者从文本中获取意义的方式，不断变化的方式。^② 霍尔（David Hall）把阅读定义为人对文本作出反应的过程，因此阅读史必须考虑阅读能力的多样性，阅读模式的多变性，以及阅读行为赖以发生的具体环境。^③

不管是阅读行为的个体特性，还是它的群体特性，阅读史家都有兴趣。研究个体读者的阅读经验，可能比讨论阅读的社会特性要早一些。^④ 但阅读过程中与生俱来的张力，对历史学家似乎更有吸引力。在传统意义上，研究读写能力的人都会关注阅读，讨论历史上的教学活动怎样让孩子学会读和写。这样的关注，其背后的假设便是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它们共同决定读者如何对文本作出反应。^⑤ 这种内在的张力，夏蒂埃表述为“墨守与出新”（constraint and invention）之间的张力。他强调，阅读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这种张力：一方面阅读个体和社会有能力推陈出新，另一方面种种限制、规范和传统则束缚读者思考、表达和实践。^⑥ 书籍的至高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秩序，不管这秩序是作者、出版者和印刷者设想的，还是权威人物和机构强加的，也不管它的初衷是不是为了解读和认识文本。总之，它就是一套限制和义务，一套要人恪守的规矩和名分。而在阅读过程中，有些读者总是要突破和颠覆其中的秩序。^⑦ 读者推陈出新，这件事情本身取决于他的能力以及他所属阐释社群共有的文化习惯。书籍试图把规范和传统强加给读者，一旦遭遇读者内在的感知和判断能力，这墨守与出新之间的张力就会显现并愈发强烈。^⑧ 当然，阅读的时、地、人不同，具体的阅读行为就有差异，而读者与文本关系中的内在矛盾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①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见 Darnton 1985, 216.

②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见 Darnton 1990.

③ Hall 1996, 31-32.

④ 比如 Ginzburg 1992; Del Col 1996.

⑤ Lyons 1999, 50-51.

⑥ Chartier 1995, 96.

⑦ Chartier 1994, viii.

⑧ Chartier 1995, 1.

夏蒂埃提出的墨守与出新这两个对立范畴，显然是从费什的阐释社群理论转换来的，并加以历史学的改造。事实上，文学受容研究和其他文学批评理论，也都帮忙廓清了阅读史的学科界域。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保罗·利科，他对读者与文本彼此依存的关系作了理论描述。他说，没有读者，就没有解读文本的行为；没有读者使用、拈借，就没有文本展示的世界（详见第六章）。^① 夏蒂埃借用了利科的拈借理论，以认识阅读及其文化意义。^② 既然读者是主动去拈借，这就挑战了关于时俗文化的传统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时俗文化只是被动地反映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文本差异与社会分层是相对应的，精英自有适合精英阶层的文本，引车卖浆者流自有适合他们口味的读物。^③ 夏蒂埃的拈借说，也挑战了阅读史研究的一个理论假定，即阅读习惯的不同，与社会差异紧密相关，也就是说，阅读行为因社会、职业和经济能力的差等而呈现多样性。^④ 受利科启发，夏蒂埃还为阅读史设计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要考察读者世界与文本世界（world of the text）（也都是利科的发明）之间的接触是如何发生的。要重建这接触的方式，我们就要承认文本有了物质形态才能产生意义，文本总是被形形色色的读者不断再造，而他们的阅读机制又是随着阅读环境变化的。^⑤

因此，夏蒂埃的阅读史，其实是社会文化史，重心是读者怎样使用和认识他们手中的文本，^⑥ 描述读者拈借文本这一过程的历史特征。^⑦ 夏蒂埃认为，阅读史区别于书籍史，就在于阅读史关注的是规训阅读行为和拈借过程的那些规则和传统。^⑧ 和书籍史专家不一样，阅读史专家的目标是把住不同的读者社群（或阐释社群）以及他们的阅读行为，并在诸多“墨守—出新”的张力下考察。^⑨ 经过这样的界定，阅读史就有了两个中心任务：一

① Ricœur 1984-1988, 3:164.

② Chartier 1999, 275-276.

③ Hall 1996, 184.

④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4.

⑤ Chartier 1994, 3; Chartier 1997b, 10.

⑥ Chartier 1995, 92.

⑦ Chartier 1999, 276.

⑧ Chartier 1994, 5.

⑨同上, viii;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34-35.

一个是复原文本的物质形态，弄清楚物质形态如何影响意义的生成；另一个就是重建阐释社群特有的阅读规则，以厘清具体阅读行为和阐释过程的社会差异。^①

其他学者也试图界定阅读史。艾伦曾经研究过近代法国的阅读行为。和夏蒂埃一样，他也认为研究阅读史，焦点是可以确认的读者针对具体文本真正实施过的阐释行为，考察读者与作品之间对话式的关系，也就是读者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动。^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阅读史就是要研究读者如何消费印刷文本。^③在研究英国乔治王时代（1714-1830）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近代美国的报纸时，有书籍史学者使用“消费”这个词描述受容知识和信息的过程。^④这样一来，读者就成了购买物质形态文本的消费者，与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没有什么区别，而阅读就是为了谋生活、找乐子。阅读史专家则说，这样的消费假说并不全对，即便在书籍生产和阅读商品化的环境下，阅读也不全是一种消费行为。另外，“消费者”一词，其实等同于大众书籍的读者，把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化为一个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被动过程。书籍不是饭菜，阅读也不是吃饭。^⑤把阅读视为消费，对阅读过程的认识就简单化了；另外一个潜在危险就是把读者接触文本的机会等同于他的经济能力，文化差异结果被不恰当地简化为社会经济差异。

将书籍史与目录学区别开来，将阅读史与文学受容研究区别开来，最后将阅读史与书籍史区别开来，同时界定读者和阅读这两个核心概念，设计独到的问题，这样阅读史的学科疆界逐渐清晰。但阅读史仍然保留了其跨学科的性质，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是难以彻底解决与相邻学科之间的领土纠纷。由于一般读者都没有留下痕迹，现存文本的物质形态也很少有细节表明有没有读者读过，更没有表明如何读，历史上的阅读行为很难追踪。有鉴于直接证据很罕见，而且都属特例，想基于零碎的琐闻轶事得出一个

① Chartier 1994, 2, 5, 23.

② Allen 1987, 272, 274-75.

③ Eliot 1994; Cranney and Miller 1987, 转引自 Gerrard 1998, 53.

④ Allan 2003, 118; Nord 2001, Part 2.

⑤ Radway 1986, 转引自 Davidson 1989, 17.

普遍性的结论，这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阅读史家现在能做的，似乎也就是把能确认身份的历史读者和他们的阅读经验纳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以重建一个阐释社群，弄清楚它的结构、阅读习惯和规则。哈克尔 (Heidi Brayman Hackel) 在研究近代早期英格兰的阅读习惯时，就是这样做的。^① 因此，个案研究在阅读史研究中是一个更切实可行的起点。

^① Brayman Hackel 2005.

设问第五

在划定了自己的学科地盘后，阅读史家就得别出心裁，提出一些问题来研究。说到阅读史的研究模式，丹顿的影响最大。他认为，阅读史应该着力探讨六个问题：谁读，读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为什么读，怎么读。回答前四个问题，有助于解答比较难的后两个问题。^①这六个问题中，“谁读”、“读什么”是最基本的，研究阅读史的人必须先回答这两个问题。至于“在哪儿”、“什么时候”，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把读者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从中找到线索确定其阅读经验的特性。既然阅读是一个从文本中解码和抽绎意义的过程，“为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就必然涉及阅读习惯、规范和套路的变化。尽管读者和阅读行为形形色色，丹顿认为，阅读史断断不能简化成各色阅读行为的罗列，而应该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不断变化的读者如何独特地解读不断变化的文本，这是问题的核心。^②

并不是所有阅读史家都想着一口气解答这六个问题；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学者也只是集中讨论一两个，然后把他们的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特定的阅读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读”和“怎么读”当然是最难的，因为材料稀少，即便有也都是偶然留存的，不典型。选择解答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法，阅读史家各有自己的招数，据此可以把他们的研究分成老派、新派和新新派。根据什么具体标准来划分这三派，以描述阅读史研究的发展，众说纷纭，但大体涉及思想演化、社会变革和权力关系三个维度。

^① “First Steps...” (1986), 见 Darnton 1990, 157.

^② 同上, 187.

阅读史与思想演化

阅读史学科如何演进，首先要在书籍史这个母学科内考察。年鉴学派的计量社会史研究传统一直很有势力，亨利-让·马丁、吕西安·费弗尔，还有他们的同辈学者，都服膺这个传统，采用量化研究以条理十六世纪迄今阅读习惯的演变。这一传统，代表的是老派的书籍史研究，也可以视为老派的阅读史研究。老派的研究还包括德国和英国的目录学传统，这两国的学者都基于传世的图书目录来确定读者能接触的阅读材料，加以提炼概括，以揭示其中的趋势。德国学者大多依据历史悠久的法兰克福书展和莱比锡书展目录，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些目录基本没有间断；而英国学者则主要参考1557年以来英国出版同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留下的海量文献。^①至于新派书籍史，当然是从老派分离出来的，根据霍尔的说法，其关注的中心是读者和阅读行为。新派的阅读史研究，会考虑阅读能力的多样化，以及阅读模式的长期变化。^②

乔纳森·罗斯不同意这样划分阅读史研究的老派和新派。他认为阿尔提克是老派阅读史研究的代表，关注的是编写出版史，复原图书馆藏目录和借阅记录，估量识字水平，并从总体上把握特定的读者群藏有哪些书，读过哪些书。^③比霍尔所说新书籍史和阅读史晚一辈的研究，罗斯名之为“受众史”（history of audience），也就是普通读者研究（study of common reader）。他说的普通读者，指不以阅读为工作和谋生手段的非职业读者。他说，老派的书籍史，研究人们读什么，是否会读；新派则探讨他们怎么读；不管老派新派，都没有触及大众在思想观念层面对阅读的反应。于是，罗斯就提出了他的第三代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其核心问题是文本如何改变普通读者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不仅要考虑读者从文本中挑拣的具体信息，还要衡量他们对这些信息的信任程度、参与程度，以及对文本的批评

① “First Steps...” (1986), 见 Darnton 1990, 158-161.

② Hall 1996, 31-32.

③ Rose 1992, 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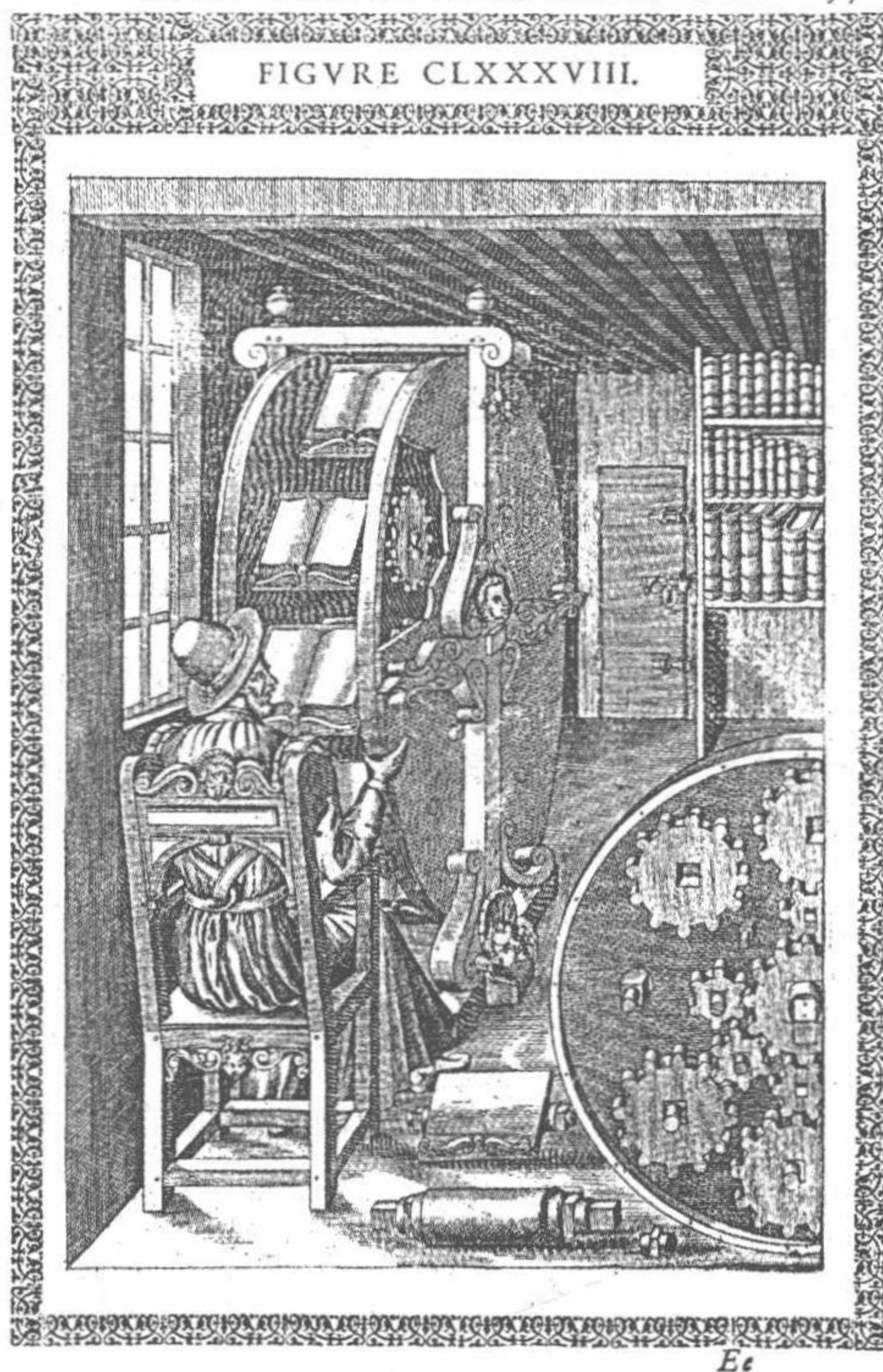


图 5-1：书轮（Daudet 刻绘）

阅读史要讨论的问题，不仅涉及书籍、文本、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具体环境，与科技史也密切相关。书写（writing）技术、印刷技术，乃至今天的数字技术，都会影响人的阅读行为和知识生产。图中书轮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巧匠拉梅里（Agostino Ramelli, 1531-ca. 1600）的发明，人文主义学者多用于校勘经籍。转动大轮，便可查对各个版本或多种书籍。明代天启年间，王徵据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 1576-1630）所示原本摹绘，收入《远西奇器图说》（见图 5-2）。原刊 Agostino Ramelli, *Le Diverse et Artificiose Machine* (1588. Milano: Il Polifilo, 1991)。哈佛大学贝伦逊图书馆 (Biblioteca Berenson. 意大利佛罗伦萨) 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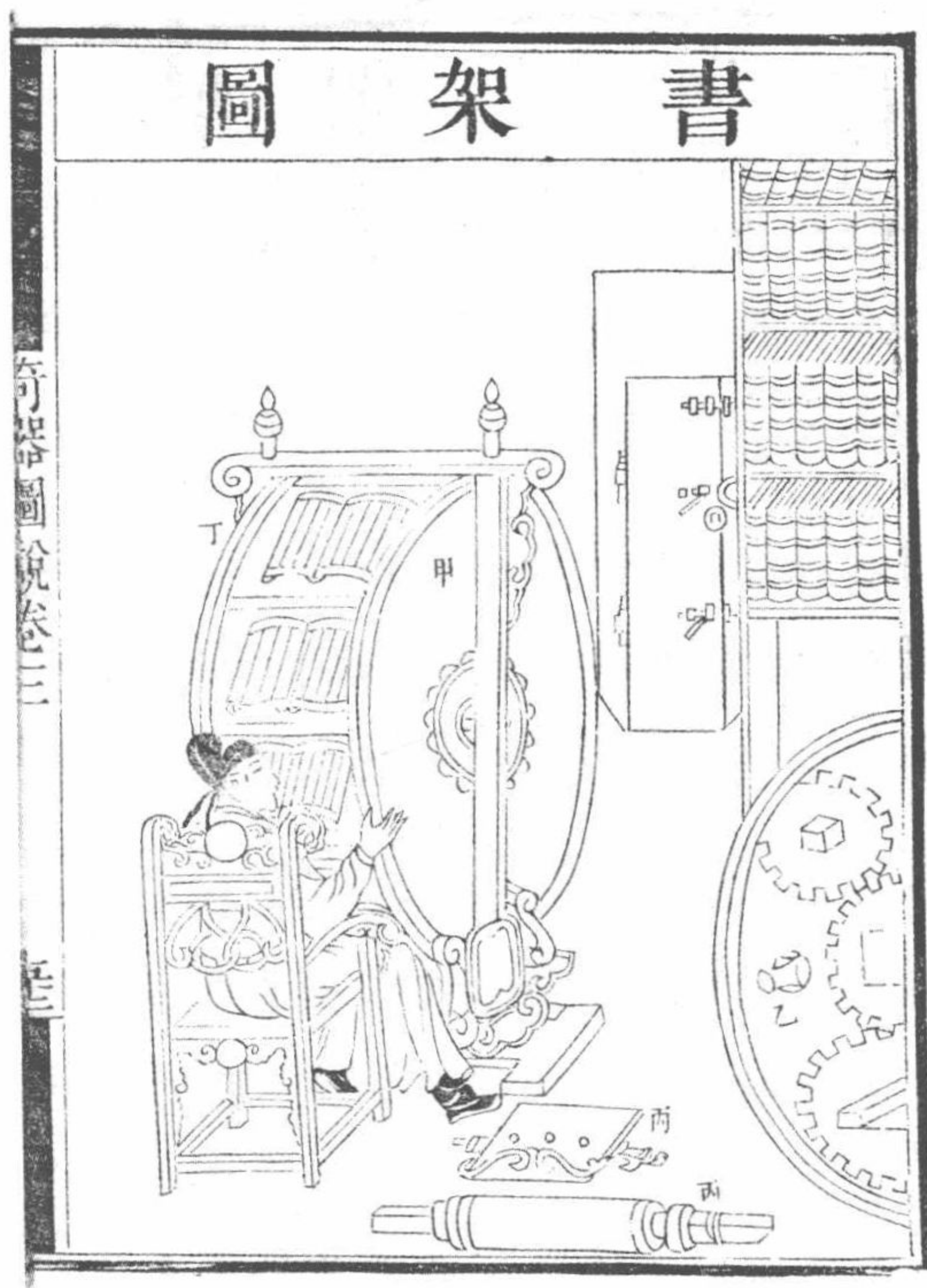


图 5-2：书轮（王徵摹绘）

原刊邓玉函口述，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1627年），卷三。守山阁丛书本（1844年）。参考图 5-1。

态度。^① 罗斯认为，他说的受众史研究，可以用来检验各种各样的阅读理论，不管是现象学，还是解构主义，不管是符号学，还是读者反应批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主义；也可以用来检验形形色色的时俗文化假说，以及读者和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论。^②

罗斯关于第三代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说法，是基于他对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阅读行为的研究。这个说法，其实没有多少阅读史家唱和。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阅读史的学科状况，仍然像霍尔说的那样，是介于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一块公共地。从史学的角度看，阅读史研究发端于印刷出版史与社会文化史的交叉，这类研究往往与重估时俗文化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也与读者的拮据行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做文学批评的人，主要关注作者以及阅读中的阐释学问题，倾向于把读和写看作控制、颠覆和抗拒的行为。^③ 按照霍尔的意思，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前，阅读史研究是文化史专家和文学批评家的领域。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研究阅读史的人大抵受年鉴学派和英美分析目录学传统的影响。此后的阅读史研究，则转向关注真实读者如何创造文本，如何演绎文本的意义，以及阅读行为有哪些物质性特征。这一转变，得益于借用了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变革后的分析目录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理论，还有与之呼应的麦甘的文本社会化理论，都提出在研究阅读行为时应该把分析文本的物质特性与文本的生产、受容糅合在一起，而不是单单分析文本的内容，尽管内容分析也是不可或缺的（见第六章、第八章）。

阅读史与社会变革

阅读史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与阅读行为的个体特征有关，即如何根

① Rose 1992, 48, 51, 68-69.

② 同上, 52-68.

③ Hall 1996, 187.

据共通的阅读规则分析多样化的个体阅读行为，归纳出其中的普遍特征。^①詹姆斯·拉文（James Raven）用这个问题来区分阅读史研究的老派和新派。读者接触文本，总是有独特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不同，对文本的反应也有差别。因此，拉文认为，研究阅读史，应该从更广阔的文化史着眼。^②为了避免简单地收辑罗列个体读者的阅读经验，拉文建议复原阐释社群，以便将孤立的个体读者置于广阔的背景中考察。在复原共通规则的过程中，对个体的阅读经验和阅读习惯应该作辨认和比较，而考察读者对文本的反应也都基于一些大略的假设；描述读者和阅读行为，也都是在各种各样现代理论框架中进行的，比如启蒙说、民主理论，乃至公共空间说之类（见第九章）。^③这样写成的阅读史，在拉文看来，其方法都有目的论特征，都是老派。他说的新派，则自始至终关注个人的阅读经验，强调阅读实践和习惯的多样性以及阅读效果的变化多端。其理论基础，就是前面我们谈过的一些理论预设，比如，只有经读者使用了，文本才能有生命；在识文断字与大字不识之间有不同的读写水平，对同样的文本，读者会有不同的使用方式；阅读环境不一，阅读期待不同，阅读效果也有差别。在拉文看来，阅读不是亘古不变的，天下也没有一个通用的规则，这种行为是受历史环境制约的。因此，所谓阅读史，并非什么不言而喻的进步和启蒙的历史，也不是什么文盲越来越少，知书达理的人越来越多的历史，跟什么从愚昧野蛮到民主人道乃至德化天下的人类理想进程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阅读不一定能解放人，反而有可能奴化人，禁锢人的思想。^④拉文过分强调个人的阅读经验是阅读史研究的起点和目的，发现共通的规则显然就变得困难重重。另外，从他的一套说法，我们能知道阅读史不是什么，但很难厘清阅读史是什么。

^①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见 Hunt 1989, 156.

^② Raven 1998, 268.

^③ 同上, 271-273.

^④ 同上, 284-286.

阅读史与权力结构

2003年，凯文·夏丕（Kevin Sharpe）和斯蒂文·茨威克尔（Steven N. Zwicker）就“新阅读史”提出看法。两人梳理了学科状况，认为阅读史就是要研究读者个人和社会经验的复杂性。这一点和拉文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夏丕和茨威克尔认为新阅读史的首要目的是揭示读者在所有图书事业中的支配地位和中心作用，而这两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他们相信，文本的意义有赖独立的读者而存在，读者在不间断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就如何获得权威地位与各方讨价还价。他们的新阅读史研究不是描述一个简单的建构和受容过程，其重点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连续不断的互动。其中的谈判，是在形形色色的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进行的，其目的是要以各种方式创造文本，铸就阅读模式，甚至挑战作者的地位。因此，夏丕和茨威克尔赋予读者和阅读群体新的特征，认为他们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消费者，还促使品味、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发生改变。^①因此，形成阅读经验的文化因素，以及由阅读经验产生的文化因素，有必要重新评估，其中包括人文主义、清教、印刷业的兴起、欧洲封建制的覆灭、以家庭为中心的阐释社群、咖啡馆、学校、教会等等。^②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方法，糅进了福柯的权力理论，并借镜了阅读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揭示阅读的政治特征。夏丕在研究威廉·德雷克（William Drake, 1723-1796）的阅读行为时，就抱持这样的目的。^③他认为，历史学家需要从研究文学的人那里学习很多的东西，其中自然包括很有些历史意识的新历史主义，要多多注意语言问题，要侧重读者头脑中结构、解构和重构的复杂过程。他甚至鼓励历史学家多读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文本，就像文学批评家那样读，以检验一个时代的读者如何解读政治味道浓厚的文本，或权威性

① Sharpe and Zwicker 2003, 3, 8.

②同上，4-27.

③在夏丕之前，威廉·H. 谢曼（William H. Sherman, 1995）就使用了“读和写的政治学”（politics of reading and writing）这一说法，以界定约翰·狄（John Dee）的阅读行为，但谢氏并没有倡议借鉴当时刚流行的新历史主义，也没有提出将文本分析、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杂糅在一起的方法，而夏丕在这些方面则是开了风气。

质的文本。^①就史学方法而言，这样的阅读史就成了一部政治史。夏丕关于阅读政治学（politics of reading）的说法，将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阐释简单化了。对读者和阅读行为作历史考察，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阅读经验简单地政治化，有很多阅读行为并不具有任何政治动机。夏丕把阅读史写成政治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不少障碍，不过，他的建议，还有其他新历史主义者的建议，值得试一试。

自从丹顿 1986 年首次提出完整的阅读史研究模式后，阅读史研究的新旧之别还有异议，这说明这个学科还处在婴幼儿期。从事阅读史研究的人，都在试图圈定自己的学术领地，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提出一些别致的问题，作些别开生面的回答，这都是在跑马圈地。但在众说纷纭的背后，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这就是都在努力探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兼采文史。他们从文学批评家那里借鉴了形形色色的理论。阅读行为发生的历史背景千差万别，依据什么样的规则、如何甄别和使用史料，是他们共同关心的研究实践问题——这是下三章要评述的内容。

^① Sharpe 2000a, 25-26.

立规第六

欧美阅读史研究，迄今还没有什么整齐有序的面貌。它涵盖了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也没有什么规范的方法。有名门正派的学院研究，也有掌故逸闻的简单汇集；有个案研究，也有对读者的统计分析。这些研究五花八门，很难概述，争论也很难厘清。但是，大家都默认和共用的理论假设，还是有那么几个，它们的血缘门第都很清楚，广受尊重，于是就成了阅读史家都遵守的规矩。大抵说来，它们渊源于英美的分析目录学、法国当代哲学和年鉴学派，以及德国和美国的文学研究。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讲过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对阅读史研究的影响。这一章，我先说说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读者与文本互存理论，和麦肯锡关于文本物质形态的理论，——这两者属于“立”，是大家都遵从的基本原理。最后列举阅读史研究应该避开的一些理论陷阱，——这是“破”，是大家想当然，但阅读史无法证实的传统假设。

文本与读者

德·塞托提出了一个对阅读史研究至关重要的双重假设。首先，在阅读实践中，文本被指定的意义与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是有差异的。读者将文本与文本的来源割裂开来，将文本的各个部分重新组合，创造一个出乎作

者和出版者意料的东西，演绎出无穷的意义。^① 其次，一个文本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读者赋予它意义。文本只有借助读者才能获得意义；读者变了，文本及其意义也就变了。读者自有一套作者和文本无法控制的认知密码，用来解析、重组、阐释文本。在解析和重组中，有两种期待互动，衍生出纷纭复杂的蕴涵和机关：一种是文本意义上的期待，文本赖以谋篇布局；另一种是阅读意义上的，作品借助阅读过程得以实现它的价值。^② 关于阅读，德·塞托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读者就像一个擅闯他人领地顺手牵羊的偷儿。传统观点总把读者看成喜欢偷窥的人，他看幅图、读篇文章或一本书什么的，完全是被动的，里面有什么，他就看什么，还莫名其妙地特兴奋。真实的阅读行为正相反，彻头彻尾是一个悄无声息的生产行为。根据德·塞托的描述，读者是蹑手蹑脚闯入（poaching）作者的文本，兴奋之余还动手动脚，在文本里面大闹一通，高潮迭起，体验了自己无数的化身。^③

德·塞托是强调阅读行为诡谲之处的第一位历史学家。阅读行为看上去被动、驯服，实际上是一个创见迭出的过程。^④ 在描述这个悖论时，德·塞托很显然从姚斯那里借用了阅读期待的概念，又从其他读者反应批评家那里借来了读者主动参与意义创建的假设。和保罗·利科一样，德·塞托也认同“阅读即拈借”（reading as appropriating）的假说。这个假说，夏蒂埃后来因袭和发展，用于研究法国文化史（见第九章）。

形制与阅读

文学批评家把文本看得很抽象，书籍史和阅读史家则把它看成有特定物质形态的系列符号。但文本和阅读的物质特征，并不是书籍史专家首先

① de Certeau 1984, 169.

② 同上, 170-171.

③ 同上, xxi.

④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1-2.

提出来的，而是目录学家的理论发明。麦肯锡革命性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文本的意义联系起来。麦氏认为，文本是分工合作的产物，需要新的分析方法，以揭示物质形态的书籍的生产与受容过程，而不应单单考察它的内容。他强调，文本研究一定要考虑文本意义以外的因素，因为文本意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连续的阐释行为构建的，那些写的人、设计的人、印刷的人、买的人、读的人，都会参与这个意义构建的过程。^①他认为，以前的文本批评理论，对于书籍的历史、书籍的构成、字体表述的意义等等漠不关心，而是一门心思地处理文本蕴含的经济、社会、美学和文学意义，这有失偏颇；只有他的综合性的文本社会学理论才能涵括所有内容。^②

在英美分析目录学传统中，目录学家关注的是载有书写或印刷符号的纸张、羊皮纸或其他载体。这些符号，对分析目录学家来说，就是作者臆想的痕迹；它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目录学家的事情。^③根据这种理论，一本书的物质特征，只是参与制作的人留下的痕迹，反映了制作的工序和方式，没有任何表述功能和象征意义。他们假定印刷是一个理性、一贯的生产方式，文本的意义也随之固定，一成不变。麦氏想修正这种理论。他论证说，选择什么样的字体，印刷品最终呈现什么样的物质形态，不单是印刷工人的工作，也不单是编辑的功夫，而是取决于一系列彼此相连的生产活动。参与的人很多，他们的工作很复杂，实际操作也很难预料，生产的文本也各不相同。麦氏把这种生产方式称为“协同生产”（concurrent production）。^④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提出的挑战，麦氏也有回应。他发明了一条目录学原则，认为目录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研究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本，考察其传播过程，包括它的生产和受容。^⑤正是基于这条原则，以承认书籍和文本的历史特征为前提，麦氏认为目录学就是文本社会学，关注点是文本传播中的技术和社会过程。

① “'What's Past Is Prologue...’” 见 McKenzie 2002, 268.

② “Typography and Meaning...,” 见 McKenzie 2002, 236.

③ Greg 1966, 247; McKenzie 1986, 1 引。

④ “Printers of the Mind,” 见 McKenzie 2002, 13-85.

⑤ McKenzie 1986,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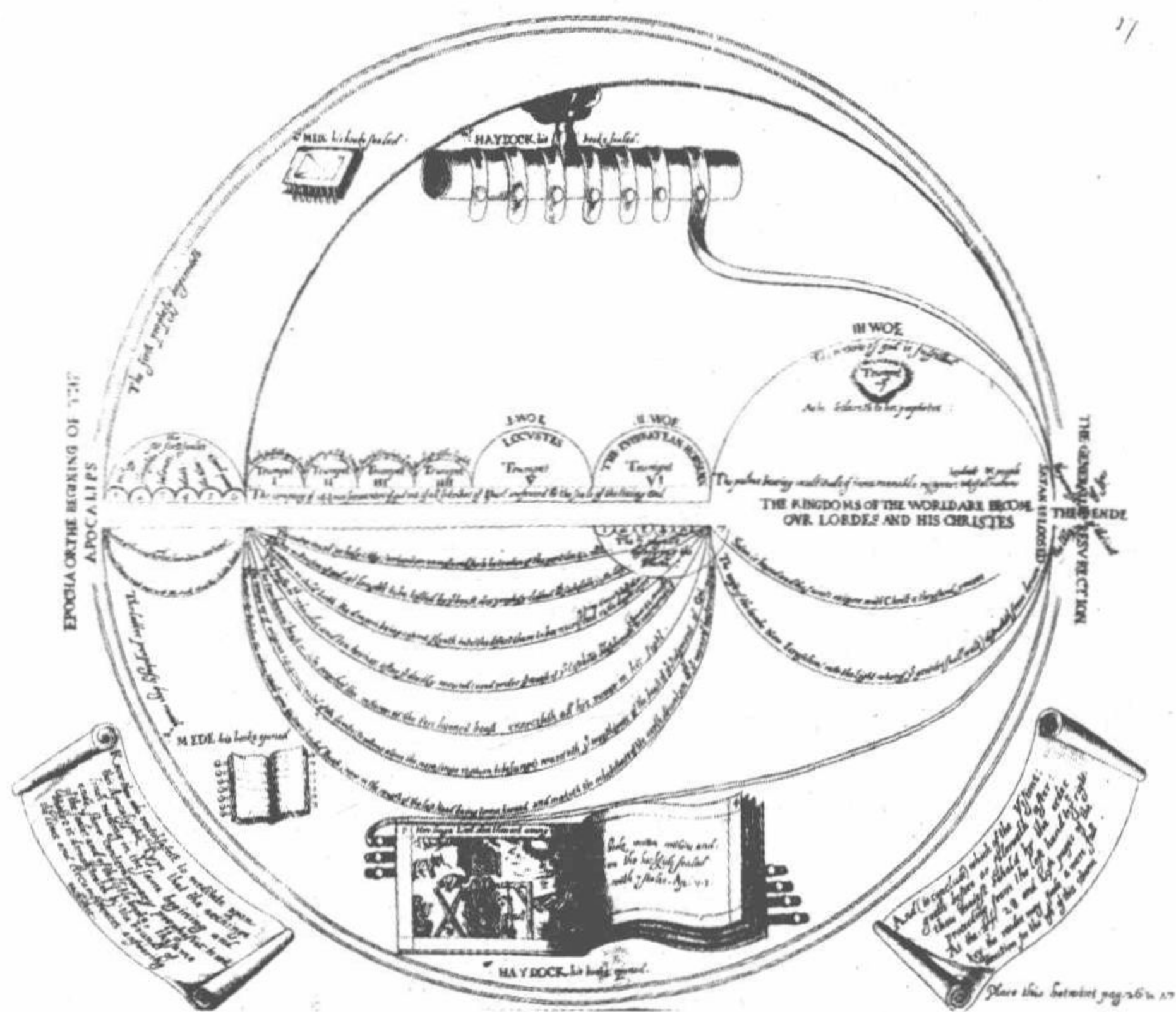


图 6-1：卷子装和册子本

从卷子到册子，是书籍制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公元一世纪出现的欧式册子本（codex），最先可能用于抄写《圣经》，阅读和翻检要比使用卷子容易得多。这幅图表现的是《圣经》“启示录”载体形制的变化。上面为卷子本，有七个扣；下面为展开的册子本，七个扣转变为七条飘带，便于标记和查找。原题“*The Apocalyptic Type*,” 刊于 Joseph Mede, *The Key of the Revelation*, trans. Richard More (London: Philip Stephen, 1643)。大英图书馆汤姆逊文库 (Thomason Collection) 藏本。

为此，他重新定义了文本。他说的文本，是指所有形态的文本，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嘴里说的，甚至数数本身，都是文本，这倒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观念有几分相似。^①至于他强调社会学，则意在提醒学者关注社会现实、制度、人的动机以及人际互动在文本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扮演的角色。^②这样，麦氏的文本社会学把目录学变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

关于印刷文本，麦氏很显然受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体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一论断的影响。麦肯锡认为，书籍的物质形态、字体、版式，都具有表达功能。基于这个假设，麦氏断定，历史上一个文本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主要根源就是目录学元素的变化。^③“新的读者创造新的文本，新的意义是文本的新形式发挥作用的结果”，^④这是他的论断，经常被征引。

在麦氏的文本社会学中，阅读都是在特定场合进行的，都可以基于文本的物质形态部分地复原。任何文本的物质形态，以及制作意图，都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相对应。读者接触文本时，总是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而这方式又是由文化决定的。在传播过程中，读者也会改变文本的物质形态，这样它就成了读者当时构建意义的背景，不再体现初始的制作意图和意义。同时，阅读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根源就是文本每个版本的历史特性（或者文本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版本的文本，都是作者为特定的读者市场准备的；其制作和传播过程，总是不断地有创造的活动参与其中。不管其物质形态是什么样子，文本在历史上总会被反复解读，反复编辑，反复设计，反复印刷，反复出版，众多的读者就赋予它众多的意义。书籍史，包括阅读史，必定是文本不断被“误读”的历史。^⑤

德·塞托曾假设文本被指定的意义与读者的阐释有差距。麦氏根据自己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对这个差距作了进一步的演绎。他首先把文本观念分为封闭式的和开放式的。封闭式文本（closed text）得到作者首肯，是自

①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见 Barthes 1977, 79-124.

② McKenzie 1986, 4-8.

③ 同上, 8, 51.

④ 同上, 20.

⑤ 同上, 10, 50, 27, 24-25, 27-30, 14-16.

足的，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开放式文本（open text），其意义元素不完全，因而是开放的，不稳定的，永远有读者、表演者或者其他受众重新创造。这当然是受福柯的文本不确定性理论和艾瑟尔的文本留白理论的启发。就封闭式文本而言，它对于首创者的意义，可以借助作者的本意、文本传播模式的表述功能，以及它的受众或读者的受容来复原。至于开放式文本，由于在本质上开放、不稳定，因而不会产生任何确定的意义，其目录学元素在特定场合向特定读者传达独特的意义。^① 封闭式文本只是暂时的，开放式文本才是永恒的。任何文本本质上都是开放式文本。分析目录学校订一个文本，似乎是复原了一个理想的、稳定的封闭文本，其实也是一个再造过程，结果也是一个开放式文本。

就考察历史上文本产生的意义而言，麦氏认为，他的文本社会学与文本校勘、文学批评、文学史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学科界限。任何书籍史研究，都不能避开作者、印刷、出版、读者等问题，也不能对读者从书中发现的意义视而不见，因此他的文本社会学兼容书籍史和阅读史。^② 麦氏显然想超越研究文本意义的不同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对于麦氏的理论贡献，夏蒂埃有个总体评价。他说，文本社会学理论驳斥了传统的文本抽象说，证明文本的物质形态决定作品的意义和解读；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death of the author）理论不同，文本社会学强调作者的作用，和书商、印刷商一道，赋予作品以特定的物质形态；它也反驳了读者在意义构建中无足轻重的理论，证明一个文本的意义总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各色各样的阅读行为赋予文本以不同的意义。^③ 但是，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并不是说麦氏放弃了自己的目录学立场。他试图融合文本研究、物质形态分析、文本使用的历史演变，首先是为了与各色各样的文学批评保持距离，特别是新批评的文本自足、意义自在其中这一理论假设。另外，麦氏强调目录学元素是表述意义的关键，这部分回答了文本的物质形态如何影响文本意义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揭示读者如何从文本的物质形态中构

① McKenzie 1986, 45-50.

② 同上, 14, 10.

③ “Texts, Forms, and Interpretations,” 见 Chartier 1997a, 85.

建意义——他只关注物质形态、文本与意义的关系，而不是读者、文本与意义的关系。

创作与阅读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分析目录学的理论统治着文本目录学，麦肯锡认为这与当时占据文学批评江山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密切相关：所有这些理论都认为文本是自足的，自己会说话。^①另外，文学研究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与符号学理论，也假定语言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符号系统，本身就具有意义，不受任何意图和主观阐释的干扰。德·塞托和麦肯锡两人都对这些观念提出挑战。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提出的诸原理，敷衍的一套逻辑，是为了规范文本生产，并不能解释文本的实际使用。^②个体读者从文本中发掘意义有特定的方法，作者、出版商、印刷商生产物质形态的文本也有特定的策略，两者不是一回事。

语言学和符号学观念，并不是阅读史家要避免的惟一理论陷阱。与此陷阱相关的是“作者谬误”（authorial fallacy），或称“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这是维姆萨特（W. K. Wimsatt, Jr.）和毕尔兹利（M. C. Beardsley）新批评理论的术语，本意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诗歌和诗人的意图混淆。如果从诗人的心理本源中寻求诗歌批评的标准，最后把诗歌评论写成诗人的传记，这就陷入了“作者谬误”。^③维氏和毕氏认为，诗歌不是批评家的，也不是诗人的，而是公众的，也就是说，诗歌写出来是让人品头论足的，它的特色，它的语言，它的内容，都应该为公众所知。为了对诗歌有自己的认识，读者就不要理睬什么诗人的意图，尽管发挥自己的语言和文学能力，就作品的主题自己作个结论好了。为了帮助读者揭示诗歌的意义，他们还总结了三种证据，即内证（internal evidence）、外证（external

① McKenzie 1986, 7.

② Chartier 1995, 94-95.

③ “The Affective Fallacy”，见 Wimsatt 1954, 21.

evidence) 和中证 (intermediate evidence)。所谓内、中、外之别, 是以文本为中心划分的, 显示了证据材料与文本的关联程度。内证是大家都会掌握的, 了解一点诗歌的语义学和语法学, 一点语言常识, 一点语法, 翻翻词典, 再读点词典征引的文献, 总之, 有了一些语言和文学常识, 就能掌握内证。外证则因人而异, 不是诗歌作为语言的产物能包含的, 而是有点像心有灵犀, 猛然觉悟诗人怎样写诗、为什么写诗。中证则来自作者本人, 以及作者附丽于词句和主题的私意。这三种证据中, 他们认为, 内证于揭示文学文本的意义是最可靠的, 也是最容易找到的, 因为它们就藏在文本里面。一个读者对这种证据的分析和评价, 其他读者可以确认或者驳难, 但一部作品的内在诸元, 实在是读者理解它需要掌握的关键。外证包括作者的经历、手稿、书信、谈话, 以及其他历史材料和历史背景, 只要和他的文本生产环境有关, 均属此类。基于这类材料解读出来的文本意义, 本质上都是私意忖度; 如果以之推论大众, 效力其实有限得很。因此, 外证尽管触手可及, 与赏析一篇诗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面世机会和使用价值也就因之大打折扣。作为语言组合和思想表达手段, 诗歌中从来没有这类外证, 人们也不需要知道是不是有这些东西。中证不一定体现作者的意图, 但可以廓清文学文本内词句的含义, 想象的内涵。一个作者遣词造句, 使用典故, 往往出自习惯。了解他的套路, 或许有益于在一篇作品中发现具有一致性的结构和主题, 有益于进一步认识遣词造句在文本中如何发挥作用。作者常用的字、词、句和典故, 和写作中的其他元素一样重要, 对于分析判断具有同样的价值。内证、外证和中证都不是引导读者认同作者意图, 而是敦促他们专注于文本本身。读者要做的事情, 不是乞求外力揭开作品的真相, 而是要汲汲于文本形式中的内证。^①

与“意图谬误”相伴的, 是“情感谬误” (affective fallacy)。维氏和毕氏用这个术语, 指基于文本在读者中唤起的情感效应来评判作品的善恶美丑。就诗歌而言, 这是把诗歌本身和它产生的结果 (即诗歌是什么和有哪些功能这两个问题) 混为一谈。这种谬误, 起初大抵是想从诗歌的心

^① Wimsatt and Beardsley,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1946), 同上, 5, 10, 12, 16, 18.

理效应中寻求批评的标准，结果便是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评。有些读者宣称一首诗、一个故事就诱发他们鲜活的想象、强烈的情感、浓厚的意识。在维氏和毕氏看来，搞文学批评的都应该对这些说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它们辩驳不得，但也入不了批评家的法眼。他们对这样评判文学文本颇有微词，指出批评一部作品和阅读这部作品，二者必定有关联，但批评家和读者角色不同。批评家不应该统计分析诗歌读者的心理反应，而应该专注宣讲文本，揭示其中的意思。而读者呢，也不会把批评家的话当确证，而是倾向于自己评判。^① 维氏和毕氏这样说，并不是想突出读者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文学批评应该以文本为基础，以文本为中心。

不管是意图谬误还是情感谬误，维氏和毕氏提醒说，都会使得诗歌本身趋于消失。^② 既然作者意图和读者情感反应都无助于揭示一部作品的意义，批评家能做的只能是仔仔细细地读文本，琢磨它，没有其他方法。维氏和毕氏的这些主张，当然都是形式主义的，把新批评的理论阐释得很清楚。他们首创的术语，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经常引用，但其新批评的背景和主旨则被有意无意地略过不提。在对法国小说的研究中，詹姆斯·史密斯·艾伦承认作者意图和实际创作出来的作品有差别。他强调，史学家想从小说中寻求字面意义，必须意识到作者意图对于文本阐释没有什么用处。他认为，所谓意图谬误，就是把作者在其他地方表达的意图，错误地等同于他在小说中实际呈现的东西。^③ 作者意图并不能决定文学作品的意义，更不能决定阅读。

维氏和毕氏切割作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仅突出文本语言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麦肯锡显然不同意。他强调作者和印刷商在以特定的形式呈现一个文本时抱持什么样的意图，也看重出版商在决定发行这文本时打什么如意算盘。麦氏认为，从文本的物质形态以及文本本身，可以部分复原

^① Wimsatt and Beardsley, "The Affective Fallacy," 同上, 21, 32, 34.

^② 同上, 21.

^③ Allen 1983, 235-236.

作者的意图，读者也可以生成他们自己的意义。^① 一般来讲，印本书籍的物质形态里面总是有作者的身影，他会设想自己的文字印刷成书后里面最细微的细节，并为此向印刷商和出版商提要求，与他们合作甚至争执。^② 就这样，麦氏将作者意图延伸到了出版和印刷环节，出版商和印刷商是文本物质形态的作者。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意图，也可以解释成“制作意图”，就成了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避不开的一个问题。德·塞托假定作者（以及其他制作者）指定的文本意义和读者从文本（以及文本的目录学元素）生成的解读是有差距的。这个假说并没有建议阅读史家忽略作者、出版商和印刷商在读者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还是暗示作者对于阅读行为的影响有限。形式主义的批评家对情感谬误的驳难，强调文本自身意义而忽略读者的感受，在研究阅读史时实在不能太当真。对于情感如何影响读者评判文学作品，新批评家认为这问题没有什么意思，但研究阅读史的人，就需要承认这样的影响存在，以审视读者对文本的受容过程，并检查读者从中演绎出意义的方式。

批评与阅读

在检核文本的影响时，阅读史家还应该警惕一种方法论的陷阱，乔纳森·罗斯称之为“受容谬误”（receptive fallacy）。这种谬误，把文本批评、思想批评简单等同于读者阐释，把批评家当作读者的代表，其实也是根植于传统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观念。罗斯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读者时，发现读者反应批评家进行的社会学调查，是基于他们设定的隐藏于文本中的假想读者（hypothetical readers）做出的假想反应，压根儿就没有研究任何真实读者的反应，除了评论家自己的感想。推而论之，这一谬误，就是假定

① McKenzie 1986, 9-10.

②同上, 14-15.

不管作者往文本里塞了什么私货，也不管评论家有选择地从这文本中读出了什么，这些都是普通读者接受的信息和作出的反应。^①这一方法论谬误，又衍生出五种错误观念，罗斯作了概括：（1）所有的文学都有政治涵义，因为这些文本总是影响读者的政治意识；（2）一个文本的影响，总是直接与它的流通量成正比；（3）下里巴人总比阳春白雪拥有更多的拥趸，因此时俗文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众的态度；（4）高端文化往往强化和接受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左右两派都认可这一假说；（5）经典巨作都是由社会精英独自界定的，普通读者要么拒绝这个经典，要么接受它并臣服于精英的观点。^②

罗斯关注十九世纪英国从事体力劳动的读者如何通过阅读文本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他对上述五种谬误一一辩驳，警醒研究阅读史的人重新思考阅读行为时，不要有意识形态预设，要重新思考文本的社会效应，俗与雅的对立，经典化，以及文本、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个文本可能富含意识形态的内容，阅读过程可能也有，但并不意味着它会主导阅读行为，更不意味着读者认同它。即便意识形态主导阅读行为，读者本质上仍然是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他的意识形态可能与文本中蕴含的并不相同，也不一定会强化他自己预持的意识形态。读者的文化差别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也值得重新研究。

阅读与启蒙

社会科学家讨论文本的社会效应，一般假定阅读技能是文化权力、社会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个理论假设，似乎不证自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书籍和文化素养（literacy），也都基于这一假设。杰克·古迪在研究书写传统和口头传统时，对此作了充分演绎。在强调读写能力的

^① Rose 1992, 49.

^② 同上, 48.

社会里，古迪说，书写作为传播渠道，对于口头传播是补充，是修正，而不是取而代之。在书写出现后，口头传播显然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像电子媒体出现后书写仍然是基础。但是，在强调读写能力的社会里，口头传统往往会被边缘化，因为作为传播渠道，书写极大地改变了口耳相传这一途径的性质、结构、语言，特别是它的内容和功能。古迪当然相信书写传统比口头传统要高级。在思想或认知层面，书写文化比口头文化有相对优势，它能用来逐字逐句地回忆以前的内容。作为一种传播模式，书写会减少甚至消除差异，以视觉的形式把信息固定下来，白纸黑字，稳定持久，因而书面记录理论上会流垂万世，影响会持续。文本可以借助书写固定，这就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参考点。这样的文本可以部分脱离具体环境，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再次具体化。因此，作为一种传播渠道，书写利于知识有效积累。口耳相传，口诵心识，这些实质上都不稳定，都有选择性，尽管一些创造性的发明会出现，旧的东西消失得也很快。经典化和反经典化的过程，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古迪认为，也都是书写文本的衍生流变。书写提升了人类认识、理解和操作环境的能力。正因为书写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有这些优势，古迪称之为“思辨的技术”（*technology of intellect*），用来记录和储存信息，人类和写下来的话得以互动。这种技术，是其他技术的基础，是思维创造的前提。古迪进一步在社会学层面将权力与传播模式联系起来。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读写技能与权力紧密相关，在政治、职业、经济领域都是如此。欧亚大陆的主要帝国，其政治声威的扩张，总是得益于文字扩张以及图籍之储。古迪将书籍看作权力的一种重要法器，尽管它也得臣服于权力的源头。借助公共图书馆等制度设施，书籍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在这种图书社会化的过程中，没有权力的人借助它获得权力。^①

民众借书籍获得权力，技术上仍取决于他们的读写能力。1963年，古迪和伊安·瓦特（Ian Watt）联名发表论文《识字的效应》一文。^②上述古迪关于读写能力与权力盛衰的理论，这篇文章大抵都谈到了，征引它的

^① Goody 2000, 11, 155, 109–110, 23–24, 42, 54–62, 78–79, 107–108, 115, 116, 118, 130, 141–146, 151, 154–165.

^② Goody and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 见 Goody 1968, 27–68.

学者很多。此后他有修正，有引伸，有廓清，有发展，但基本观点没有改变。^① 与古迪关于识字效应的研究相呼应，伊丽莎白·艾森斯坦探讨了欧洲印刷术的起源及其重要性，认为印刷是欧洲文化、宗教和社会变革的动力；^② 沃尔特·昂（Walter Ong）则分辨了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的差别及相互关系，认为后者优于前者。^③ 关于印刷与阅读的意义，古氏、艾氏和昂氏显然都认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古氏认为，雕版印刷和古腾堡活字印刷，都重塑了传播和社会生活，不同的阅读方式（如默读、诵读）和标点体系也是如此。^④ 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反宗教改革运动，都想让大众接触《圣经》，于是试图教会更多的人识字。他还引用曾和他联名的瓦特，^⑤ 认为阅读公众的急剧扩大，尤与随着小说的兴起而出现的小布尔乔亚阶级紧密相关，^⑥ 这个阶级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和支持者。瓦特用一种典型的社会史方法来讨论读者反应，但关注的是文体或文学传统与阅读公众之间的关系。至于读写社会（literate society）中的时俗文化，古迪把它与非读写社会（nonliterate society）的口头文化生产联系起来，其作用和内容最终都依附于书写传统。^⑦ 古迪并没有解释时俗文化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还是应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和劳伦斯·列文（Lawrence W. Levine）的理论（见第九章）。古迪也没有参考书籍史和时俗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那些从阅读史角度进行的研究，比如夏蒂埃的观点。

古迪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来界定文化素养、读写能力，以及文盲和非读写（nonliterate）。有些学者使用“文化素养”这个术语，是为了表明一项具体的成就，而古迪用这个术语指书写体系的存在，指书面语，也指书写体系的传授过程。他还把读写（或非读写）社会与识文断字（或目不识丁）的个体分别对待。他说，前者是指一个书写传统存在不存在，后者

① Goody 1977; Goody 1986; Goody 1987.

② Eisenstein 1980.

③ Ong 1982.

④ Goody 2000, 7.

⑤ Watt 1957.

⑥ Goody 2000, 160-162.

⑦同上, 23-24, 100-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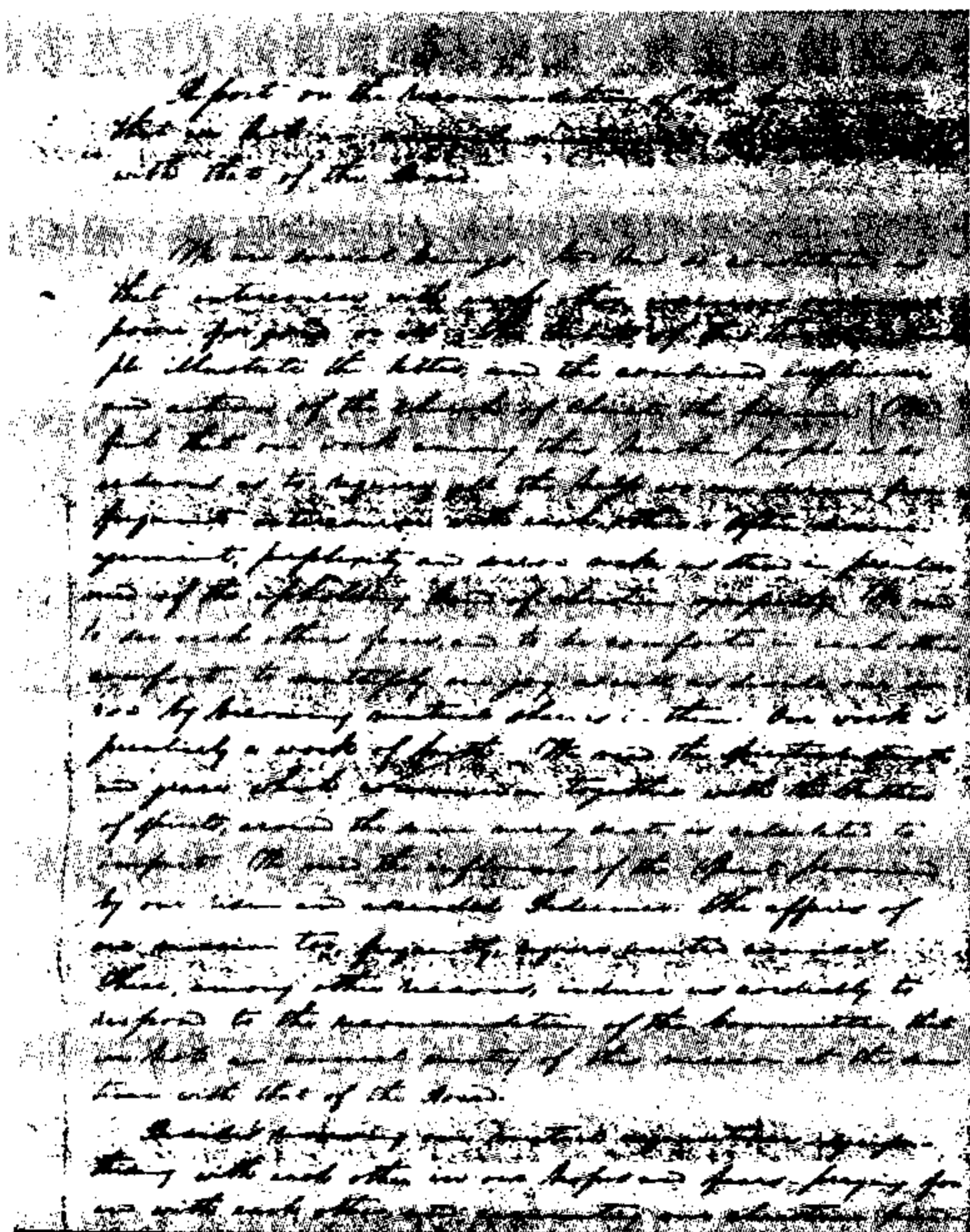


图 6-2：美国公理会差会达科塔教团报告

达科塔教团负责向达科塔印第安人传教。这份报告写于 1845 年，描述传教士培养土著人阅读能力的情形，将教会代表的读写技能视为“善”，而达科塔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不会读写，代表“恶”。养成读写能力，便是弃恶从善。取自 *North American Indian Missions Records, 1803-1883; Dakota Mission, 1844 - 1859*。原件藏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Houghton Library)(编号 ABC 18.3.7, v.3.)。经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美国公理会差会) 授权使用。

则指个体读写水平的高低。^①相应地，书写这一行为本身不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传播方式；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获取和使用这种能力仰仗的典章制度。^②尽管古迪关注文化素养的社会含义，但书籍能不能给人以力量，终究还得依赖个人的读写能力。那些不能阅读的人，是不能由书籍获取力量的。^③文化素养对于个人的价值，还真的不能脱离个人所在的具体环境。

古迪的文化素养理论是很有代表性的启蒙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读写社会控制非读写社会，文明征服野蛮，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推而演之，就有了一些目的论的研究，比如，有学者认为，文化素养（包括阅读能力）提高和书籍散布推动了宗教改革，促进了英国的民主，以及法国从旧制度到大革命的近代化进程。^④

在社会层面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促进读写传统在一个社会中确立，从宣传鼓动到少有所成，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在近代欧洲，当所有民族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有机会学习识文断字的时候，^⑤阶级、职业、种族、年龄和性别诸方面的不平等，在课堂上没有消失，反而被强化，更不要说被挑战和质疑了。^⑥重新思考所谓启蒙愚昧、光大文明的宏伟目标，反省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实在很有必要。正是因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很多人焚膏继晷、自修自励，但有幸功成名就的人终究只是少数。励志神话终究只是神话，不是大多数人的故事。

在阅读史家看来，阅读行为总是在具体场合依循特定习惯展开，而文化人类学的描述总是忽略具体的阅读环境。阅读史在方法上必须与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要承认阅读行为和阐释社群的多样性、复杂性。在阅读史研究中，识文断字与目不识丁的差别，很基本，但也容易被简单化。个体与书面语的关系，远非这个差别所能涵括。读写社会和非读写社会之间有很多层次，识文断字与目不识丁之间也是如此。阅读能力不一样，接触文

① Goody 1987, ix, x.

② Goody 2000, 132-133.

③同上，159-160.

④ Edwards 1994; Gilmont 1998; Altick 1957, 3; Allen 1991, 305.

⑤ Goody 2000, 159.

⑥ Vincent 2000, 25.

本的方式也不一样。各色各样的读者群，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阅读规范和套路，这些条条框框又决定了他们如何使用书籍，如何解读文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遵循什么样的阐释程序。而不同的读者又在阅读过程中注入不同的阅读期待和兴趣。所有这些因素，一齐决定读者怎么阅读文本，怎么抽绎出意义。表面上他们是在读同一个文本，但抽绎出来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千差万别。^① 识文断字的人不一定能读某些文本，目不识丁的人也可能掌握书本知识，也可能更倚重书本。夏蒂埃说，在法国旧制度时期，书面材料在文盲的精神生活中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在祭仪、公众场合和工作场合都有出现。借助人际交谈和图像，即便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文盲也可以接触白纸黑字的材料，参与社会活动。^② 事实上，在欧洲传统社会里，读的能力是与写的能力分开培养的。不会写的人可能会读。^③ 这就是说，单一的识字率，对于评估普通读者接触和熟悉书面语的程度，并不可靠。^④ 因此，古迪的文化素养理论，也可能被误用，成为“文化素养谬误”（*literate fallacy*），这也是研究阅读史的人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小心回避的一个陷阱。

文化素养反映了社会状况，反之亦然。读写技能在阅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决定阅读过程和阅读方式，也不预设阅读的社会效应。阅读会开启民智，但也会钳制甚至奴化人的思想。因此阅读的历史，并不是线形的思想启蒙史和民主进步史，而是呈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多样性。^⑤ 一味尊崇启蒙说，研究会陷入目的论的困境。

藏书与阅读

还有一个方法论错误，就是“目录学谬误”（*bibliographical fallacy*）。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应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文本

①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3.

② Chartier 1994, 19.

③ Spufford 1979; Spufford 1981, 19-44.

④ Chartier 1987b, 343-344.

⑤ Raven 1998, 286-287.

生产和受容。年鉴学派统计孤立、静态的目录学信息，以描述社会变动。目录学元素成了他们的基本史料。^① 为了回答“谁读了什么”这样的问题，阅读史家倚赖目录搜集材料，考察书名篇名、文体、发行量。他们还参考目录学对于文本物质形态的描述，以探讨阅读习惯和方式。因此，法国的阅读史家都会仔细检核各种各样的图书书目，包括公证人员开具的财物清单，印刷商和出版商编定的目录，估量图书的流传和阅读习惯的变化，目的就是描述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在经历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的迅速发展后，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样的原始材料很多，量化处理当然很重要，但过于仰赖目录，会导致将阅读习惯、文化差异简单地与书籍持有关联起来。^② 这种目录学谬误的潜在逻辑是：一本书写成了，出版了，保存了，那就说明被人读过了，认同了；逆推而论之，读者想什么，感受什么，我们检查一下他收藏的书，读过的文本，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这样的假设，很显然是有问题的。历史环境变动不居，各色读者都有不同的规范和套路引导他们阅读，任何一个文本，没有任何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读者再造文本，从中抽绎他们自己的意义，与作者、出版者的意图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籍史也是阐释史。^③ 麦肯锡从目录学内部辩驳目录学谬误。根据他的物质形态表述意义的理论，要考察文本或书籍的历史，关键不在于对书籍的出版和印刷趋势作量化分析，而是要探讨书籍不断变化的物质形态（或目录学元素），因为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它们也具有表达功能。因此，就像夏蒂埃说的，接触印刷品，不能简化为单纯地持有书籍；读者读过一本书，并不一定就是他本人持有；他家里保存的印刷品，也不一定就是书；他家里有一本书，并不代表他读过，不代表他认同这本书，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他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法。^④

德·塞托和麦肯锡提出的理论，以及阅读史家应该避开的方法和理论

① Hall 1996, 30-31.

② Chartier 1999, 269.

③ Allen 1993, 319.

④ Chartier 1994, 19; 亦见 Chartier 1987b, 343-344.

陷阱，分别从正反两面进一步划定了阅读史的学科界限，确定了其学科规范。按麦氏的说法，意义是协同生产的结果。作者意图，物质形态，读者期待和兴趣，不同阐释社会中的阅读规范和套路，阅读行为发生的具体场合，所有这些都将在读者世界和文本世界的交会中发生作用。尽管阅读的历史，必定是书写物体与读者留下的印迹联合造就的历史，^①我们在对待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和读者的痕迹时，还是需要综合文本批评、目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分析文本以辨清它的结构、主题和主旨；查询目录以别书籍之真伪存佚及其物质形态；历史分析则关注读者接触书籍及其物质形态，然后从书籍中创造意义所遵循的方式。^②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所有阅读史家都能熟练地应用这十八般武艺。大多数人还是仅仅基于他们能收集的材料作研究，方法也有所偏重，要么是文本批评的独门，要么是目录学的秘传，要么是历史学的绝技。研究背景不同，问题不同，方法当然也不一样，这就成就了阅读史斑驳的学科风景。

①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

② Chartier 1994, 2-3.

取材第七

关于阅读史的史料，迄今还没有专门的总结文字。我在这里胪列的种种，来自几篇重要的研究综述，以及经眼的一些研究，它们对史料的开掘和使用都有代表性。这些史料，学者们认为有用，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回答阅读史的一两个问题，譬如谁读，读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读，为什么读，诸如此类。这些史料有长处，局限也不可避免。为了理解这些史料在阅读史研究中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尽可能挑出一些样板，就其取材作简单的说明。

1986年，丹顿发表《阅读史初阶》，针对阅读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列出了一些相关的史料类型。对于“什么时候谁读什么”，可以基于长期累积的系列史料作宏观的分析，比如法定呈缴记录、图书专营许可记录、法国的《法兰西书目》（*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年刊、德国的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书展目录、英国出版同业公会档案；微观的研究，则可基于私人藏书目录、财产清单、图书馆借阅记录。至于“在哪儿读”和“什么时候读”，丹顿似乎更倾心于视觉史料，用来探究阅读的具体场景。

有助于回答“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史料，能留存下来的都是例外，不系统，也很分散。丹顿把这类材料分为五类：（1）关于阅读的描述，见于小说、自传、书信、绘画、书籍广告、查禁报告，它们能透露当时阅读中的物质因素、阅读观念，也能说明读者怎么读书。（2）文化素养史（*history of literacy*）和教育史，可以揭示阅读技能如何传授和习得。（3）读者留下的边批，还有词汇列表和脚注，可能是我们理解普通读者阅读经验的线索。

（4）读者反应可以显示他们如何从文本中推演出意义。丹顿就这第四类没

有提供相关的例示，但读者来信无疑是其中的大宗。他自己曾经参考读者来信探讨一个叫让·兰森的人如何读卢梭的《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①（5）像分析目录学那样检验一个文本的物质形态，可以推断读者阅读这个文本的方式。^②

在实践中，阅读史家更倾向于针对具体的问题搜集材料。乔纳森·罗斯在研究十九世纪英格兰工人的阅读行为时，主要使用自传和回忆录。^③大卫·艾兰（David Allan）研究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英格兰人如何阅读和受容苏格兰启蒙思想，他使用的史料，主要是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包括私人图书馆和商业性图书馆，以探讨读者对特定作者和文本的阅读体验，及体验的特性。他把握宏观的文化现象和思想气候，也稽考私人藏书目录、财产清单、买卖文书，还有书籍持有情况，以追寻个别读者对不同文本的倾爱程度。而边批、手抄本注释和各种各样的书钞（*commonplace book*），也可以显示读者的阅读经验及独特反应。^④詹姆斯·史密斯·艾伦研究近代法国的阅读行为，认为分析历史上真实读者的阅读经验，应该基于“直接材料”而非“间接材料”。他说的间接材料，包括教堂结婚登记册上的签名、学校注册人数、出版记录、文学批评模式等等。所谓直接材料，包括读者对经典作品的反应，重要作家的阅读经验，普通人的私人记录、日记、自传、回忆录，乃至逸闻趣事，甚至书评、读者来信、育儿经等。艾伦承认，任何证据对于阅读史研究都不是完美的，每一条都必须小心权衡，与其他史料比勘校正。^⑤

所有关于阅读经验的直接史料，都是读者的自状。这类原始材料都是偶然留存的。阅读经验因人而异，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因此，阅读史家，不得不首先由泛泛而论转而注重阅读经验的特殊性，回过头来再揣摩个别阅读行为对于总体的历史描述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个体的阅读行为当然是

①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Darnton 1985, 215-256.

② Darnton, "First Steps..." [1986], in Darnton 1990, 159-182.

③ Rose 1992, 51-52; Rose 2001.

④ Allan 2003, 92-113.

⑤ Allen 1987, 276-280.

文化陶冶的结果，但很难简化为文化的规范行为。^①任何原始材料都不能放过，必须寸积铢累，即便它们有明显的瑕疵。

罗斯在一篇综述中分类罗列了阅读史研究使用的史料。^②我在这里罗列的类别，大抵借鉴了他的一些说法，但我补充了三类：小说描写、读书指南、各种目录尤其是指导性目录。这些不同种类的材料，能够回答不同的问题，涉及阅读技能培养和行为规训、书籍持有与流通、个体读者体验、阅读痕迹、文化与社会认同，以及思想钳制与文字狱。这一章围绕这些问题来评述各种史料的长处与局限。

培养与规训

教育是培养阅读技能和规范阅读行为的主要途径。教育机构档案，里面有很多材料显示学生学识字的过程和阅读习惯。教学法方面的史料，可以揭示阅读经验的特性，展现它在整个教育阶段如何得到发展，以及如何要求学生阅读什么样的文本。但这类史料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学生实际上如何阅读文本，也无法廓清他们到底学会了什么，课堂行为与课外活动也不甚了了。^③

读书指南是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教育的延伸。它讲读书法，教人如何读书，如何写批注，十六七世纪盛行于欧洲。借助这类指南，可以部分厘清读者在接触一本书时有什么样的期待。尤金·金艮（Eugene Kintgen）认为，阅读指南其实是阅读策略总汇，时间一长就成就了阅读习惯，在阐释文本中具有指导作用。阅读指南也有助于在外在历史环境和个人特性之间建立联系。^④金艮说的策略，是借用了乔纳森·卡勒的阐释策略理论，也就是阅读文学作品遵循的规范（见第二章）。^⑤金艮进一步把这些规范分成两

① Raven, Small, and Tadmor 1996, 15.

② Rose 2007, 596–599.

③ Allen 1987, 279–280.

④ Kintgen 1990, 4.

⑤ Culler 2002 (1975), 118.

种：目的论规范（teleological convention），以目的为导向，属于方略层次；操作性规范（operational convention），以过程为导向，属于技能层次。目的论规范用来明晰什么才是社会可以接纳的解读，操作性规范则告诉读者怎样达到目的。^① 阅读指南当史料有一个问题。这类指导性的小册子并不会揭示特定时期的所有阅读规范，而且只能用来复原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遵循的规范；另外，与这种规范有关材料，也都针锋相对：有支持提倡这种规范的，也有反对的。某种特定的阅读策略得到提倡，这说明有人能遵循它；但如果不得不提倡，这就表明有很多的人，甚至大多数的人，并没有依循被提倡的规范。^② 这是阅读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

持有与流通

财产清单，可以用来统计书籍持有和流通，但不能说明书是怎样读的，甚至连一本书有没有人读过都不清不楚。威廉·吉尔摩（William Gilmore-Lehne）使用这类材料，重构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佛蒙特州读写技能之培养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推动书籍和报纸流通得更加频繁。^③ 在使用私人书籍目录方面，法国学者更有成效，他们对大革命以前书籍持有在社会和地理层面的分布状况研究得很透彻。^④ 但是，财产清单也会误导人。在欧洲，人死后经过公证的财产清单，还有拍卖目录，这些文件只是一小部分人留下的，其中的书籍当时都被视为贵重物品，或者是要公开拍卖的长物。这些文件本身并没有表明其中开列的书是怎么读的，又有哪些书是借来的。另外，分析这些清单，还会导致牵强附会，将文化区分与社会分层简单地对应起来。^⑤ 与中国传统士大夫、藏书家留传下来的私家藏书目录不一样，历史上欧洲和北美的财产清单主人可以是神职人员、贵族、富裕的中产阶级，

① Kintgen 1990, 3-4.

② 同上, 13.

③ Gilmore-Lehne 1989.

④ 比如 Chartier 1987b, 184-202.

⑤ 同上, 184-185; Chartier 1999,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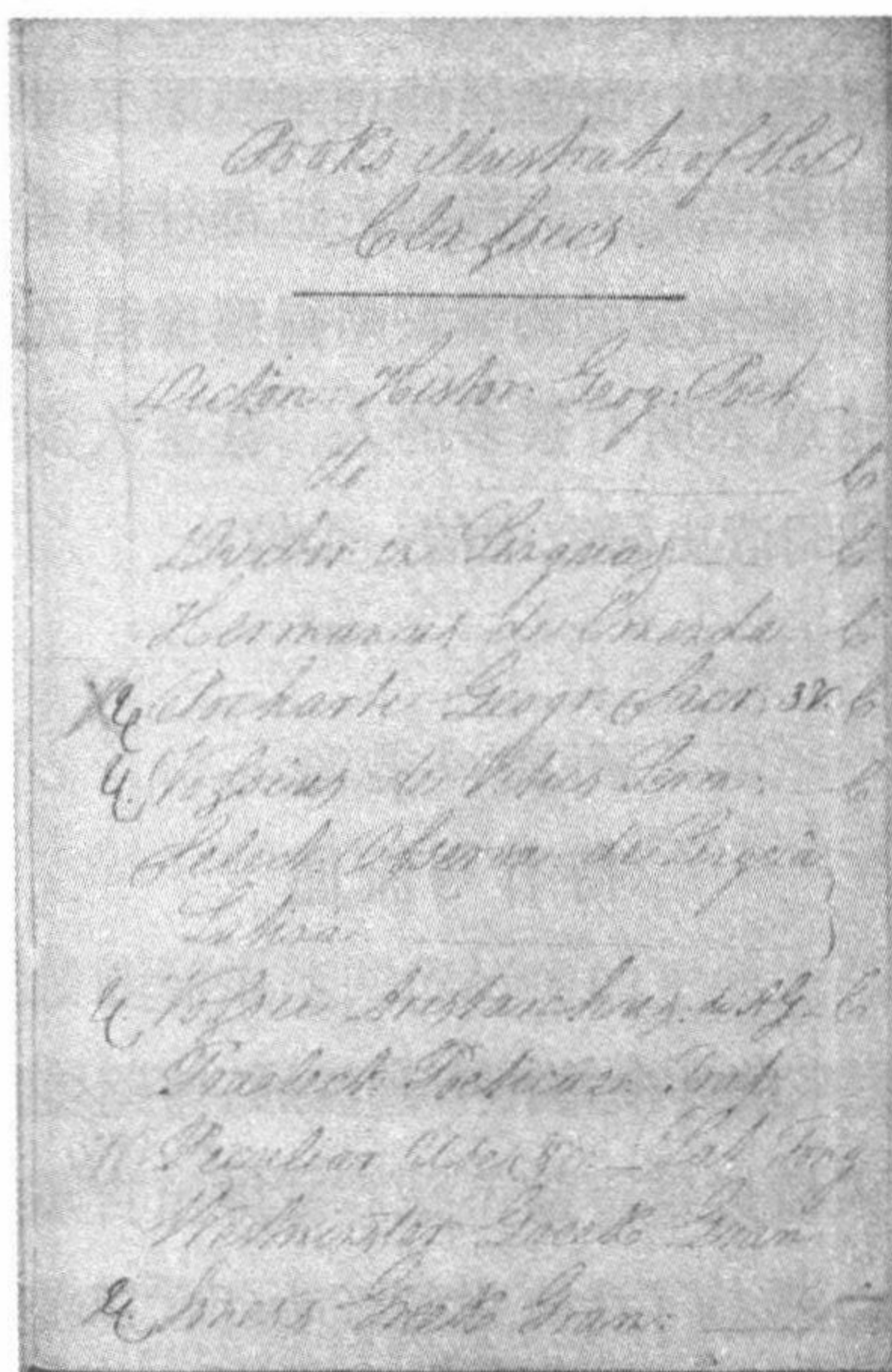


图 7-1：华兹华斯私人藏书目录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的私人藏书目录可以反映他的阅读范围。该目录中有一个书单，开列他朋友柯勒律治 (Samuel Coleridge, 1772-1834) 借走的书。私家藏书互通有无，就可能形成一个阅读社群。本图展示的是其目录中“古代经典类”第一页。取自 William Wordsworth, *Library Catalogue: Manuscript, 1829*。原件藏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编号 MS Eng 880)。

甚至工匠和其他手艺人。现存的中国私家藏书目录，其数量和编写质量都不足以支持全面统计分析历史上的书籍持有和流通状况。欧美的财产清单也是如此。

图书馆借阅记录，能显示书籍的借阅人次，谁借了什么书。有阅读史家借用图书馆史的研究成果，以描述特定时期某一地区的阅读行为，以及书籍的流传情形。^①现在，求新的图书馆史家也往往把借阅名册放在历史和社区背景中考察，也有一些学者试图把图书馆史与文化素养史、阅读史联系起来，以考究历史上的图书馆在真实读者中产生的效应。哈维·格拉夫（Harvey Graff）在研究十八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图书馆的使用情形时，就提出了这样的跨学科方法，使得文化素养史、阅读史和图书馆史三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难以根据传统学科来描述、界定。他使用的史料中，有自述性质的文字，比如日记、自传、回忆录，等等。不同地方的人，如何在图书馆接触印本书籍，如何对借读的书作出反应，如何应用书本知识改变他们的生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得到鲜活的描述。这些关于个人阅读经验的描述，各色各样，满是讽刺、悖论和矛盾，对学术界的理论概括和争论，自然既有挑战，也有印证。^②历史上的读者，他们的阅读目的和行为千变万化，书籍的意义也就不一而足。

各种目录，在二十世纪早期，是书籍史专家和阅读史家依赖的主要史料。年鉴学派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书籍的生产和消费，揭示了欧洲印本书籍自十五世纪以来总的趋势，譬如：拉丁文书籍式微，而民族语言的出版物增加；宗教出版物逐渐淡出阅读公众的视野，世俗出版物则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的读书生活；阅读不再是神职人员和贵族专有的技能，很多贩夫走卒、乡民杂役也都识文断字。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揭示世界”（demystification of the world）的过程。阅读如此普及，已经成为书籍史专家和阅读史家的共识，他们立论的材料，就是各种目录。^③

这样统计分析目录中的条目，是计量史学在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中的

^① Graff 1991.

^② Darnton, “First Steps...,” 见 Darnton 1990, 161, 164.

^③ 同上。

应用；又延伸到书籍和阅读的社会史阐释。这是法国人的发明，六七十年代主导了法国这个领域的研究。这样取材当然是有问题的。首先，经济史和社会史关注的不是书，而是书后面的人和社会；其次，它们可以描述宏观的历史变化，但到底解释不了历史上真实的读者是怎么读书的。^①

体验与描述

回忆录和日记，都有关于阅读经验的记录。这类史料中，文人雅士留下的自传文字总是比其他人要多些。英国学者似乎对这类史料情有独钟，专门将自传和回忆录汇编成册，以供阅读史研究之需。^② 大多数日记都属私人档案，其中有对各种文本的思考。阅读史家检视个别读者的阅读行为，并把有关记录与其他历史细节结合起来，以便将个体读者的经验置于社会背景之中来考察。^③ 但是，回忆录和日记都有缺陷，其撰写动机会扭曲事实，甚至彼此矛盾，不一定代表它们的作者对于书籍的真实反应。有很多回忆录和日记甚至根本不提阅读，尽管大家都知道它们的作者其实是读书的。阅读是一项重要的谋生技能，但正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人们往往觉得它不值得一提。对于所有出版的私人记述，不管里面有没有提到阅读行为，历史学家都不能只从字面来理解。^④ 另外，由于这些私人记述都是一己之见，一己之得，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得问问这些文字的来历，检验一下其中细节的可信度。^⑤ 要是有些记述近乎小说家言，其代表性就说不准了。^⑥

口述史（oral history），当然只是对研究晚近的历史有用。典型的利用可见于李昂斯（Martyn Lyons）和拓克萨（Lucy Taksa）的研究。他们亲自采

① Chartier 1987a, 302–307.

② 比如 Burnett, Vincent, and Mayall 1984; Vincent 1981; Rose 2001.

③ Colclough 1998, 21.

④ Allen 1987, 277–278.

⑤ Raven 1998, 279.

⑥ St. Clair 2005, 9.

访了在世的六十名老人，重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人的阅读习惯、对书籍的态度以及书籍的普及程度。^①

编读往来 (letters to the editor)，这是欧美的发明。在报刊发印之前，读者来信往往经过编辑挑选、修改，有些甚至就是编辑自己写的。因此，这类材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可靠。大卫·诺德研究新闻和公共社区的关系，很幸运地接触了一批没有刊发的读者来信，都是原始档案，没有编辑动过手脚。^②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编读往来在刊出时也叫“答读者问” (answer to correspondents)。当时很多大众化的周刊，都有这样的栏目，专门用来回答读者提问，或者讨论读者来信中提出的议题。^③ “答读者问”和其他类似的材料，都源于西方近代报刊业。

书迷来信 (fan mails)，就是读者写给作者的信，实际上是现实中的读者对作者文本作出的反应。使用这类史料的，往往是个案研究，专门讨论一个特定的文本对真实读者的影响。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丹顿研究让·兰森如何阅读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艾伦在研究近代法国的阅读行为时，就考察过 1400 名读者给著名作家的信，有给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的，有给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的，有给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的，有给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的，等等。有很多读者是这些作家的朋友，或者彼此熟识，但也有很多读者根本不认识作家本尊。其中，有 678 名读者在信中讨教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作家，或者如何出版作品。不论是哪种情况，艾伦都认为，读者如此现身说法，透彻地展示了他们真实的阅读体验，比所有刊发的文学批评都深刻、鲜活。^④

图像资料。图像可以透露文本无法表述的内容。不论亚洲还是欧美，都有很多的画是描绘读者和阅读行为的。收集相关的视觉材料，艺术史家做了很多努力，但他们的阐释往往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不是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更没有从阅读史来考察。^⑤ 艾伦认为，在十九世纪，许多法国人

① Lyons and Taksa 1992.

② Nord 2001.

③ Gerrard 1998.

④ Allen 1991, pt. 2.

⑤ Stewart 2006.

借助阅读把自己与其他行业的人或其他家庭区分开来，此后，在法国日常生活中，阅读就成了划分社群的一个标准。艾伦的依据正是杜米埃 (Honoré Daumier, 1808-1879)、方丹-拉图尔 (Henri Fantin-Latour, 1836-1904)、图卢兹-罗特列克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德加 (Edgar Degas, 1834-1917)、雷诺阿 (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 等人的绘画。^①

和艾伦不一样，夏蒂埃对于揭示图像的阅读史内涵很谨慎，也怀疑画家作画的动机。譬如，他认为，十八世纪的画家，常常画农户一大家子在冬夜围坐，听父辈朗读《圣经》，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崇尚这类家庭阅读活动，不过是城里人怀念以前的阅读方式罢了。对于文化精英，画中的阅读行为，只是表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书是受人敬惜的，权威是受尊重的，当下城里人的阅读习惯简直不值一晒。^② 夏氏认为，这样怀旧，这样理想化地表现农户的生活，在当时好学的精英人物中很普遍，他们觉得大家一齐读书，是在营造一个无所隐藏、知识共享、敬重书籍的世界；十八世纪的城里人则不同，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读，随心所欲，信手乱翻。^③ 夏氏还就如何利用图像研究阅读史作了示范。在描述十八世纪法国人的私密阅读 (private reading) 时，他逐一细究图画中的各个元素，譬如人物、书籍、书架、藏书室、阅读时的姿势，乃至家具陈设，等等。他发现，在以男性为主角的人物画中，书的作用是有变化的，起先是烘托主角的地位，显示当时他们的职业在社会上很受尊敬，后来又成了这些人远离尘嚣、孤处一隅的良伴。在以前，书是一种陈设，要是有成架的书，或者有间专门的藏书室，那主人一定学识丰富，声望高著；而到了十八世纪，阅读行为本身成了肖像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以具体展现读者和书籍之间的紧密联系。画家也在画中加入适当的家具，强调阅读方式；它们的功能，是为了使阅读看上去更像正经工作，而不是消遣。^④

小说描写。艾伦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参考了法国小说中有关阅读行为的

① Allen 1991, pt. 2.

②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6.

③ Chartier 1987b, 228.

④同上, 221-222.



图 7-2：法国贵族夜读《圣经》图

在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家庭在晚饭后会聚在一起读《圣经》，老少尊卑，都得到场。男主人拿着书，自己决定读哪一段，并简短解释答问。因此，阖家读《圣经》，既是宗教礼仪的要求，也是父权的体现。有些普通农户也有这种夜读习惯。原题 *La Lecture du soir*，刊于 Rétif de la Bretonne (1734–1806), *La Vie de mon père* (Paris, 1779)，第二册首页。原本藏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编号 FC7.R3135.778vaf)。

描写。他分析了小说中的读者形象，尤其是成长小说（*roman de formation*）中的读者形象。巴尔扎克、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笔下的人物，根据艾伦的说法，都是遵循同一模式，通过阅读成长起来的。在童年，这些中心人物通常喜欢独自读书，抵制各种制度性的约束。年少气盛的时候，读的书多了，便滋长志向和雄心；在司汤达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里，于连就是《圣经》、卢梭和拿破仑的文字熏陶出来的人物。人成熟稳重后，读书就成了折衷现实、认识自己的一种手段。^①和视觉材料中的描画一样，文学作品中的读者和阅读行为也需要审慎使用。我们在引用前，应该考察作者的动机，检查叙述人对其中人物阅读行为的描述，斟酌一下这样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社会现实。

摘抄与批注

书钞，这类读书笔记，汇集了摘抄的段落文字。读书做笔记的人认为这些文字重要，就摘录下来，并附上自己的想法和评论。这种书钞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最初只是一种收集格言警句并分类编排的读书窍门，后来普及，成了习道讲学的必备技能。不管小学生还是大学生，人人都得按要求做书钞；那些做学问的，更是须臾少不了这些东西。把一段文字摘抄到笔记本里，背后的动机各种各样，有的是出于对语法修辞的兴趣，有的是为了其中记录的事实，有的是因为摘抄的人觉得有用。因此，书钞大抵是代替传统的记诵，以供日后写作的参考。在十六世纪，它又进入出版业，读书人已经很少自己动手了。^②到了十八世纪早期，书钞已经广为流传，识文断字的人收藏一两本，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1676年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书钞新法》（*A New Method of*

① Allen 1991, pt. 2.

②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9.

Making Common-Place-Books), 鼓励编写和使用书钞。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1790-1850), 洛克自编的书钞就一版再版(见图7-3)。书钞记录了个体或群体的阅读经验, 并且对阅读的内容作了分类编排。书钞不同于日记, 也有别于关于阅读经验的其他记录。它之所以存在, 主要就是为了记录摘抄者的阅读所得。^① 分析其中摘录的文字, 我们就可以知道摘录者读过哪些书, 哪些段落他觉得重要, 他又怎样吸收这些文字。因此, 书钞类的材料, 可以用来复原文艺复兴时期的阅读行为。^②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 书钞被视为引文的来源。文人雅士作文, 照例会参考书钞, 借用他们熟悉的雅言, 参照他们和读者共有的文化背景, 来表述自己当下的经验。^③ 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ydney, 1554-1586)散文集《阿卡迪亚》(*Arcadia*)中的一些段落, 后来见于很多书钞。这些摘录出来的段落, 都有一定的主题。读者在做书钞时, 都重新加工编排, 甚至自创人物、生活细节和情节, 对锡德尼自己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描述反而置若罔闻。^④ 因此, 读者在做书钞时, 往往先“断章取义”, 再“偷梁换柱”。在这个再创造过程中, 读者与作者、读书与写作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尽管如此, 经过鉴定断代, 书钞可以用来准确复原个人的读书品味, 这能更进一步接近阅读本身(见图7-4)。^⑤

边批, 是读者在书页或手稿周边写下的笔记和批注。迄今所见, 成功使用这种史料的学者, 有威廉·谢尔曼(William Sherman)和希瑟·杰克逊(Heather Jackson)。^⑥ 杰克逊早期的研究, 描述了边批的模式, 分析其中的意图, 基础就是她经眼的几百种旧书。边批是一种传统的评注方式。杰克逊考察的对象, 既有小孩儿, 也有名不见经传的作者, 当然也有大腕儿, 比如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柯勒律治。她经眼的书, 种类也很多, 既有教科书, 也有传记, 还有剪贴而成的“百衲本”。杰克逊认为, 边批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700年以前, 1700-1820年, 1820年以后。1819年,

① Colclough 1998, 7-21.

② 比如 Blair 1992; Moss 1996.

③ Moss 1996, vi.

④ Brayman Hackel 2005, chap. 4.

⑤ Allan 2003, 117.

⑥ Jackson 2001; Jackson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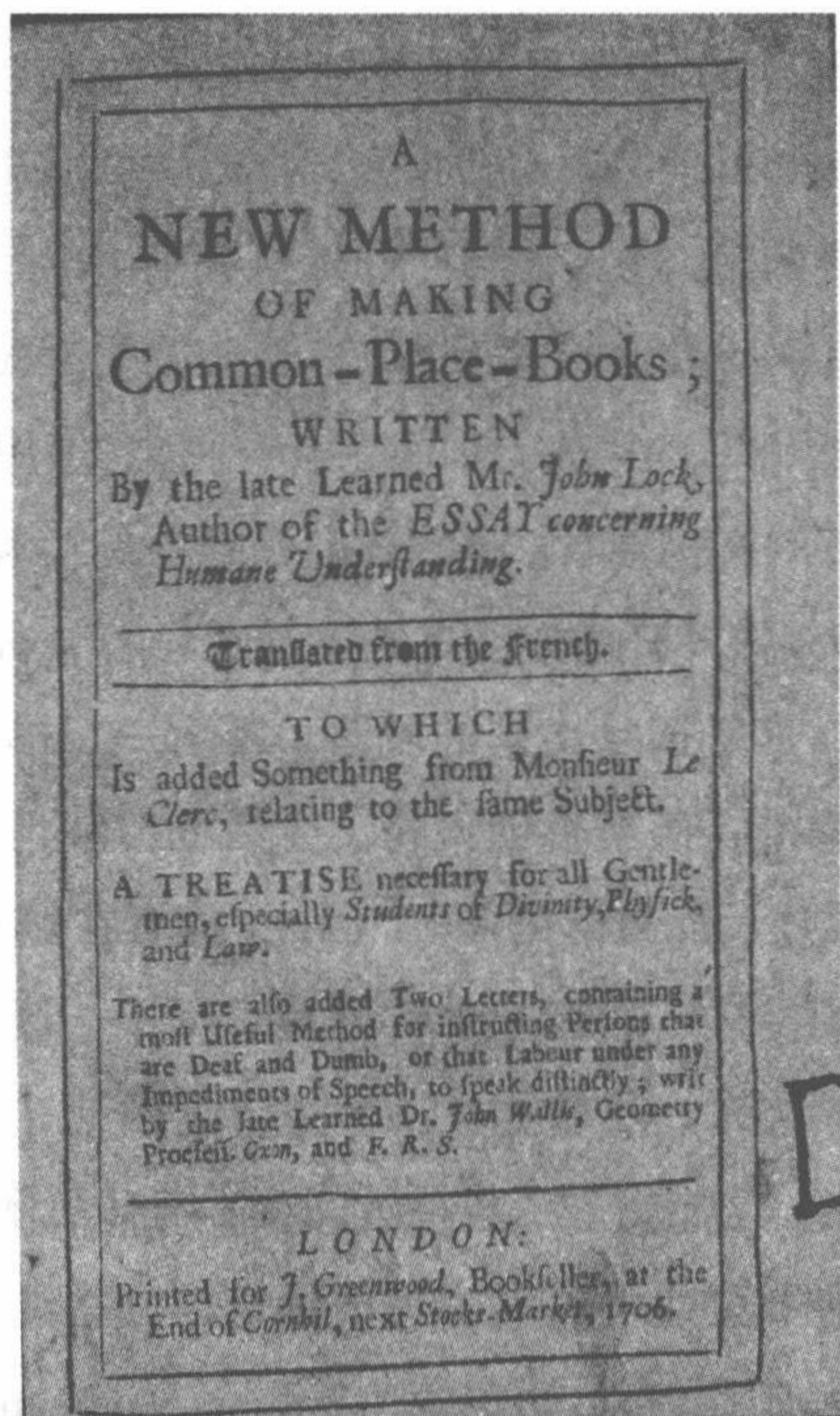


图 7-3: 洛克《书钞新法》(1706) 书影

洛克此书,原为法文,此图所示为英文译本。扉页中特地注明此书为绅士、神学院学生、医生、法律人士必备。原刊 John Lock, *A New Method of Making Common-Place-Books* (London: J. Greenwood, 1706)。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藏本(编号 EC65 L7934 706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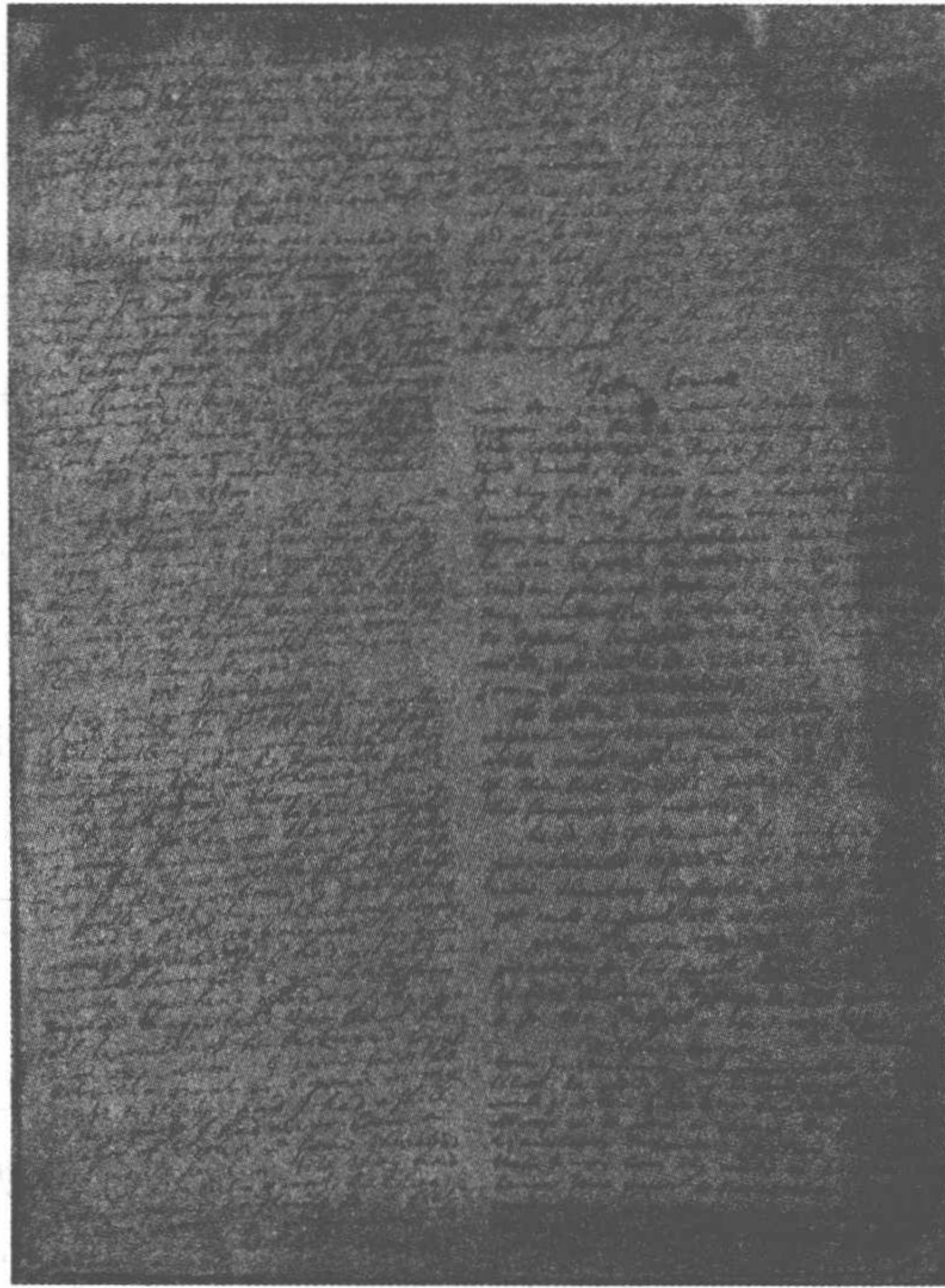


图 7-4：汉考克书钞手稿

每部书钞都是独一无二的，手稿本尤其如此。汉考克 (John Hancock, 1671 - 1752) 是名清教牧师，驻马塞诸萨州莱克星敦 (Lexington)。此页取自 John Hancock, *Commonplace Book, Manuscript (1687)*。原件藏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编号 MS Am 121)。

柯勒律治出版了他阅读托马斯·布朗爵士（Thomas Browne, 1605-1682）作品时所作笔记；此后，边批就很少出版了，^①人们对边批的看法也越来越负面。杰克逊认为，1700年是个转折点，此后书籍出版数量大增，人们也越来越容易找到书来读。也是在这个时期，书中首次出现脚注，这是编者和作者批注正文的一种方式，读者私下里模仿，结果边批大量出现。杰克逊后来的研究，转向浪漫主义时期读者在书上做的批注。她一共检查了大约一千八百种旧书书页上留存的读者注释，这些书都曾在英国读者手中流传，现在都收藏在大英图书馆。根据这些页边注释，杰克逊重建了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的阅读环境，以及读者与文本互动的模式。当时书籍出版数量急剧增长，从大人先生到贩夫走卒，都有书可读，但书籍的流通方式，主要还是亲朋好友互相借阅，因为书籍到底还是不便宜，互相借阅既实用又经济。很多读者发现，在自己读的书页上写上批注很有用，也很划算，学校的老师、周围的熟人也都鼓励读者这么做，甚至教他们怎么写批注。起先只是用笔做些记号，标记书中的观点，或者表示某处有意思，值得一读；后来用简短的话概括章节的内容，并加上关键词以示醒目，便于查找。后来边批变得更复杂，读者会仔细打量他们手头的文字，放大了看，去润色，去修饰，去改写，而且这些活动在当时都是受鼓励的。这样，读者读过的书，因了他的边批具有了个性化的特征，边批也成了学习的工具、对话的渠道、学术交流的方式（当然也可视作批驳的形式）。^②不像现在，在书上写批注，不论公共图书馆还是私家藏书，都是禁忌，是遭人鄙弃的行为。^③

阅读史家在使用边批作为原始材料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阐释边批：不管是写在书页边上，还是写在行间，许多文字和符号都是很个人化的东西，

^① Jackson 2001, 74.

^② Jackson 2005.

^③ 禁止在书上写批注，认定这样没有教养，缺乏自制力，是近代才出现的观念，起源于十八世纪英国的借阅图书馆。在借阅图书馆借书的读者，都是付了钱的，他们是借书看，而不是买下书自己藏着。这种借阅制度，确立了视书籍为公共财物的观念。1850年，英国颁布公共图书馆法，成为大众图书馆制度的基础。这个时候，在图书馆和学校等机构流通书籍，供大家阅读，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书上写写画画上不了台面，被看作违反社会公德。人们要做，也只能私下里做；于是，通过在书上写边批以分享心得，模仿交流，表现自己，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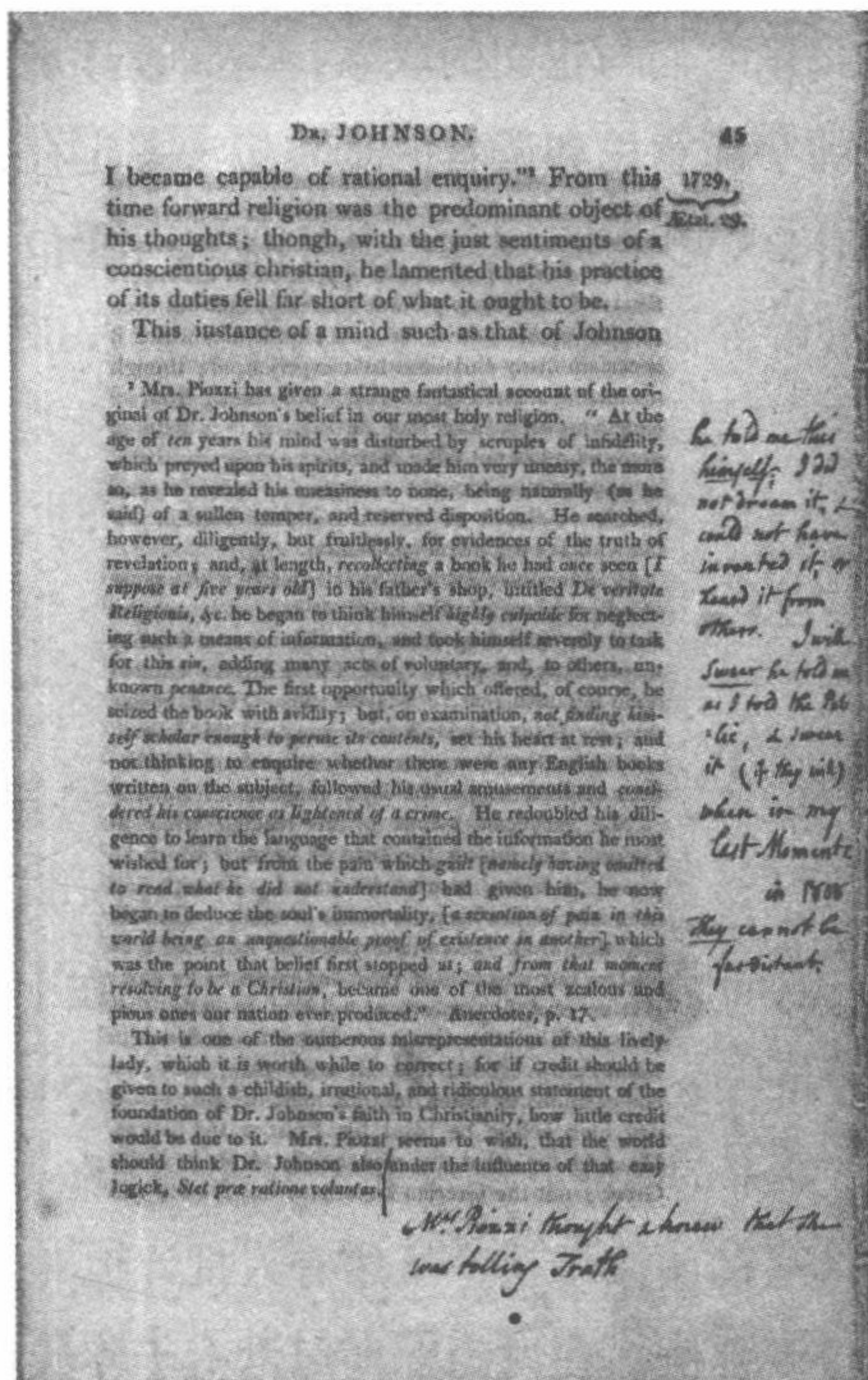


图 7-5: 鲍斯韦尔《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传》(1807) 皮奥兹太太批本

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编纂的《英语词典》曾风行一百五十年。边批是读者阅读经验的痕迹。皮奥兹太太 (Hester Lynch Piozzi) 的这个批本很典型。她和约翰逊关系密切，为鲍斯韦尔 (James Boswell) 写这部传记提供了很多材料。她的批注大多针对鲍氏使用她提供的材料而发。她买了好几本这部传记，在批注里记下约翰逊的逸事，送给朋友。此页取自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L.D.* (London: Cadell & Davies, 1807)。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藏本 (编号 2003J-TP61)。

都是读者信手随意之作，内心一闪念，就随手一画。今天怎么解释这些“涂鸦”，可就不容易了。边批的第二个局限，就是书页的边边角角空间有限，简短的批注讲求言简意赅，短小精悍，这留给后人很多想象空间。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把边批放到正文中去理解，放到读者阅读正文的环境中去理解：确定边批的年代，揭示它们与正文的联系，与阅读环境的关系，都需要下功夫。最后，边批的字面意思和读者的真实想法一定存在差距，他们在写批注时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其中很有可能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和宗教议题，等着破解。^①

文化与社会

先说两类用得较少的史料，然后再讨论如何挖掘阅读的社会属性（sociality）。

社会学调查。在欧洲，最早的阅读行为调查出现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有《苏格兰统计报告》（*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这是调查统计阅读习惯和地方藏书的情况。史蒂芬·娄威尔（Stephen Lovell）曾经研究过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阅读习惯，虽然有人批评他对真正的阅读行为着墨很少，并且论述过于浮泛。在讨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书荒”、地下书市、出版改革，八十年代开禁，九十年代衰退时，他都利用了社会学调查材料。^②

家访报告（*Canvassers' reports*），特指基督教福音派出版机构派出的书贩提交的有关阅读习惯的报告，里头描述读者喜欢或不喜欢某个文本，并解释为什么。大卫·诺德在研究十九世纪美国的宗教出版机构和其他业务机构时，就使用了这样的材料。当时的宗教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贩书体系，送书上门。这些受雇的书贩，都得经常报告宗教书籍的受容情况。^③

^① Jackson 2001, 178.

^② Lovell 2000.

^③ Nord 2004, chap. 7.

读书会 and 文学社。近年来使用这类史料的，有伊丽莎白·麦克亨利（Elizabeth McHenry）关于美国非洲裔文学社团的研究。^① 其实，文化史和阅读史专家都很关注读书会和文学社，以揭示书籍和阅读行为的社会特征。娜塔莉·戴维斯专治近代早期法国文化史（十五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曾探讨这三百年中书与人的关系。她提出了一种二重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关于受众的材料，可以显示读者抽绎书籍意义和使用书籍时厕身的历史环境，这些应该用来补充对文本的主题分析；另一方面，印本书籍，不仅是我们了解前人思想和历史影像的资源，也承载着各色的社会关系。^② 基于这样的假设，戴维斯认为，近代早期法国的清教徒采用印刷技术，是为了挑战传统等级制度下的价值观，即便目不识丁的农民也积极使用印刷品，阐释里面的文字和图像——他们对印刷品并不陌生（这与夏蒂埃的发现有些相似）。^③ 戴氏笔下的社会关系，也包括礼尚往来的人情，即书籍作为礼品馈赠亲友。^④ 书籍体现的这种人际关系，人类学家在研究阅读行为时也有论及。伊丽莎白·朗（Elizabeth Long）实地考察研究过一个读书会。在读书会里，阅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孤立的个体行为。朗氏认为，在读书会，阅读其实是一种社会参与，因为读者需要其他人作样板，需要听听其他人对所读文本的反应，需要其他人推荐书、评论书，并互通有无。^⑤ 朗氏强调，口头交流和群体互动都对阅读行为有影响。传统观点认为，阅读是极个人化的行为；朗氏修正了这个传统观点，并且证明，不论雪夜观览还是暗诵默识，阅读在本质上都是社会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

阅读的社会属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1）阅读是规范和传统的产物，一个阐释社群有大家都得服从的规矩，这个层面我们已经谈过（见第二章和第三章）；（2）阅读可以定义文化和社会身份；（3）阅读是阅读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社会协商的手段。

说到阅读定义身份，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迈克尔·华纳（Michael

① McHenry 2002.

②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见 Davis 1975, 192.

③ 同上, 225.

④ Davis 1983.

⑤ Long,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s Collective Action,” in Boyarin 1993, 180-211.

Warner)的研究。华纳比较了十八世纪美国白人和黑人的阅读行为。他认为,既然识文断字本质上是一种社交技能,阅读就不是中立的媒介,白人也不是碰巧垄断了这种技能,阅读更多地用来确定白人的身份特征——这样的身份认定,又以黑人目不识丁为重要前提和代价。^①

至于阅读作为社会协商的手段,有关研究也很多。在十九世纪,很多美国人爱看杂志上的小说,其中一个主要的动机便是社交,因为这些人渴望进入一个圈子。阅读行为曾经被认为是个人私下的体验,但帕特丽霞·欧克尔(Patricia Okker)认为,那些阅读杂志小说的人其实把这种经验当作一种社交活动。在整个十九世纪,阅读这类杂志小说,就是鼓励读者把自己看作一个大的社群里的一员,与其他的读者以及杂志编辑和作者同声共气。^②因此,印刷文化可以创立社群,维持社群,至少可以把不同的社群联合起来。大卫·诺德在研究新闻读者后,也支持这一结论。诺德发现,美国的报纸,利用其他一些社会资源和组织,建立各种社群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设想,同时打击别人的利益和愿景,为此甚至不惜利用各种偏见末论以壮声势。这里说的社群,是诺德的中心概念,指公共社群(public community),说白了就是一种纽带,用于维系社群价值观(如彼此依存、舆情、人情等)与正规公论机构(包括大都会的报纸)之间的互动。^③印刷品得以创建各种社群,正是倚赖这种整合功能。宗教出版物的社会使用也是如此。坎蒂·布朗(Candy Brown)研究了十九世纪美国宗教印刷品的传播和使用。她认为,当时出版的宗教期刊和赞美诗集,广行于世,社会上此前被边缘化的人得以进入美国的宗教文学世界,结果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读者群,他们能实时接触相同的信息,能共同讨论宗教话题。借助印刷,十九世纪美国的基督教徒就福音神学(Evangelicalism)的意义广泛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文本的社群,这对于地方教会中的社区关系是一个补充,甚至有可能取而代之。^④布朗笔下的文本社群(textual community),其基础文本在其他教派

① Warner 1990.

② Okker 2003, 160.

③ Nord 2001, 2-3.

④ Brown 2004,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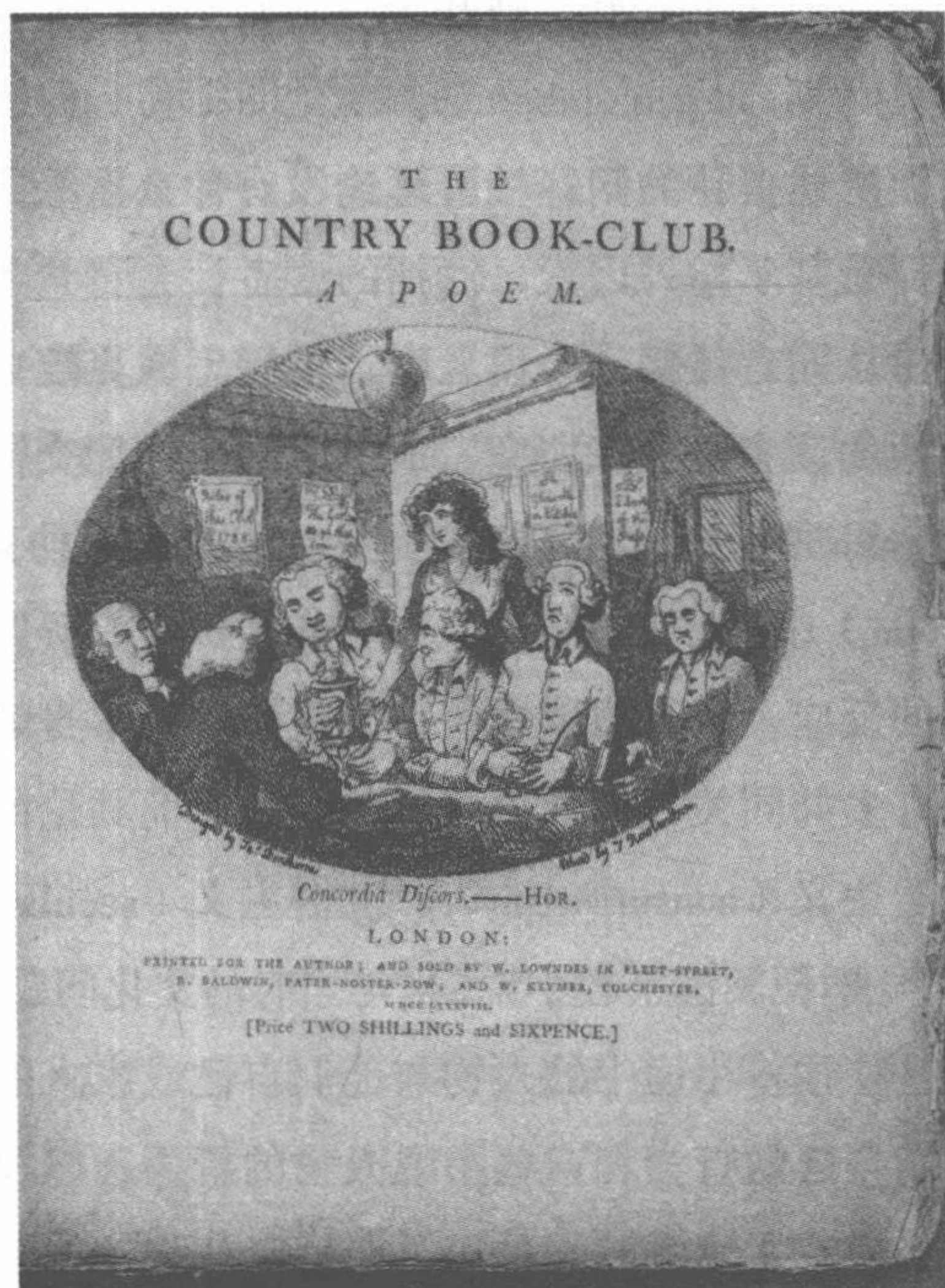


图 7-6: 十八世纪英国乡村读书会

十八世纪英国乡村读书会，有的是每周聚会一次，高谈阔论，意气风发，当然少不得酒食助兴。这种读书会，是一种文学活动，也体现了社会关怀。原刊 Charles Shillito, *The Country Book-Club* (London, 1788)。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藏本 (编号 HEW 9.7.14)。

看来有点旁门左道，所谓社群也大抵是福音派教徒的臆想，但这个概念将个人阅读经验与社会活动关联起来，二者不再毫无干系。^①

欧克尔所说社群，是基于共同的阅读经验；诺德的公共社群，有一套共通的价值观；布朗的文本社群，则基于一套非正统的文本。这三种社群观念，都是从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理论衍化来的，跟前面所述费什的阐释社群理论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它们都是学者的理论界定，是基于精神因素，涵括的读者社会背景各异，但有一致的精神和文化身份认同。任何一个读者群，不管怎么界定，都借由其成员的阅读行为与其他的读者群往来协商，成员之间也彼此交流。艾米·弗莱哥尔摩 (Amy Frykholm) 的一个个案研究就展示了这类社会协商。她调查了末日幻想 (apocalyptic) 小说“劫后余生” (*Left Behind*) 系列的读者构成以及他们对这套书的反应，认为阅读这些小说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社交手段，也是各方就许多共同关心但众说纷纭的问题协商共论的一种机制，比如性别角色、消费主义 (consumerism)、世俗主义 (secularism)，以及新兴的技术问题等等。即便阅读宗教小说，也与当时的文化问题有莫大的关系。宗教小说的读者，往往将小说中的人物与他们自己或家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而在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这些小说人物的行为，以及行为后果之间建立联系。宗教小说成了读者的一种工具，用以认识、构建和表达一些精神和社会关怀。^② 弗莱哥尔摩研究的是当代美国的一个个案，但她揭示了读者从文本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另外，在藉由书籍联系起来的阅读社群中，也存在一个想象的论坛，其中不同的阅读群及其成员可以就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对话。

阅读可以成为社会协商的手段，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的阅读行为之间就没有了差距。学者界定一个想象的读者社群，也不是简单、静态地看待社会控制 (social domination) 和文化扩散 (cultural diffusion) 现象。尽管印刷品日益扩散，持有书籍这种行为本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社会差异的一个标志；渐渐地，不同的阅读方式也成了一个明显的区分标记，对同一

^① Brown 2004, 1, 10, 14.

^② Frykholm 2004, 33, 64.

材料诸多不同的使用方式于是就被理解为不同的等级和流品。根据夏蒂埃的说法，即便在群际模仿、上行下效的机制中，我们得承认社会差异不断出现，趋同的过程中仍然有差异和竞争。正是在群际文化扩散的过程中，人们会划定新的社会差异以示群际区分。^① 在法国，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印刷品从城市流到乡村，从教士和贵族传到下层，印刷文本这个时候不再是特权的象征，一些旧的社会分层变得模糊，阅读行为本身和相关描述都显示一些新的区分已经形成。举个例子。在十八世纪，书籍从城市散发到乡村，促使城市居民寻求新的方式以区别城里人的生活和乡下人的日子：读什么和怎么读都有新的说法。只要城乡文化差异还存在，还在产生两种不同的观念和话语体系，阅读行为上的城乡差距就不会彻底消除。^②

政治与法律

法律案卷，包括文字狱档，是讨论阅读的政治和法律意义的重要史料，与意识形态和思想钳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最熟悉的例子，当然是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使用罗马教廷的文字狱档，对十六世纪意大利一位磨坊主的阅读行为进行的研究。^③ 另一个例子是萨拉·那勒（Sara T. Nalle），她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重建了十六和十七世纪西班牙卡斯泰尔（Castile）地方大众的文化素养和阅读习惯。^④ 这类文字狱审讯记录中，“犯人”常常交待自己读过什么，是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自己又怎么理解的。史学家要是对于贩夫走卒的阅读习惯有兴趣，这类史料当然很有吸引力。但在夏蒂埃看来，使用这类史料应该谨慎，因为它们认定的所谓行于时俗的阅读材料和行为，其实也体现了精英人士的阅读材料和行为，只是模式不

① Chartier 1987b, 11.

② 同上, 238-339, 347.

③ Ginzburg 1992.

④ Nalle 1989.

同罢了。^①

理论模型不同，组织史料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前面提到过，针对丹顿的传播循环模式，亚当斯和巴克爾提出了一个目录学模式，建议书籍史研究应该关注书，而不是人，关注社会对书的影响，而不是书对社会的影响。就研究阅读史而言，亚当斯和巴克爾认为，有四种类型的史料可以用来探讨人们接受书籍的过程：（1）一手文献；（2）书籍的流行程度；（3）书籍的影响；（4）书籍的使用。他们说的一手文献，包括公开出版的读者反应和未公开的私家记载。公众的反应，主要形式有书评、问答、评注，等等，这些都是公开出版的。书籍的影响和使用，这类史料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至于书籍的流行程度，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衡量：最显著的是印次和印数；不仅涵括全本原文，也应包括各种改编本和译本。在参考这种文本流播史料时，分析目录学就能派上用场，因为这类材料往往很复杂，需要仔细辨证。其中，单单是印次，不能当作流行程度的直接证据。^②事实上，他们两人开具的这四类用于考察阅读史的材料，也没有超出上述罗列的范围。各类史料都有局限。和其他史学研究的要求一样，在研究阅读史时，每得一件史料，都得小心对待，仔细参酌，认清它的特性，设计解读和使用的方法，就像得到一件石头，需要设法去琢去磨，才能把它变成玉。

① Chartier 1999, 282.

② Adams and Barker 2001, 27-28.

琢玉第八

阅读史讨论六个基本问题：谁读，读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读，为什么。其中最后两个是最难回答的，因为历史上的读者都已经死了，我们后人不可能知道他们读书时脑子里都在想什么。阅读的过程很复杂。几十年来，很多历史学家尝试了各种方法去复原这个过程。这一章，我们先概述欧美阅读史的研究方法，然后讨论如何借用英美的分析目录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阅读行为，最后再说说新历史主义在阅读史研究中的应用。文学批评理论可以提供理论工具，但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环境。阅读史研究法，不论在实践中如何权变，都是在历史框架内以书籍的三要素——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为基础。

关于“怎么读”和“为什么”，丹顿在他的传播循环模式中提出了五种途径：（1）历史上关于阅读行为的理论和假设；（2）阅读技能的传授和习得方式；（3）从自传性材料着手，再转向不太常见的史料；（4）读者对文本的反应；（5）基于分析目录学考察书籍的物质形态对阅读的影响。^①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使用什么方法，终究取决于他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取决于他手头有什么原始材料。夏蒂埃就曾经把问题和材料简化为三个彼此相关的类型——阅读、书写、文本。就这三个问题和三种材料，夏氏考察了中世纪末期（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西欧人如何管理和使用大幅增加的各种文本，包括抄本和印本。在这三百年中，夏氏认为，人们首次认识

^① “First Steps...,” in Darnton 1990, 171-185.

到作者是文本的主要责任者，首次设想囊括人类所有知识和书籍的图书馆，重新定义书籍而将其物质形态、文本和作者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变化，都改变了人与文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作者意图与读者理解之间的内在张力，也涵括书籍物质形态与文本意义的联系。^① 一般来讲，作者总是企图向读者灌输他的意图，多少有点强制、指导的性质，而读者往往不买账，甚至拧着来。至于书籍物质形态与文本意义的联系，则随着时地变迁而变化。

在实际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偏好考察个案，不大喜欢宽泛的总体研究，尤其不喜欢自以为普适天下的概念和假说，因为阅读行为差别很大，阅读群体也各不相同。詹姆斯·拉文认为，阅读史家首先得仔细斟酌一下方法，想想怎样才能认识读者受容某个文本的过程，然后逐一考察原始材料，看看它们怎样影响读者理解文本，怎样影响我们认识阅读史。^② 夏蒂埃则说得更为直接。他说，他不相信概括性的总体研究，因为这往往会掩盖文本和阅读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他倾向个案研究，喜欢对象明确的研究。在阅读史研究中，夏氏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文本差异和书籍的物质形态差异，所有的材料，包括阅读的文本，都必须在具体明确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阐释。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读者才会赋予文本以具体意义。^③

在麦肯锡提出文本社会学理论之前，在他提出物质形态表达意义假说之前，研究历史上的读者和阅读行为，主要方法是历史计量分析和纯粹的文本阐释。早先的学者都会对各种目录和书单作一番数据分析，以描述书籍的社会分配；正文以外的序跋等文字，则被用来推定作者心目中的读者群，写给谁看、什么意思，这些都隐藏在文本里——文本理解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方法，以目录学为基础，以文本为中心，将作者意图和批评家的批评等同于读者的理解，新一代的阅读史家质疑这个方法（见第七章）。

文本、物质形态、阅读是书籍的三要素。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大抵以这三要素为基础，各有侧重。传统意义上的文本，是作者经过写作过程成就的；物质形态承载文本，是出版者、印刷者通过出版、印刷手段实现的（有

① Chartier 1994, vii-ix.

② Raven 1998, 269.

③ Chartier 1989, 3-4.

时会与作者协商)；阅读则是读者针对书籍实施的行为，最终赋予物质形态和文本以意义。因此，文本可以涵括作者和写作过程，物质形态背后是出版者、印刷者以及出版印刷过程，而阅读则意味读者存在。我这样分类，并不精确，但可以将问题简化。丹顿提出的五个途径，前三个属于“阅读”范畴，第五个属于“物质形态”范畴，第四个是阅读史与文学批评的结合，跟“文本”范畴有关。

基于文本

在研究历史上的阅读行为时，如何使用文本，让·古勒莫(Jean Goulemot)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在考察十八世纪法国艳情文学的阅读状况时，就很关注文本特征，并把它和艳情书籍的物质形态联系在一起。古氏认为，十八世纪法国人读淫书的经验，事实上很能说明阅读行为的特征，或许对认识写作也有帮助。写香艳的文字，读淫词色文，多多少少表露了文学的本质。^① 这里所谓文学的本质，依照古氏的说法，就是在小说中真实地表现现实。在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大抵表现可触可感的现实存在，其读者也都有点忧时伤世，总是怀持道德理想、政治和社会批判，甚至哲学态度。^② 古氏认为，读艳情文字，其实是在窥淫，在描述的香艳场景中，读者就是窥视的人。在艳情作品中，图像很关键。图文缀合，就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这正是艳情小说吸引人的关键。读者要是没有评判能力，就不能抗拒自己想象的画面的诱惑。在其最后一章，古氏总结了几种不同的艳情写作策略。艳情作家就是用这几个招数，让读者心旌动摇：要避免滥用比喻让人捉摸不透，避免俏皮话连篇让人感觉疏远，避免中途塞进其他情节打断读者的想象。总之，叙述要直接、流畅、紧凑。十八世纪的艳情作家，除了在书名页上添加暧昧的文字和插图外，还会使用其他一些小窍门，使风月宝鉴

^① Goulemot 1994, 75.

^② Darnton 2010, chap. 3.



图 8-1: 《哲学家》扉页



图 8-2: 《哲学家》插图

《哲学家》讲的其实是法国大革命前王室、贵族和教士的荒淫生活，所有插图均直露无隐。这类艳情书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大量涌现，研究近代法国文化史的人认为它们其实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原刊 *Thérèse philosophe, Ou 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 Dom Dirrag, et de Mlle* (A Londres: 1771)。大英图书馆藏本。

里的幻象具有现实的力量，从而唤起读者的欲望。为了抹去故事的虚构特征，艳情作家往往会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精心安排故事结构，并会设计一个目击者的角色，与叙述人一唱一和，以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最终把读者拉进来，在故事中扮演窥视的角色。这些文学技巧，便是艳情文学的力量来源，也是它勾魂摄魄的地方。

古氏基于文本考察艳情文学的受容过程，特别强调叙事策略，事实上是采用了叙事学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古氏把自己的阅读与真实读者的个人体验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十八世纪法国的读者在看淫书春宫时，他们的方式可能与古氏自己的方式根本不同。这是个陷阱，研究阅读史的人，在基于文本追寻受容过程的蛛丝马迹时，都会遇到。另外，古氏发现的叙事技巧和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真实读者对艳情文学的阅读体验，这个问题很难解答。因此，在古氏的研究中，他说的读者，其实还是文本的隐含读者，本质上属于文学批评。

基于形态

在基于书籍物质形态考察阅读行为时，也会遇到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的身份难题。根据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和文本一样，书籍的物质形态也具有表达功能，也能产生意义。这个假说，已经成了阅读史研究的基本原理之一（见第六章）。如何应用这条原理，夏蒂埃有很精巧的阐发。夏氏认为，除了考虑真实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史还应该细究文本的物质形态特征。^①他说，文本与作为物体的书籍还是有差别的：所谓“写书”，作者写的只是文本，不是书；只有具备了物质形态，譬如手稿、刻石、印本之类，文本才能变成书。正是这种差别，具体地说，就是书籍的物质形态，才是文本意义得以生成的基础。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和读者反应批评，都忽视了这一点。做文学批评的人，认为文本和读者之间没有距离，不需

^①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3.

要任何中介，而夏氏则秉承麦肯锡的理论，认为书籍的物质形态承载文本，并影响读者的阅读期待。^① 在阅读行为中，读者接触的不是抽象的文本，不是与物质形态割裂的文本；在开始阅读前和阅读过程中，读者拿在手里的是书，是实实在在的物体。夏氏认为，阅读就是“读者世界”与“文本世界”结合产生意义的过程。他说的读者世界，其实相当于费什的阐释社群。而文本世界则是由文本本身、它的物质形态，以及背后的社会规范构成的，这个世界的结构、规范、制度都约束文本意义的生产。^② 夏氏强调，文本之所以存在，它蕴含的意义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书籍的物质形态。物质形态即便不能决定文本的意义，至少规定了使用文本、理解文本、拈借文本的方式，而这些方式，正是阅读史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具体点儿讲，任何著述和要表达的观点，只有变成物质的现实存在，只有出现在书页上，只有有人去读、去朗诵，或者在台上念出来，有受众，它们才存在。也就是说，研究阅读史，必须密切关注阅读和写作行为赖以实现的技术、视觉和物质条件，正是有了这些条件，码起来的字、画出来的图，才能转变成书。^③ 麦肯锡的名言“物质形态产生意义”，是我们在研究文本的受容史时，应该牢记的话。物质形态之外无文本，遑论阅读。^④

基于阅读

物质形态对构建文本意义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物质形态是产生意义的惟一元素，也没有否定文本在使用中发挥的作用。仅仅基于文本来考察阅读，我们会在字里行间和写作策略中寻找读者；只依赖书籍的物质形态，又容易走进技术决定论的死胡同。这两种途径，都忽视了真实读者主动参与构建文本意义的过程这一事实。为了避开这些陷阱，我们必须在读者身

① Chartier 1994, 10.

②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5, 276; Chartier 1994, 3.

③ Chartier, 1994, viii-ix.

④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5.

上和阅读环境中考察文本和物质形态对构建文本意义的作用。根据夏蒂埃的说法，文本稳定而物质形态有别，或者文本有异而物质形态亦变，或者文本稳定且物质形态无差，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招徕新的读者，生成不同的理解。^① 著述与观点，因为被赋予物质形态而存在；而文本与物质形态，也仅是因为有读者存在，有读者使用它们，手里实实在在地握着它们，它们才可感可触，成为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对象。

仅仅借助文本和物质形态来研究阅读行为，还会衍生其他的问题。在接触文本和物质形态时，阅读史家也会有自己的阅读预期，会应用自己的阅读规则来阐释文本，但阅读史家自己对文本的解读，应该与历史读者的解读区别对待，哪些可以等同，哪些应该隔离，其中的分寸很难拿捏（研究读者反应的文学批评家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对阅读史家来说，没有一个文本是抽象的，历史上的阅读行为也不是抽象的，它们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有特定的方式。夏蒂埃认为，读者接触文本的模式，是历史地形成的，就社会群体而言也不一样。因此，我们应该关注阅读方式（比如朗读和默读之类），特别是那些当下已经销声匿迹的阅读方式。研究阅读史，不能拘囿于我们自己的阅读模式，重要的是追寻已经被忘记的阅读习惯，探究当时阅读习惯下使用文本的方式。^②

由夏氏的主张推论，历史上的真实读者和阅读行为，比文本和物质形态本身更重要。这样，阅读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焦点，应该是历史上存在的读者和阅读行为，而不是当时的文本和物质形态，虽然文本和物质形态会告诉我们阅读可能生产什么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是怎么生产的。这种以读者和阅读行为为基础的方法，被称为“读者式方法”（readerly method）。在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中，夏氏提出的拈借理论很有影响。他把拈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提出来，是为了矫正早先两种研究方法的弊端：一种是计量史学常用的统计方法，法国的书籍史专家就曾经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版品，以描述出版史的总体趋势；另一种是语言学和符号学方法，很多学者用来

① Chartier 1994, 11-18.

② 同上, 8-9.

分析文本。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无益于解释历史上的阅读行为。^① 夏氏的拈借理论，则有助于揭示表达形式和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复杂性，否定了社会分层和文化差异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夏氏承认大众读者对文本和书籍的使用，与作者和制作者的意图有差异，而拈借理论则有助于重构产生这种差异的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以及意义的生成过程。借助这种方法，我们就能把文本、文本作者的企望与读者抽绎的意义区别开来。^② 夏氏既然把阅读定义为拈借的过程，拈借理论就可以用来描述读者如何使用印刷文本，描述书籍在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织成的社会网络，也可以揭示文本及其物质形态背后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文化联系。

三重方法

上面谈到的三种方法，分别以文本、物质形态和读者为基础。实际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当然要丰富一些。解答特定的问题，当然得有特定的方法。詹姆斯·瑟阔德（James A. Secord）研究过《孑遗》（*Vestiges*）的受容史。他把读物从印本延展到历史事件或历史节点。人们经常把阅读看作私密体验，但瑟氏认为，人们拈借和使用印刷文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阅读就是领悟和应用这些方式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史就是要研究阅读行为如何促成文化生成。瑟氏借助阅读行为来考察重要历史节点，其策略就是追溯历史上的受众如何解读和使用《孑遗》，以说明自我身份认同在大众工业社会（mass industrial society）中是如何形成的。^③ 瑟氏在重新定义了阅读之后，又把印刷文本的流传过程描述为“文学复制”（literary replication），意思是说，文学文本能像细胞一样自我复制和变异。复制本是科学研究的特征，只要试验过程和试验结果可以重复，就说明这研究是

① Chartier 1994, 3-4.

② Chartier 1987b, 6-8.

③ Secord 2000, 3, 5, 518.

可以复制的。继阿德里安·约翰斯之后，^① 瑟氏也质疑艾森斯坦的“印本稳定说”（typographical fixity）。艾森斯坦认为，机器化生产的印本，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文本与物质形态而言，彼此没有什么差异。瑟氏则认为，即使在同一个印刷版本内，文本的稳定性也很难达到。他认为，文本稳定不稳定，可不可以复制，我们只要检查一下书籍的实际制作和流散过程，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他也不认同丹顿的传播循环模式，认为这个模式把阅读史当成了印刷出版史的附庸，把阅读史边缘化了。^② 在这个意义上，瑟氏的文学复制说，是一个很开放的假说。

瑟氏仔细考察了《子遗》的各种物质形态，逐一描述不同的物质形态如何影响文本的意义。这样，他的文本复制说，其实杂糅了物质形态考察和文本阐释这两种方法。物质形态的差异，主要是出版和流传过程的产物，而文本差异则被看作物质形态变化的结果。因此，瑟氏考察单一文本的方法，更偏重物质形态的变化，而不是文本的差异。但他最终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历史节点，而不是特定的文本，因此，其最终目的是考察文化生成过程。

夏蒂埃认为，研究阅读史，应该综合文本批评、目录学和文化史的方法。^③ 书籍的三要素——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彼此关联，不可偏废。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方法。在实际研究中，很少有人能像夏氏那样举重若轻。其中，将文本批评运用于阅读史，丹顿 1986 年在勾勒阅读史的学科蓝图时也曾设想过，现在已经成了研究读者阐释文本意义过程的一个重要方法。

比丹顿早三年，艾伦就建议在历史研究中以小说作主要史料来讨论法国人的精神生活史。他假定，小说是普通读者精神世界共有的东西。对精神生活史有兴趣的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往往会误读小说，尤其喜欢把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当作原始史料来读，以为小说中的描写都是新闻报道式的文字，平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艾伦警告说，历史学家要想从小说的文学描述中抽绎出历史信息，应该考虑这些描写的文学特性和虚拟成分，需要把叙述人、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

^① Johns 1998.

^② Secord 2000, 126.

^③ Chartier 1994, 2-3.

本人，逐一区分开来。就精神层面来讲，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对话，都隐含着一些观念，而小说的主题则不能视为对这些观念的简单陈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诗人天马行空，情感丰富，语言恣肆，当然不如科学家使用的语言精确，含义稳定明晰。至于选择哪些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艾伦建议，这取决于它们的思想史价值，而不是文学声誉，因为文学声誉常常与历史学家想找的历史事实没有什么干系。和其他的原始材料比起来，小说并不完全可靠，从里面剔出来的东西必须有旁证。这就在方法论上给使用小说作史料的阅读史家带来了挑战或困扰。艾伦于是求助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艾伦认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阐释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历程，这个历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方法，文化史家和社会史家可以把文本视作一个结构主义体系，一个话语体系，或者一套密码系统，很多通行的作品都共享这样的体系，而不是像目录学家那样把文本看作一个可以描述的特殊物体。借助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社会史家可以研究历史上的读者对小说如何反应，也就是说，可以藉由文本及文学体系揭示历史上的隐含读者及其精神生活结构。即便从小说中抽绎出来的东西并不可靠，小说及其结构还是能提供一些可靠的信息。艾伦其实没有把真实读者和文本的隐含读者截然区分开来，而是寻找两者的重叠区，期望研究阅读史的人和作文学批评的人都会认可。十九世纪法国的通俗小说，作家遣词造句时脑海中都有理想的读者，讲故事时又会设想自己的听众，他们往往把这些想像的受众与现实中的读者当作同一拨人。真实读者有可能和小说作者虚拟的读者怀持相同的价值观。由于文学总是经由真实受众再创造，小说表达的世界观，总可以与真实读者的精神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真实读者就是最有可能被通俗小说弄得五迷三道的人。事实上，一部作品越流行，它的真实读者就越可能五迷三道。在艾伦看来，阅读行为的主观性给研究方法造成的困惑，是可以解决的，着手之处是读者的预设观念而不是文本，是阅读群体的文化传统。即便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可以在历史背景下揭示普通读者的精神世界，艾伦又提醒说，做历史研究的人，脑子里还是得有根弦儿，意识到小说的文学特质，把小说当小说看，从小说里头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得经受其他材

料的检验。^①

通俗小说没有什么复杂的叙述技巧，但读者需求巨大。艾伦小心寻求真实读者与隐含读者的重叠，这或许可用于研究通俗小说的读者，但似乎难以推广到其他文学作品的读者研究。另外，艾伦也没有定义他笔下的“通俗”、“流行”是什么意思；只要一部小说发行量大，他就说这部小说很流行，很通俗。他还假设，通俗小说（还有时俗文化）更准确地反映了大众的态度，而不是精英意识。这是一个关于文本受容的观念误区，乔纳森·罗斯已经驳正过（见第六章）。

艾伦的兴趣，是精神生活史，不是读者本身，更不是阅读行为。他建议使用小说作为原始材料来研究精神生活史，但并没有讨论读者为什么要读这些小说，以及怎么读。一个既定文本的真实读者，一定要比这文本的隐含读者复杂得多。尽管有这些局限，艾伦的建议，对研究阅读史还是有帮助的，至少他提醒我们，小说中描写的阅读行为，仍然是值得甄别使用的原始材料。他从费什那里借用了阐释社群的概念，但更强调共有的阅读规范和传统。

在艾伦以后，关于在阅读史研究中如何使用小说，就目力所及，似乎没有人做过更详细的解释。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能够帮助阅读史家考察读者从文本中抽绎意义的过程，这一点没有争议。即便这不是惟一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并不是所有的阅读史家都认可将隐含读者这样的概念引入历史研究。研究阅读史的人借用费什的阐释社群概念，是为了淡化阅读的个人特征，凸显读者共有的规范和传统，这样一来，历史上的阅读行为就可以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中来考察了。夏蒂埃就是这样做的。还有一些学者，把文学批评家的理论加以改造，以适应历史研究。比如，圣克莱（William St. Clair）提出“读者自主”（readerly autonomy）这样一个概念，^②就是借鉴了艾瑟尔和姚斯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坎迪·布朗在研究美国福音派出版物受容史时，也使用了文本分析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来揭示这些宗教出版物的文本流传过程以及它们的作者、文体和语言特征，并

^① Allen 1983, 234, 235-237, 238, 239, 245-250.

^② St. Clair 2004.

与文化身份认同关联起来。^①

艾伦的建议，还有其他学者使用的文本分析和文化分析方法，以及他们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改造，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只是简单的文史交叉。研究文学的人会求助史学研究，考究作者生平、作者生活和写作的背景等等基本史实。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文学学者了解作家、作品的历史侧面，避免“关公战秦琼”式的年代错误。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强调，读者阐释文学作品都是很主观的，解读也各色各样。这个理论改变了文学学者对历史研究的需求。以前，文学学者倚赖历史研究成果来理解抄书、印刷和出版在作者创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文学研究转向书籍制作机构如何影响文本的物质形态以及读者的阅读过程。这种学科交叉，在劳丽儿·安道尔（Laurel Amtower）的研究中就有体现。安氏考察过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时代读者自主阅读的现象。她在研究中就吸收了新书籍史的方法，强调册子本制度和版式的演变如何影响作为认知过程的阅读行为。她首先用两章的篇幅，勾勒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书籍生产和收藏，认为这一时期俗世的读者越来越多，俗世与书籍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俗世读者的自我主体意识也有发展，这些在书籍插图及读者手批中都有体现。总之，僧侣不再主导书籍制作和阅读。其他三章则是基于文本分析，要传统一些。她检查了当时读者阅读但丁（Dante, 1265-1321）的《新生》（*La Vita Nuova*）和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秘密》（*Secretum*）时留下的手迹，认为当时的阅读行为都有私密、内省的特征。^②她考察的这两部作品，其读者都喜欢自己安静地阅读，都有点“宅”，因为共同喜爱的文本而形成一个阅读群体，但都倾向独立判断。在考察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和《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时，安道尔认为，乔叟实际上为英格兰人确立了阅读的文化地位，在他的影响下，阅读成了俗世读者文化抉择的一个标准途径。^③就研究方法而言，安道尔前两章讨论的是真实的读者和阅读

① Brown 2004, 17.

② Amtower 2000, 120.

③同上, 154.

行为，是书籍史关注的东西；而后面三章则讨论文本的隐含读者。安道尔借后一种读者来印证她关于前一种读者的认识，也用后一种来映衬前一种。安道尔就这样把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等同起来——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的，尽管会有重叠。

艾伦建议，小说中描写的阅读行为可以作为阅读史史料，也可以作为文本来展示其读者的精神世界。他的方法，到底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叙述，和传统思想史基于文本的方法没有本质区别。文本的意义，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的，我们可以连同历史上其他的观念、其他的史料一起考虑，发掘这文本意义赖以生成的具体历史背景和丰富历史内涵。

如何超越文学作品的局限，发掘其中多层历史意义，夏蒂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曾研究过十一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书写文化和阅读行为。他要讨论的话题，是码出来的文字怎样才能变成文学，其中自然需要一些功夫和规矩，比如各种体裁的要求，还有码字的时间和地点。^①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 1604）是以琐忆集成（*librillo de memoria*）的形式写的。夏蒂埃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解释什么叫集成。其中有十七世纪词典中的定义，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征引，有类似文学体裁的发展演变，还有十六至十八世纪西班牙流传至今的集成样本，这些材料都说明，集成实际是一种小册子，作者想起什么事情，就在纸上写几句话，然后撕下来，收集在一起，都是急就章。书中人物桑丘·潘沙在莫雷纳山那一节，就使用了琐忆集成这一种形式。^②堂吉诃德在巴塞罗那拜访了一间印刷铺子，夏氏对这一段情节进行分析，强调其中关于印刷流程的细节描写，结合阿维利亚内达（Avellaneda）《堂吉诃德》续作中的线索，他认为这些细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说创作与印刷技术、文学氛围不断互动。文学审美和印刷技术共同成就了这部小说。^③

阅读行为的本质，就是从文本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读者从文本中生产意义，又是一个复杂的精神过程。就这个意义上讲，艾伦简单地建议将

① Chartier 2007, vi.

② 同上，chap. 2.

③ 同上，42.

读者反应批评和思想史嫁接，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会误导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除了使用小说作原始史料外，研究阅读史，还应该考虑读者从文本里读出意义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具体环境中生产的，文本、物质形态、读者都应该仔细考察，不可偏废，这样才有可能认识历史上的阅读行为，了解意义生产的过程。

阅读即政治

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读者反应批评并不是阅读史家可以借用的惟一理论。新历史主义也有些市场。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谈过新历史主义如何促成了阅读研究“回归历史”，这里就其应用作进一步的述评。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都有历史特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历史有文本特征，人可以像读文本那样审视历史，也可以编写历史。新历史主义关注的论题，是文本生产与流通之于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影响所及，就有人考察阅读行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认同中的作用。基于新历史主义研究阅读史，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方法。

先说政治史方法。

新历史主义者在研究阅读行为时，往往把读者和文本放在政治文化中考察。根据凯文·夏丕的说法，新历史主义的阅读研究就是阅读政治学。他在研究罗伯特·科顿爵士 (Robert Cotton, 1571-1631) 的私人藏书时，就提出了这个理论预设。当时，夏丕的兴趣是近代早期英格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历史研究和政治经验如何互相影响。^① 他后来的研究也都关注学术活动的政治含义，试图认识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文学文本和史学文本的“政治价” (political valence)，或者说它们的政治效能。二十年后，他回头再看科顿爵士，还是强调这个理论预设。他认为，对于近代早期的读者和作者来说，了解历史就是为了拥有过去。一个文本所以成为文本，就是要有人

^① Sharpe 1979.

用它，改写它，阐释它。和法律一样，历史也是大家共有的语言，但人总是鬼使神差，对它有不同解读，至少强调不同的方面。因此，历史研究，不仅总体上受政治情势和政治问题左右，也因为政治对立和差异变得色彩斑斓。过去的事情会变成一个文本，众说纷纭。如何守护历史记录，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①科顿的学术研究活动，在夏丕看来，和地方政治、全国政治都有牵连；科顿把历史研究当作评论时事的主要方式。当时人们读史书，不是为历史研究做贡献——这是现代的学术标准——而是为了实用，为了以史为鉴，为了洗心革面，为了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科顿写历史研究文章，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凭借他的政治热忱，直抒己见，宣扬他的价值观，说他觉得重要的话。^②

阅读即政治，这样的假设，夏丕在后来的一个个案研究中又作了阐发。他曾考察过威廉·德雷克爵士（William Drake, 1723-1796）的阅读行为。这样的特定读者，也是被放在他厕身其中的政治情势中考察的。他花大量的篇幅讨论德雷克的阅读行为如何与时代危机相关联、相呼应，比如十八世纪大家都关心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前途问题。德雷克的阅读行为，总是周围环境促成的，完全是为了应对现实的需要。他的阅读行为，与其说是带有政治背景，不如说就是政治行为。他读马基雅弗利，是为了学一些政治经验，把握好政治野心，揣摩政治手腕和策略；他读古代史，读国别史，是想了解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和当时列国；他读古典哲学、古典修辞学，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著作，是为了认识宗教、道德和政治问题；他汇集、注释、引用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的名言警句，是为打磨自己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看法。^③

在夏丕的理论里，阅读中有政治，政治需要阅读，阅读本身就像政治。这些假设，除了适用于德雷克，同时代的其他人，比如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克拉伦顿伯爵（Earl of Clarendon, 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 1609 - 1674）的阅读

^① “Re-writing Sir Robert Cotton...,” 见 Sharpe 2000b, 314.

^② 同上, 333.

^③ Sharpe 200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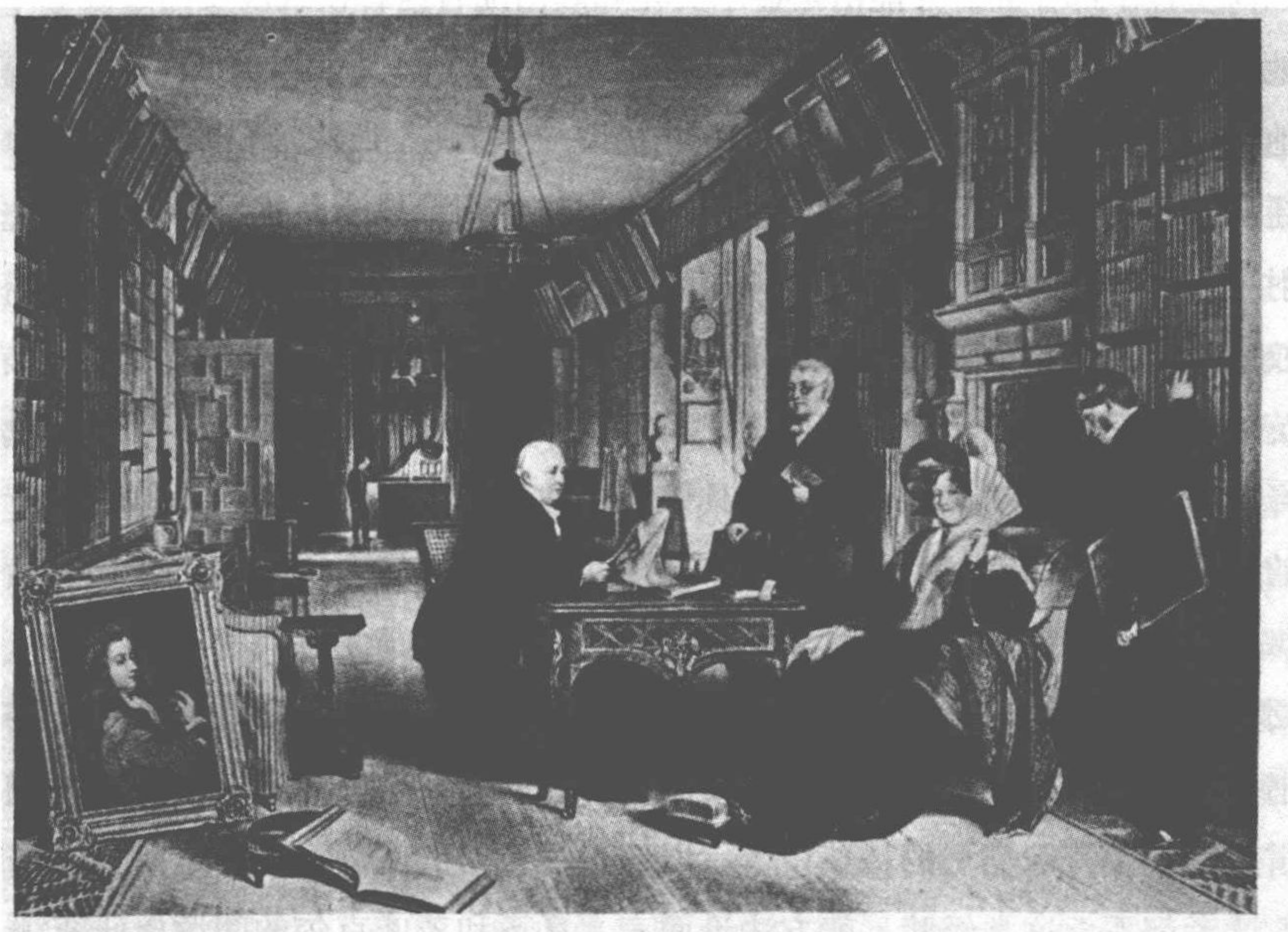


图 8-3：贺兰勋爵家藏书室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一些英国贵族会在自己的私人藏书室定期主持小型晚宴集会，讨论书籍和文学，但也经常讨论时政，逐渐形成一些有共同政治议题的精英圈子。此图左首坐的男子为第三代贺兰勋爵 (Lord Holland) 亨利·理察德·福克斯 (Henry Richard Fox, 1773-1840)。贺兰勋爵家世代为坚定的辉格党人。原为 Charles R. Leslie (1794-1859) 所作油画，收藏不详。取自 Amy Cruse, *The Englishman and His Book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30), p. 250.

行为也可以这样理解。而夏丕的本意，其实是对各种读物作历史学分析，以重构政治文化。他和斯蒂文·茨威克尔的一项研究，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个意图。^① 夏丕建议，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以考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读者如何受容单部作品，才能清晰显示文化和政治随着诠释模式演变的过程。^② 他认为，《圣经》就是一部亟待考察的主要作品，尤其是其中的《启示录》。他寻检了历代关于这个文本的笺释和边批——特别是那些带有政治意味的，还有其他作品引用这个文本的情况，认为这些阐释里满是犹疑和焦虑，映射了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心态——信仰与理性，秩序与乱象，确定与模糊，权威与自由，彼此对立又互相依存，这便是世人焦虑的根源。夏丕认为，英格兰人阅读《启示录》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英格兰史，也是一部文献阐释史，里面有成功，有对峙，有具体多样的环境，蕴含了阅读史和阐释史的许多方面。^③

作为一名新历史主义学者，夏丕关注政治史，却无意间将阅读期待和阅读动机过于简单化了。并不是所有的人任何时候都为了政治实用才去读书。图书可以娱人，娱乐也是阅读的一个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科顿和德雷克都代表特殊类型的精英读者。以经世为目的的阅读行为，东西方的精英读者都不乏这类经验。就方法论而言，夏丕和茨威克尔的阅读史研究源于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启发，但几乎不见文学批评的痕迹，并没有对文本分析流连忘返，关注焦点一直是如何整合个体读者的阅读行为与历史环境，对阅读动机开掘得很有说服力。

阅读政治经济学

夏丕把阅读行为放在政治文化中考察。威廉·圣克莱却有不同的兴趣和方法，他把图书贸易和阅读放在经济史的框架中考察，认为关于文本生

^① Sharpe and Zwicker 1987.

^② Sharpe, "Reading Revelations....," 见 Sharpe and Zwicker 2003, 122.

^③ 同上, 154.

产和消费的经济观念，是认识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英格兰文化的一把钥匙。他称自己的方法为“阅读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系统分析书籍的制作和销售，以及统辖这些环节的物质条件、技术手段和法律规定。^①为了支撑他的观点，他使用经济计量的方法，统计分析浪漫主义时期（1798-1832）英格兰图书贸易中的生产和销售。^②和传统断代不同，圣克莱把1774年设定为浪漫主义时代元年，这一年，英国上议院废除了保护永久版权的法条。1710年到1774年，他称为“高度垄断”（high monopoly）时期，书价高昂，对阅读是一个巨大强劲的限制，当时英国的保守政府不仅容许，而且多方鼓励垄断。当时伦敦的出版业，为精英阶层提供了很好的写作和出版条件，印行了很多校订过的文本，涉及哲学、科学、旅行、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领域，但书价垄断阻碍了观念传播，占大多数的穷人是买不起书的。1774年后，很多失去版权保护的书籍大量印刷、销售，书价下降，低收入的人也买得起书了，读者群就迅速扩大。1774-1808年是一个过渡期，圣克莱称为“版权空档期”（copyright window），当时有很多没有版权保护的诗歌，以各种形式印刷出版，价格相当低廉，学校买来做教材，于是产生了英格兰文学中的第一批经典。^③1808年，版权空档期结束，“版权保护时代”开始，相关法律次第颁行、修订，意味着浪漫主义时代创作的大多数作品，要等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后才失去版权保护，才能低价出售，拥有更多的读者。由于设立了长的版权保护期，浪漫主义时期实际创作的作品并不是大众实际读到的作品。除了一些例外，大众读者买得起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几十年前写的，甚至是前面好几代人的文字，这无疑扩大了作家所写与读者所读的时间差。

圣克莱的方法，本质上是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关于在阅读史研究中使用计量分析，丹顿有点不满意，他说，就图书消费作统计，可以大致显示书籍文化的总体走向，但是解释不了图书消费有什么意义。^④夏蒂埃也对源

① St. Clair 2004, 433.

② 同上，453-723.

③ 同上，54.

④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见 Darnton 1990, 252.

于法国年鉴学派的这种计量史学方法颇有微词（见第七章）。圣克莱使用这种方法讨论浪漫主义时期英国图书馆的种类，^① 考察文学评论活动的影响，^② 确实很有一些成效，但是用于清理和重现历史上精神生活的复杂和丰富程度，就有点捉襟见肘，根本不能反映实际生活中书是如何被阅读的。

在这一章，我们把当今阅读史研究采用的方法分为五种：基于文本的方法，基于物质形态的方法，基于读者的方法，政治分析方法和经济分析方法。我们也简短评说了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范例。除了圣克莱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外，其他四种都多多少少有助于揭示文本的多重意义——当然是真实读者读过的文本。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和新历史主义，研究阅读史的人在应用其中任何一种解答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问题时，需要谨记一条原则，这就是：阅读行为的本质就是抽绎意义的过程。历史上的读者都已经作古，我们不可能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但我们可以把真实的个体读者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并比较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得发现真实的读者，考察他们的阅读行为，厘清历史背景，并和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圣克莱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其实回答不了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问题，但是他一直强调，研究历史上阅读行为的效果，应该考察当时读者实际接触的读物，而不是后来的什么本子，不管这本子是后人校订过的，还是依据了什么新的标准，也不用管它是否比旧本更接近理想文本。^③ 即便仔细周全地考察了当时读者读过的书，我们还需要把文本分析和实证方法结合起来，重建历史上的阅读模式。^④

阅读行为复杂多样，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万能的理论模型来研究阅读史。但是，不断演进的特定阅读传统，以及客观存在、基于特定印刷文本的阅读行为，都是可以追溯的。在个案研究中，把阅读行为和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行的。^⑤ 事实上，以文本类型、真实读者和阅读行为为基

① St. Clair 2004, chap. 13.

② 同上, chap. 14.

③ 同上, 3, 451.

④ 同上, 401.

⑤ Jackson 2004.

基础作一些个案研究，这样的方法往往很有效。伍尔福（D. R. Woolf）考察过近代早期读者阅读史书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人们使用史书的情况，他就是把史学史、书籍史、阅读史和图书馆史糅进自己的研究，^① 中心议题涉及文本类型、图书消费（阅读）、图书收藏和借阅、出版，还有图书销售，收集了很多历史数据和材料，从1450年一直后延到1730年。他的分析是逆向的，与思想史、书籍史和阅读史的传统方法不一样。根据传统方法，从作者到读者的顺向传播容易考察，也不会引发什么问题，但这往往会抹煞阅读的多样性。伍尔福则是从不同的阅读方式入手，先考察读者个人藏书、图书馆收藏，到出版流程，最后才考察作者和图书销售商的关系。从阅读史的角度看，他的方法其实是很谨慎的。我这么讲，并不是说伍尔福的逆向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值得推广，而是想强调：真实的读者和阅读行为才是阅读史的关注中心，就阅读史而言，这要比文本分析和物质形态考察更优先。

^① Woolf 2000, 5.

著说第九

1987年，丹顿提醒同行警惕书籍史研究中闭关自守的倾向，鼓励比较书籍史研究，特别是欧洲列国书籍史的比较研究，甚至拟订了研究议题，包括阅读社群、阅读习惯、图书消费社会学，等等。^①老实讲，对任何书籍史学者来说，比较研究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应战的人必须熟悉相关国家的目录学、图书馆学、文本批评传统、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②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真正的比较书籍史，自然无法概括各国书籍史发展的共性。^③但是，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正在融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成为很多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有一些理论成果经常被其他领域的学者引用。这一章，我们摆一摆阅读史研究中广为人称引的一些成就，权当世界书籍史、阅读史发展的共性。不同文化传统，有不同的书籍文化，当然有不同的阅读模式，没有什么理论是普天下都适用的。我们要讲的，只是对大多数文化中的阅读史研究有启发的那些观点。

夏蒂埃和贾维楼（Guglielmo Cavallo）合编了《西方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一书，他们在序言中总结了这个领域的成就，都是迄今还无法超越的。他们两人提出的一些话题，很有普遍意义，比如

① Darnton 1987, 37, 39.

② 同上, 33.

③ 最新的努力，见 Towheed et al. 2011. 该书为三卷本，汇集历年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但甄选中还是带有比较史的预期。除第二卷集中讨论英伦三岛的阅读史外，第一卷和第三卷都收录了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个案研究。

阅读类型、阅读变革，还有夏氏自己的一些成果。在欧美，涉足阅读史的人来自人文科学和社会学科各个领域，我们这里只简短说说阅读史对宗教史研究的贡献。

阅读类型

阅读类型，是根据阅读场合、交流模式，或者参与的读者数量来界定的。就阅读场合而言，有公共阅读（public reading）和私密阅读（private reading）之分；就交流模式而言，有默读和朗读之别。以参与的读者数量为标准，有个体阅读和集体阅读（collective reading）之差。还有其他的阅读类型，现在也有人讨论，譬如宫廷阅读、时俗阅读（popular reading）、学院式阅读（scholastic reading）、人文主义阅读（humanist reading）、宗教阅读（religious reading）、实用主义阅读（utilitarian reading）、消费主义阅读（consumerist reading）、精读（intensive reading）和泛读（extensive reading），等等。史学家把自己研究的阅读行为标识为哪一种类型，取决于对阅读行为特性的理解以及研究目的。耳目所及，对阅读行为的描述五花八门。这里只说一组重要的两组，也是讨论最多的两组：公共阅读与私密阅读，默读与朗读。其他的阅读类型，必要时才简短提及。

公共阅读与私密阅读

公共阅读转变为私密阅读，被称为阅读的私密化（privatization）过程。最初的阅读模式，比现在当然要公开一些。人们在各种场合大声朗读，不仅在教堂和学校这样，在社交和工作时也这样。另外，阅读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经验，比如家人之间、熟人之间都会共读一本书。但这并不是说私密阅读就出现得晚。事实上，阅读在西方最早就是一种私密的活动，并且仅限于上层人士。在公元前二世纪和一世纪，罗马人把希腊人的书掳掠来，当作战利品分给贵族，成就了罗马的私人藏书。古希腊和罗马的藏书，起

先都储在私人居所，外人谢绝入内，于是藏书就成了私人居所的一部分。^①在有文字的社会，有人识字，就有阅读行为；有私人藏书，就有私密阅读。

至于把阅读和隐私联系起来，是一个很现代的观念。这一点，艾伦研究近代法国的阅读史时就讲过。根据艾伦的说法，在法国，阅读私密化到1800年才开始。在此以前，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公共活动，在教堂，在宫廷，在沙龙，在家庭，都可以见到；一个人安静地读书相对少见。私密化的起因，是阅读环境有了变化，阅读的目的也和以往不同。艾伦认为，从十八世纪起，读者越来越少地依赖图书（特别是小说）获取外部信息，更多地把阅读看成认识自我的过程。^②书的内容当然也有变化。艾伦把阅读行为的变化归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历史性变迁。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人增多，平均文化素养也有提高，印本的消费群体也跟着扩大。以前有地有庄园，才有钱读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顺应工业化潮流，进了城，也有书可读了。到了十九世纪末，教育制度改革，公立学校扩张，读者数量迅速增长；成分也多样化了，有妇女，有大兵，还有犄角旮旯来的村夫俗子。在此之前的好几百年，识文断字和掌握书籍一直是少数教界、政界和地方精英的特权，大多数人不识字，更读不了书。随着这些上层人士对书籍控制的减弱，随着识字的人迅速增多，能写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亲朋好友中总有有书、读书的人。艾伦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中借鉴了个人自由的观念，强调个人主义在阅读行为中的作用。他认为，随着文本越来越容易传播，个人一旦挣脱传统的束缚，就会益趋独来独往，喜欢找一个角落，自个儿寻求文本的意义；而此前的特权机构和权威的文本传播网络，现在只能建议读者读什么、怎么读，再也不能有予夺的大权。个体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不再是千篇一律，把贵族情怀转化成了布尔乔亚的内在道德，然后极力展示个人情感。^③艾伦由此得出结论，阅读的私密化象征着法国从旧制度经历大革命走向近代化。^④

①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13.

② Allen 1991, 6.

③同上，227, 304.

④同上，305.

贾德尔斯卡 (Elspeth Jajdelska) 则很谨慎地避开近代化之类的标签, 只是使用“新”和“旧”来描述不同的阅读模式。他研究萨缪尔·皮普斯 (Samul Pepys, 1633-1703) 的阅读行为, 用“旧”指精读、朗读、实用主义阅读和公共阅读等模式; “新”, 指泛读、默读、休闲阅读和私密阅读等模式。阅读模式从旧到新, 这个历史过程, 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都还没有彻底完成。在十七世纪, 皮普斯的阅读行为严格地遵循旧的模式, 他认为文本不是完全独立于作者而存在, 但应该像剧本一样, 由特定的人向特定的听众大声宣读, 才算文本, 才算书籍。^① 在记录自己的阅读活动时, 皮普斯很少提及隐私, 少见的例子是他在自己的卧室读艳情文字或看春宫册子。在他独自旅行时, 这种少有的私密阅读得到充分保障。^②

艾伦提出了阅读私密化的历史过程, 而贾德尔斯卡笔下的阅读模式有新旧之别。艾伦在研究近代阅读行为时把隐私和阅读联系起来, 而贾德尔斯卡在他的个案研究中试图把两者切割开来。他们都使用“隐私”这个词的近代含义, 两人其实并不矛盾。

把隐私观念和阅读挂钩, 在大卫·亨金 (David Henkin) 看来, 并不合理。亨金研究过美国内战 (1861-1865) 前纽约的阅读习惯。他考察了当时的街头标识、商业广告和政治海报, 认为当时实际上没有什么阅读是私密的。^③ 亨金指出, 把阅读和隐私联系起来, 其实是在编织神话, 把文字世界装扮成浪漫天堂。^④ 在十九世纪的纽约, 人们可能在家门里阅读, 也可能在家外面阅读, 但都不涉及隐私观念。我自己的理解是, 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 是就阅读场所而言, 分别读给别人听和自己听, 私密阅读和隐私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

① Jajdelska 2007, 551.

② 同上, 556-57, 558.

③ Henkin 1998, x.

④ 同上,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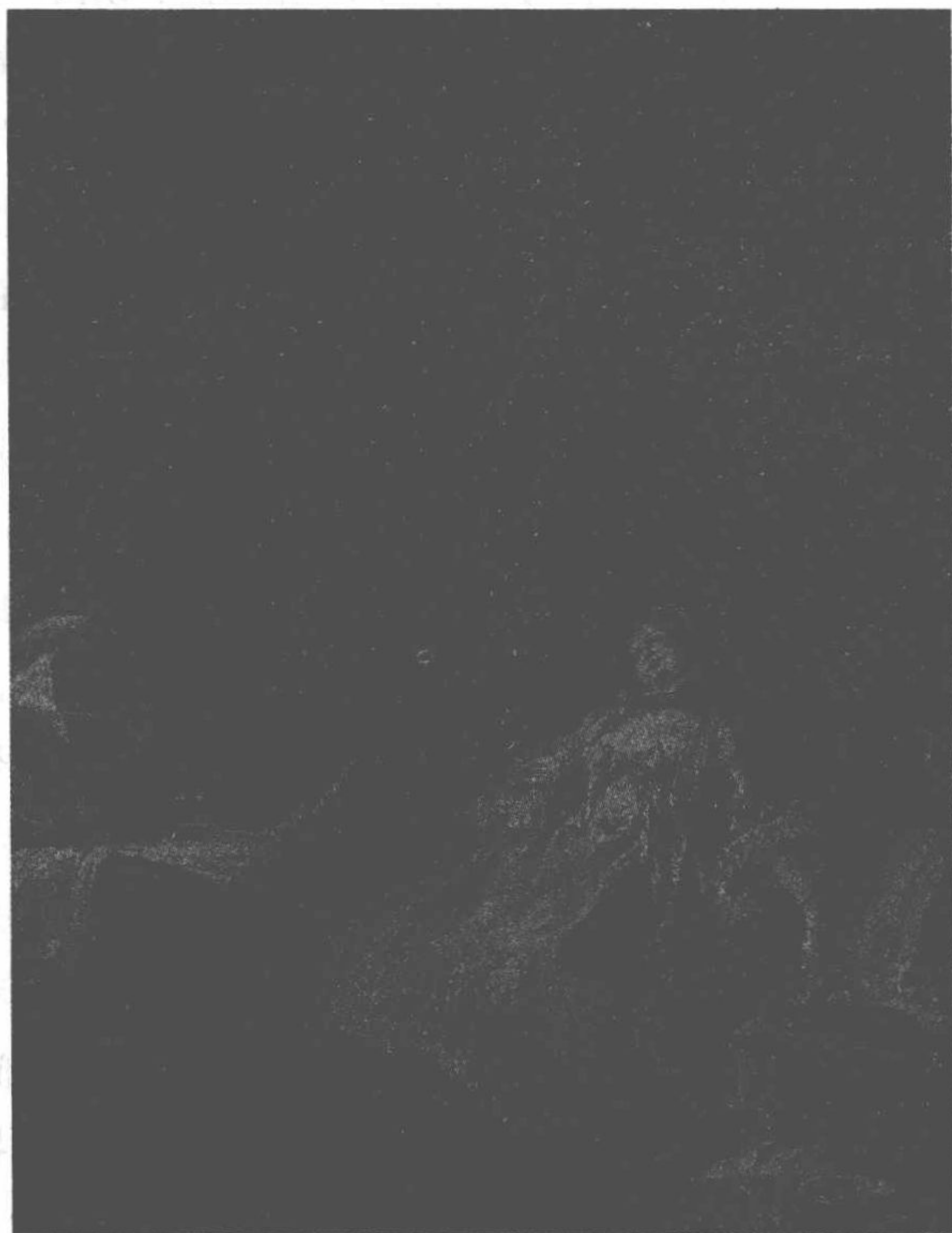


图 9-1：妇人伴书慵睡图（水粉画）

阅读私密化与近代隐私观念的兴起没有必然联系。私密化本质上只需要封闭或隐秘的阅读场所，读什么、谁读和读给谁听并不重要。此图描绘妇人在书房小睡，左手下方小凳上有一本半开的书。书桌上有几张地图和一个地球仪。原题 *Lecture*，又题 *Woman Sleeping*，英文题 *Reading*。法国 Pierre-Antoine Baudouin (1723-1769) 绘。原件藏巴黎工艺美术博物馆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朗读与默读

把阅读和隐私观念挂钩，可能是因为不了解默读的历史起源和意义。由朗读过渡到默读，一直被认为是一场阅读革命（详见下文）。关于这个转变的源头，蔡特（H. J. Chaytor）追溯到谷腾堡印刷术变革，也就是十五世纪中期。蔡特认为，在谷腾堡变革之前，传播作品是借助了说唱艺术，艺人，包括说书艺人（jongleur），走街串巷，口头演绎各种作品。他们不是诗人，但诗人的声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仰仗这些说唱艺人的本领。艺人需要领会他准备说唱的作品，然后演奏乐器，口头转述作品的内容。艺人靠这本领吃饭，不可能只干巴巴地背诵，一定会手舞足蹈、抑扬顿挫，糅进自己的个性，让表演更生动，以取悦大众，谋求衣食。^①借助谷腾堡的技术革新，诗人有了新的手段把自己的作品公诸世人。一部作品被印成很多份，以前的听众就变成了读者，不再需要听艺人说唱。因此，蔡特认为，从手抄本进步到印本，口耳相传的听觉模式逐渐为眼睛摄取的视觉模式取代，眼睛最终取代了嘴巴和耳朵，成为交流和接触思想观念最倚赖的器官。^②

事实上，在谷腾堡变革印刷术之前，默读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蔡特很显然忽视了这一点。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朗读（这是当时最主要的阅读模式），但有时也会默读。^③至于默读取代朗读，根据桑格尔（Paul Saenger）的说法，最终发生在十四世纪的欧洲。在中世纪，欧洲学者释读古文献时都需要把文本读出声来。后来在制作手抄本时用空格隔开单词，彻底改变了阅读的生理学过程。桑格尔认为，这是促使中世纪学者放弃朗读转向默读的最重要的因素。连写抄（*scriptura continua*）是古希腊文抄本的一个显著特征，公元二世纪又用于拉丁文抄本，十四世纪逐渐弃用。现存最早的欧洲中世纪抄本，大都是拉丁文。连写抄显然是古代的遗产，在古代文化中很常见。取而代之的，是词与词（或字与字）之间留空格，这样阅读就容易一些；这对初次接触陌生语言的文献，尤其重要。桑格尔称

① Chaytor 1966, 113, 117-19.

② 同上, 4.

③ Martin 1994, 67, 68-73; Saenger 1997, 6-9.

这一变化为“分水岭”，是“革命”，最初发生在把拉丁文当作外文的国家。^①在西欧，爱尔兰最先把拉丁文当作礼仪用语（*lingua sacra*），其他国家纷纷效尤。爱尔兰抄本早在七世纪就开始使用词间空。这种做法从爱尔兰传到英格兰，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和法国已经很常见了。到十六世纪下半叶，词间空已经成了拜占庭抄本中的常态。而在罗马尼亚，人们接受词间空，放弃连写抄，一共花了五百多年的时间。桑格尔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相对欧洲其他地区更熟练拉丁语。^②这个大分野表明，古代读者与书籍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也形成了阅读史上的一次大分化：这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剥离。关于这次阅读史上的分化，桑格尔说：

（词间空）解放了读者的思想潜能，得以默读文本，也就是说，只用眼睛看，而不是念出声。结果，即便理解力有限，读者也能很快地阅读文本，并能够逐渐领会相对艰涩的文字……由于有了（词间空），朗读也变得更加容易。根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经历痛苦的阅读过程。词间空改变了阅读的神经生理学过程，简化了阅读行为。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读者在安静地接触文本的同时，也能解读一些信息，领会文本意旨和口头陈述文本也随之变得容易了一些。^③

在十二和十三世纪，词间空也改变了书籍生产和作者地位，还有语法规理论和数学语言。^④更重要的是，到了中世纪末期，默读已经变成了常态，图书馆的公共阅览室这时才能成为众多读者的一个选择。默读带有私密特征，意味着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会越来越多样化，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⑤在精神层面，默读在中世纪滋长了新一波的冥想潮：既有人苦苦思考上帝的教诲，也有人沉溺于异端思想和淫词艳情。私密阅读和默祷都很隐秘，外人无从得知，结果是许多人都不能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

① Saenger 1997, 12, 48.

②同上, 41, 66, 101, 110, 235.

③同上, 12-13.

④同上, chap. 14.

⑤同上, 258-70.

终于激发了宗教改革的热情。^① 进一步推论：要是没有默读，宗教改革可能不会发生。

桑格尔认为，默读出现，象征近代化启动。通过私密阅读，个人感受到了自己的个体存在，群体借助阅读培育身份认同，社会认识到普及识字教育的重要性，并以之为至高的理想。这些观点，与麦克卢汉、艾森斯坦和沃尔特·昂等人的主张在哲学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认为，技术进步决定社会变化。事实上，从朗读到默读的转变，除了词间空外，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比如，在中世纪，读书的首要目的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使灵魂获得救赎，因此，文本需要理解，需要揣摩，需要背诵。册子本的书页设计，在视觉上把文本分成段落，重读或者前后比较都变得容易得多。在有些宗教圈子里，社群的生活往往也少不了阅读，有时它要求读者不得高声宣读，不能快速翻阅，^② 以保证阅读中有足够的内心体验，保证读者心灵与上帝能充分交流。除了词间空外，抄本上还有其他的符号和规则，包括书写习惯、起首字母设计、标点，都是用来引导读者的眼睛从文本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以更好地理解文本，而不是为了修饰和修辞。^③ 有这些符号和规则帮助，阅读就再也不用倚赖声韵了。

在阅读史家看来，默读能保证文本世界和读者世界充分深入地接触。在朗读的情形下，两者的界限总是有点楚河汉界。借助默读，读者更容易产生想象，更容易沉醉在小说等虚构作品的文本中。^④ 默读的出现，还更新了书写与阅读的关系，两者都变得更私密、更自由自在，并内化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朗读转变为默读，其结果就是默读与朗读并存，但默读方式后来被广泛接受，甚至成了一种道德义务（比如在图书馆）。有的需要朗读，有的只能默读，文本不同，功能不一样，使用方式也不一样。^⑤

值得注意的是，阅读不出声并不等于默读。不出声的阅读有两种：冥

① Saenger 1997, 276.

②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17.

③ Parkes 1992; Parkes, "Reading, Copying, and Interpreting a Tex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见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96-97, 100-102.

④ Chartier 1999, 277.

⑤ Chartier 1989,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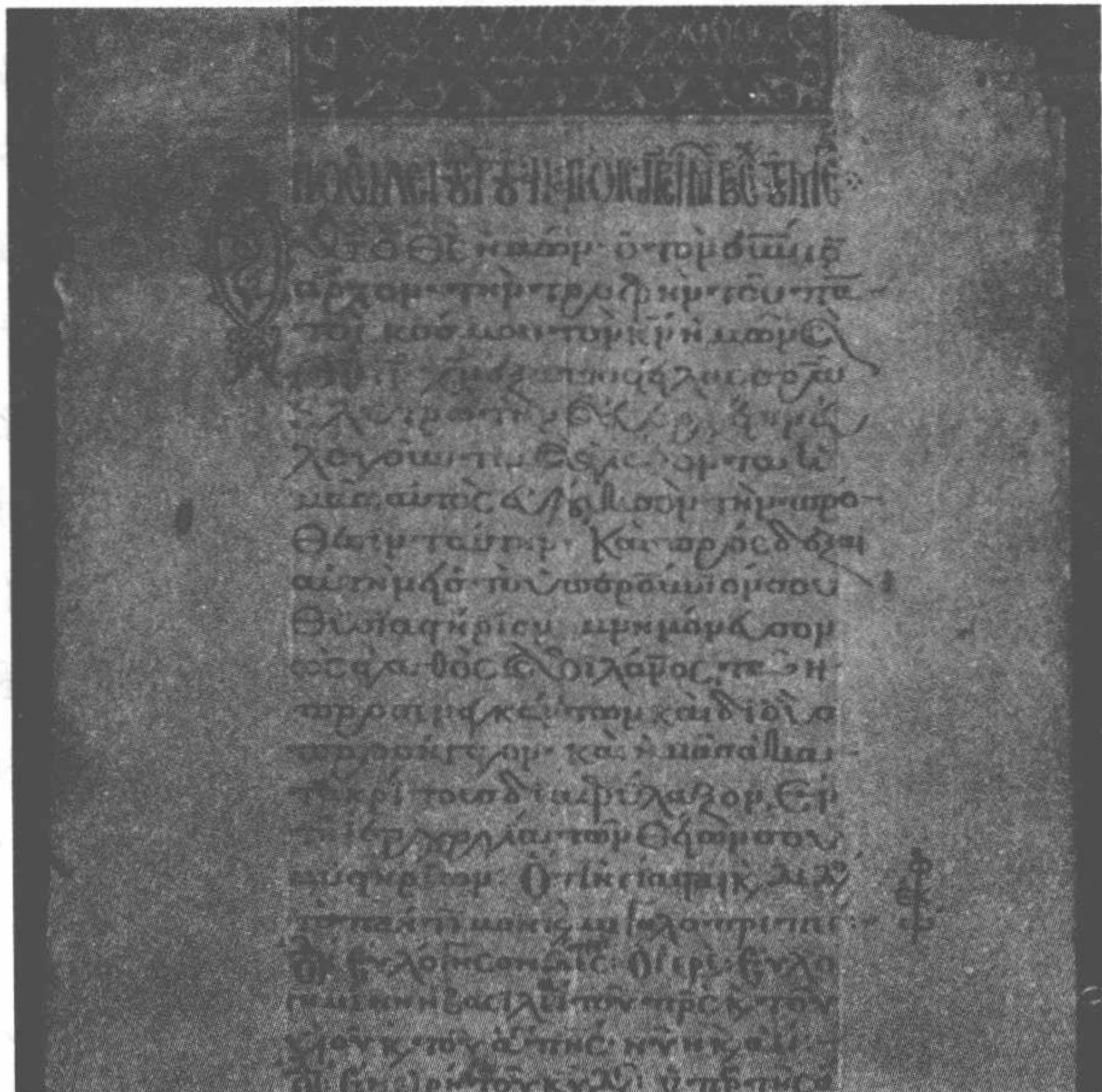


图 9-2：连写抄手卷

早期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手稿多采用连写抄，单词之间没有空格，后来也有手稿采用这样的书写形式。由于没有词间空，读者只有读出声来，才能明白文本的意思。图中手卷为希腊文《大圣巴西略礼典》(Divine Liturgy of Our Holy Father Basil the Great)，抄写于七张连缀的羊皮纸正反两面。礼典文起首及不同章节以红色字母标示。右边空白处有 ε, κ, φ, ω 四个希腊字母，为 ἐκφώνει 的缩写，意为“大声朗读”。该卷子写于 1375-1425 年，尺幅 436.0 x 23.0 厘米，为拜占庭帝国遗物。原件藏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编号 MS Typ 416)。

想式阅读 (meditative reading) 和分析式阅读 (analytical reading)。读者作分析式阅读，会从文本提取信息，需要观察和理解。分析式读者往往把阅读本身当作一个目的。而在冥想式阅读中，读者认为从文本中获取知识只是一种手段，阅读是为了达成更高的目的或生成更深刻的意义，这种目的和意义不是文本所能表达的，而是超越了文本。冥想式阅读，是一种身心俱到的行为，追求一种个人体验，探寻意义时采取的是关联式方法，讲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是非线性的，不是有序的逻辑方法。分析式读者往往认为冥想式阅读阻碍了从文本中顺利撷取信息。^① 冥想式阅读和分析式阅读历史性地分离，大约在 1600 年。但是，没有冥想式阅读会完全排斥按部就班的理性思维，也没有分析式阅读会排斥天马行空的遐想。两者彼此兼容，在大多数文化传统中会融合起来。^② 冥想式阅读是随着冥想静坐出现的，讲究调节身心的技巧，在东西方都有很长的历史，欧洲古代和中世纪都有这样的阅读方式。冥想的对象既有图像，也有文本。在古代，修炼身心，冥想静坐，当然要求静默无声，这在欧洲已经成了静修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到了十一世纪，静默有时却成了默读的衍生品，并且往往与精神隐逸或者探寻心灵的主体状态等等相关联。^③ 到 1600 年左右，冥想式阅读已经逐渐减少，也仅限于某些特殊的团体，其他团体则排除在外。但这种排除，不是朗读转到默读的结果，因为读者既能默读，也能冥想。^④

还是接着说默读。桑格尔认为，因为汉字具有象形特征，传统中国的小孩子很早就学会了默读的本领，比西方的小孩子要早。熟练的中国成人，能够很迅速地浏览完一篇文章，这让近代西方语言环境下训练的读者有点望尘莫及。桑格尔强调，这跟汉语的特殊结构以及书写方式有关。大体来讲，在领会词的意思之前，象形文字能够缩短读者的认知过程，幼年读者容易掌握默读技巧。而书写笔画含混的语言，其读者有必要先掌握其中的音素，必须说出来，然后才能明白词语的构成和意义，这种训练需要的时间就长

① Stock 2006c, 515–516.

② Stock 2006d, 647.

③ Stock 2006b, 508.

④ Stock 2006a, 498, 497.

一些^①。关于汉语阅读的这个说法不一定对，但对研究传统中国的阅读模式与语言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诱导。

所有的阅读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并有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在朗读和默读、群体阅读和个体阅读、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这三组对应中，通常认为，朗读一直和群体阅读、公共阅读联系在一起，而默读则跟个体阅读、私密阅读紧密相关。有阅读史家还认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默读是知人论世、各抒己见的前提条件。只阅读一端，就足以挣脱社群的纽带，消解人人恪守的传统价值观。阅读甚至被看作新兴隐私观念的一部分，分享阅读的隐私会增加人之间的亲密感。^②新的阅读方式和其他历史现象一同出现，这样的历史巧合，诱惑学者在阅读和社会变化之间寻找一些对应关系。比如说，精读少数的经典文本，细心揣摩，需要耳聪目明，记性好；而泛读，则需要快速浏览，需要很多文本足以供应和选择，其中可以称为经、称为典的东西自然少。精读过渡到泛读，有人认为是标志着阅读跨越社会阶层界限、向社会下层扩展。私密阅读，一直被认为促成了私生活空间的形成，而集体阅读则塑造了社群空间（communitarian space）。集体阅读，通常被认为与时俗文化相关联，而私密阅读则应和精英文化更密切。^③这样把几种阅读模式简单对应，有些大而化之，而且技术更新、文化差异、社会地位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被描述成了单向的过程。事实上，即便在古希腊，学校推行识字教育，阅读是集体进行的；而家庭生活则更多地保留了口耳相传的传统，三两个人在一起阅读，也有可能是私密行为^④。二分法不是绝对的，对立并不意味着简单化。

① Saenger 1997, 1-2.

② Lyons 1999, 55.

③ Chartier 1994, 16-18.

④ Goody and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见 Goody 1968,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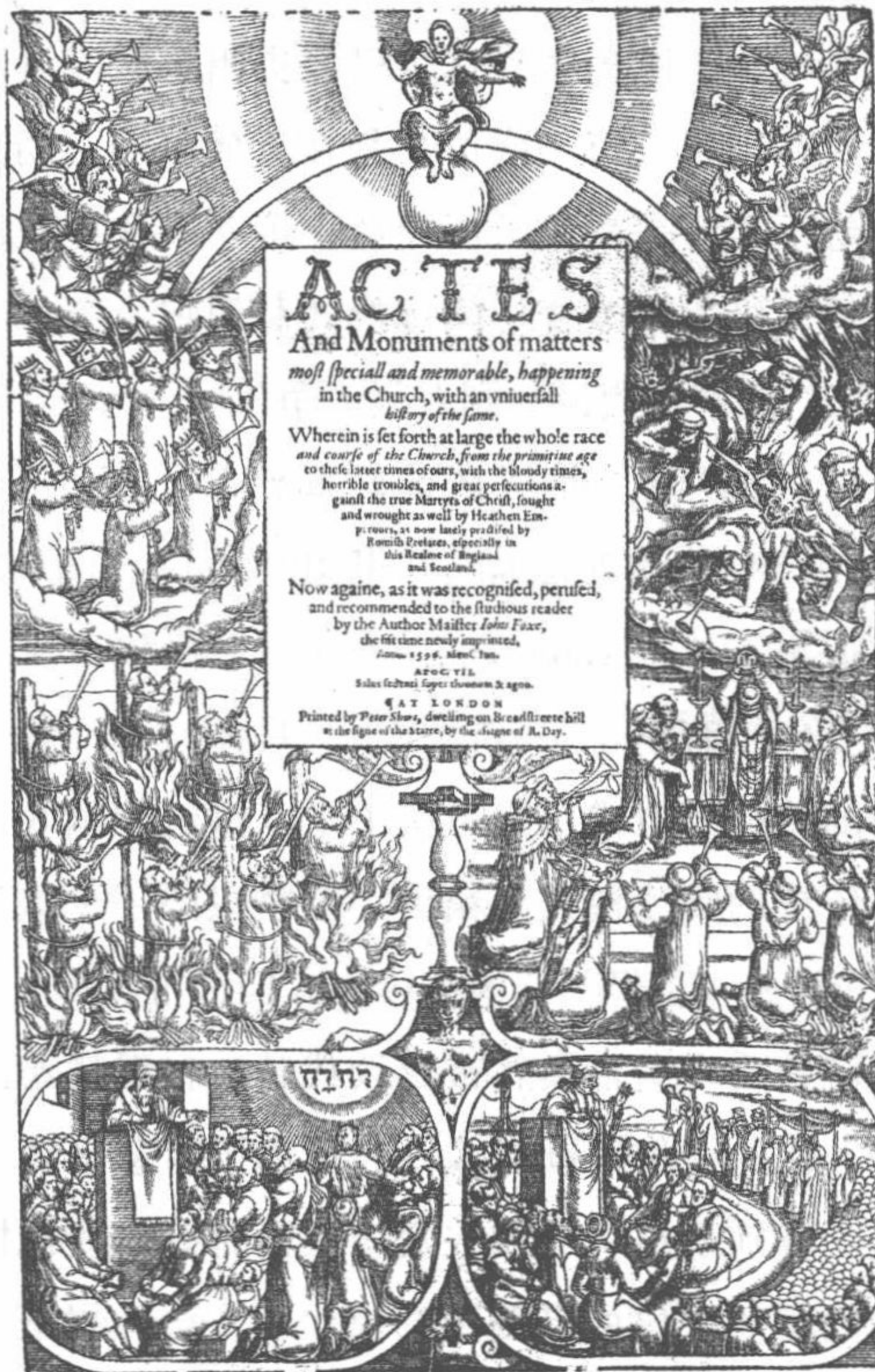


图 9-3: 福克斯《殉道录》

教堂布道听道是典型的集体阅读、公开阅读和宗教阅读行为，其形式、功能和效应为阅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此图为福克斯《殉道录》扉页，最下两幅描绘教堂布道的情形，有妇人膝上放置打开的《圣经》。取自 John Foxe,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 Peter Short, 1596)。亨廷顿图书馆 (Huntington Library) 藏本。

阅读革命

把阅读类型打上相应的历史烙印，是“阅读革命”假说的基础。根据夏蒂埃和贾维楼的说法，欧美学界迄今已经提出三次阅读革命假说，两次发生在近代，一次在当代。第一次革命是在近代早期，朗读转向默读；第二次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精读转向泛读；第三次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本实现了电子传播，极大地改变了阅读模式和习惯。第一次革命假说，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次革命假说，则有很大争议。

第二次阅读革命假说，即从精读转向泛读，最早是德国文化史专家罗尔夫·恩格尔幸（Rolf Engelsing）提出来的，是他发明了“阅读革命”（*Leserevolution*; reading revolution）这个词。恩格尔幸使用这个词，特指俗世阐释模式的变化（有别于宗教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俗世由精读转向泛读具有革命的特征。恩格尔幸考察了十八世纪德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新教史料，认为传统的阅读模式是精读，读物只限于少数经典文本，大部分是宗教读物，主要是《圣经》。这些读物人们都很熟识，具有规范作用，读者都能倒背如流。后来这种模式被泛读代替。在近代德国，泛读具有俗世的特征，是个人化的一种阅读模式，表现为读者急于消费各种各样的新读物以获取信息，特别是想从中找些娱乐。当时有一些机构和出版物正好满足了这种转型的需要，比如借阅图书馆、书友会、报纸、期刊，当然还有书。^①

恩格尔幸的阅读革命假说，得到了一些美国文化史家的呼应，其中就包括我们前面称引过的吉尔摩和霍尔。^② 在考察 1600-1850 年新英格兰区识字人口的阅读活动时，霍尔注意到了阅读模式的一个变化，即十七世纪新教徒虔敬的精读模式转向十九世纪蜻蜓点水式的泛读模式。在 1800 以前，新英格兰人的读物，只有少数的宗教文本，大抵是畅销书，没有什么变化；^③ 1800 年以后，新种类的书大量出现，小说在出版物中占的比重稳

^① Engelsing 1974; 转引自 Melton 2001, 86-95.

^② 关于吉氏研究，见 Gilmore-Lehne 1989.

^③ Hall 1996, 57-68.

步超过了宗教读物，美国和欧洲都是这样。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英格兰就开始进入小说时代了。^① 魏特曼（R. Wittmann）也支持这一假说，但稍微作了修正。魏氏认为，历史上并不曾有过从传统精读到近代泛读这样一个急剧的变革。他没有使用“阅读革命”这样的字眼，但他认为，在旧制度末期，阅读公众不断扩大，阅读习惯各种各样，在质和量上都和以往不同，社会和区域特征也非常明显，整个欧洲都是这样。^②

大西洋两岸都有精读—泛读革命的假说，但争议一直没有断过。有的学者质疑这个假说是否适用于美国。芭芭拉·斯切曼（Barbara Sicherman）研究过美国汉密尔顿家族的阅读行为。阅读是这个家族生活和成员互动的一部分。在这个家族里，工业化以前的阅读传统比如集体阅读和朗读延续了很长时间，远远超过恩格尔幸的估计。尽管书已经很常见，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读书、买书远不如现在频繁。^③ 因此，所谓阅读革命，确实不能涵括所有读者。丹顿也不赞同这个革命假说。他研究让·兰森阅读卢梭的经历，其结论并不支持恩格尔幸。丹顿认为，约翰·亚当·伯克（Johann Adam Bergk, 1769–1834）的《读书法》（*Die Kunst, Bücher zu Lesen*, 1799）没有提到过当时出现泛读。丹顿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革命，但十八世纪欧洲的阅读行为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概括为从十七世纪的“求知自得”（reading intended to please [*plaire*]）转变为十九世纪晚期的“娱情自适”（reading intended to amuse [*distrainre*]）。^④ 几年后，丹顿重申自己的观点，认为恩格尔幸的假说除了缺乏证据外，论证过程也缺乏逻辑，忽视了技术变革和工业化引发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行为的多样性。丹顿说，阅读行为不是单向演化的，泛读并不是终极模式。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阅读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十八世纪末，随着识字人口增加，图书生产大幅增长，出现了大众读者群（mass readership），阅读材料增多，阅读目的更为世俗。这些变化，丹顿认为都很关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恩格尔幸的假说提

① Hall 1996, 75.

② Wittmann, “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见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86.

③ Sicherman, “Sense and Sensibility...,” 见 Davidson 1989, 201–225.

④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见 Darnton 1985, 250–252.

供了一个方便的框架，以便就欧洲历史上早期和晚期的阅读模式作些对比，^① 并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普遍问题植入阅读史研究中。^②

作为回应，赞同恩格尔幸的人则重新定义了阅读革命这个概念。霍尔认为，在美国和欧洲历史上，阅读革命也涵括了社会变动和文化嬗变，比如，宗教阅读淡出，俗世阅读凸显；自给自足式的阅读活动式微，商业化的阅读过程逐渐占据主流；以前印本罕见，现在印本盛行。历史上是否发生过阅读革命，这个问题直接引导我们探索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需要复杂的理论梳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众多读者都会抱持数种阅读观念，表现为不同的阅读模式，读物有差别，书写观念也不尽相同。一部好的阅读史，霍尔说，应该再现一个历史时期阅读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不同阅读模式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简化为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转变。在十九世纪，借助工业化，书籍生产和发行体系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我们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是，这些变化是不是真的影响了阅读行为，又是怎么影响的。^③

在比较恩格尔幸和霍尔的研究后，夏蒂埃进一步修正了阅读革命的假说。他认为，在传统的精读模式中，读者与读物的联系很紧密，远远超过新出现的泛读模式的要求。要求精读的文本只有那么几种，普通读者接触得更少，但大抵是能流传后世的文字，而精读行为本身又和其他文化活动不可分离，比如许多人听一个人朗读，比如强记需要精读的文本，比如背诵精读的文本，再比如细心揣摩、精研覃思，这些都和精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者对需要精读的文本心怀虔敬，对印刷出来的文字有很强烈的神圣感。结果，文本规范了读者的精神，他们被迫适应了一套特定的文本体系，脑子里储藏的干货都差不多，笔头和口头抖搂的也都是同一个调调。在泛读模式下，阅读行为可以有鲜明的个体特征，可以游离于其他的文化行为。书本很容易到手，不再神圣，读者不再生活在神圣经典的阴影里，对少数特权文本的关注减少了，就有精力去读其他的文本。但是，夏蒂埃发现，

① Darnton 1990, 165-167.

② 同上, 133.

③ Hall 1996, 185-186.

恩格尔幸的德国模式和霍尔的新英格兰模式都不适用于法国的天主教地区。这些地区的精读读物不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圣经》，大多数法国人细心琢磨多年的书籍竟然是年历、各种消遣读物 (*occasionnels*)，还有劝世文 (*books of piety*)。随着图书馆之类的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像让·兰森那样的读者渴望读到小说，但精读模式在法国持续存在，整个十八世纪都是如此。^①

夏氏的比较研究说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精读向泛读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尽相同，两者的内容和形式也各有特色。在大多数文化里，精读向泛读转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因此不像恩格尔幸所说称得上革命。事实上，即便在精读主导的时期，也有很多读者喜欢泛读。即便正当十八世纪发生所谓“阅读革命”时，精读也达到了极致。^② 1762年，狄德罗为萨缪尔·李察森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写过一篇讣闻，其中就讲到如何阅读李察森的作品。狄德罗说，李察森的小说，不论是独自欣赏，还是和同志一道赏析，都需要反复阅读，不厌其烦，甚至可以作些摘录，常置左右。这样做，读者就会逐渐消除文本展示的世界与自己现实世界的区别，从书外的观点来思索李察森叙述的场景。这些场景需要读者全身心地体验，会激荡他的心，震撼他的身，迤逗他啸吟，感动他流泪，具有道德教化的目的和力量。^③

这所谓第二次阅读革命，即从精读转向泛读，被看作印刷工业化的一个成果。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单向度的技术决定论，背后的假设是技术进步一定会影响社会和个人，却忽视了反向的作用，即社会和个人对技术的影响，以及接受和应用程度。任何技术改进，对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级和群体都有很不一样的影响，因此恩格尔幸的阅读革命假说有道德和社会的内涵——这是罗纳德·左雷 (Ronald J. Zboray) 的看法。左雷曾经研究过美国内战前书籍生产技术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不认同恩格尔幸的假说。^④ 左雷认为，近代以来影响阅读行为的首要变革，确实是一项技术变革，也就是

① Chartier 1987b, 222–225.

②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5.

③ Chartier 2007, chap. 7.

④ Davidson 1989, 17–18.



图 9-4: 谷腾堡印本《圣经》书影

欧洲早期印本（即摇篮本 [incunabula]）保留了许多抄本的特征。十五世纪五十年代谷腾堡印本《圣经》中，版式、装饰、字体和其他细节都有意模仿抄本。除正文字母为活字印刷，视觉上比抄本规整外，和抄本比其物质形态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就阅读体验而言，由卷子到册子的变革，比谷腾堡的印刷术更具有革命性。取自 *Biblia Latina* (Mainz: Johann Gutenberg, ca. 1454)。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魏德讷文库 (Harry Elkins Widener Collection) 藏本 (HOLLIS 编号: 0057793800)。

谷腾堡印刷术。有了印刷，每个读者都有可能接触更多的书，每一种书都会有更多的读者。有了印刷，一个文本就有可能复制很多份，物质形态固定，改变了书籍传播和受容的条件。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并不足以促成阅读模式的彻底变革。从钞本文化到印本文化，是有连续性的。新的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书籍的基本结构，版式结构、写作模式、总体外形，乃至物质形态，都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从朗读过渡到默读，其间读者数量也持续增加，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桑格尔的研究，这个过程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谷腾堡以后的时代，能阅读的人也不再限于寺院的书手，大学里也有能读书的人；俗界的文人和贵族当然有书读，但底层人士也跻身读者之列。^① 阅读能力逐渐跨越传统的社会界线，但印刷术的发明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决定性的作用。^② 因此，图书生产的革命并不必然促成阅读革命，古腾堡的印刷术并不能促成阅读模式的根本变革。^③

变革标准

那么，什么才是衡量阅读革命的标准呢？很显然，迄今我们讲到的三次变革，本质上都是书写与阅读的关系在变化，或者说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在变化。朗读转向默读，其根源是十二和十三世纪书写的功能在转变，从寺院模式（monastic model）转到学院模式（scholastic model），从僧界移到俗界。寺院模式中的书写功能，是为了保存和纪念，大体和阅读没有什么关系。在学院模式中，书籍既是实实在在的物品，也是精神生活依赖的工具。在默读行为中，书写和阅读有可能变得自由一些，隐秘一些，因为完全是在内心里面进行的，而读起来速度快，也熟练。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使用文本就有了两种选择：在一些场合朗读，在另一些场合默读。前面说过，

① Saenger 1997.

②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2-24.

③ Hall 1996, 185.

在精读模式中，读者对文本是抱持虔敬和驯从的态度；而在泛读模式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要自由一些，比较疏远，也少了一些敬畏。在互联网时代发生的第三次阅读革命，则真正模糊了书写与阅读的分界，模糊了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区别。读者也可以是作者，他们参与写作，不仅随心所欲操控文本写作过程，还随心所欲改写原始文本。在抄本和印本时代就已经确立的辨别和操作文本的传统体系，这时被大大地改造。因为有了电子文本，文本生产、传播和阅读可以同时进行，书写、出版、发行和阅读过程也随之合而为一。这不仅对传统出版业和相关传统行业是巨大的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还有他们的书写观念、文本观念，也都会有新的内涵。^①

书写和阅读的关系、文本和读者的关系，在阅读模式的变革中都会发挥作用。这印证了前面提出的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三位一体的模型，它们是书籍的三大要素，共同影响书籍意义的形成，是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着眼点。

三位变异

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三位一体的模型，在实际写作、出版、阅读，以至我们的研究中，会有一些变异。夏蒂埃对这个模型的变异有很好的说明。

（一）文本稳定，但印本物质形态有变化，读者能够更容易得到。承载文本的物质形态变化，会改变文本的参考点以及解读模式。文本相同或者体裁相同，新的出版格式会诱发新的解读。^② 这一点，麦肯锡在他的文本社会学理论中已经证明了。

（二）文本从一种出版形式转到另外一种，该文本也随之改变，拥有新的读者群。一个既定的文本，经过编辑后，采用特定的承载形式，会暗

^①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4-28.

^② Chartier 1994, 11-12.

示其读者所属社群采取的阅读方式。物质形态是根据目标读者群的阅读期待和能力而制定的。作品和承载它的物质形态，会分化受容它们的社会群体；此前已经存在的社会区分是传统的积淀，从内部产生不了新的作品和新的物质形态。因此，夏氏认为，文化差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顽固的社会区分在文化上的表现。一方面，物质形态变化，以及文本生产和流通的机制，会产生新的文化拈借现象，产生新的读者群，出现新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即便整个社会共享同样的文本，学者也要去寻找阅读方式有哪些新的社会差异，看看以前一直维持的差异有哪些变化。印刷品不再稀罕，不再深扃密室，而是成了普通商品，这个变化，并没有弱化阅读方式上的差异，反而是加强了。^①

（三）文本稳定，物质形态稳定，但有了新的读者群，采用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阅读方式。了解这种变异体现的阅读差异，会帮助我们认识同一文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意义。基本的差异，包括朗读与默读的差异，精读与泛读的差异，个体阅读与集体阅读的差异，还有私密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差异。^② 强调这些差异，不是要把历史上的三次阅读变革简单化，而是要把这些变革和文本生产的技术演进联系起来，和书籍的物质形态变化联系起来，和阅读能力、阅读方式联系起来。这些技术、物质形态和文化方面的诸多演化，并不同步，也没有共同的转折点，但又确实彼此关联。这些关联如何产生，如何作用，如何演变，都是阅读史要讨论的话题。^③

拈借说

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三位一体的关系，很显然是动态的，夏氏概括为“拈借”。这个词，很显然是从保罗·利科和德·塞托那里借来的，但

① Chartier 1994, 13-16.

② 同上, 16-17.

③ 同上, 18.

夏氏重新界定了它的涵义。我们前一章讲过，他用这个词描述阅读史的一种研究方法。不过，他也用这个词表述他的一个理论假说。他从阅读史的角度研究法国文化史，就使用拈借一词，来描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互动。对于正统或官方认可的故事、文本和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取将过来，并加以改造。夏氏的拈借说，承认表达形式和文化交流方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对文本的理解各色各样，对文本的使用也因人而异。这个理论，主旨不在从社会史的角度描述文化材料(cultural material)的总体特征，而是重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在特定的社会中流传的文化材料，人们有使用，有改造，这就是夏氏说的社会文化活动；这样的活动，表现为不同的使用和改造，并赋予它们显著的特征。任何拈借行为，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基础就是文本自身，不管是查禁还是期待，目的都是要规范对文本的使用和改造。^①这就是说，拈借说要求我们在研究阅读史时，既要考虑文本，也要思考阅读行为背后的传统和规范；文本意在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传统和规范则决定了从文本中抽绎意义的过程。夏氏拈借说的立论基础，是德·塞托的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张力理论。根据这种张力理论，一个文本，或显或晦，总是想向自己的受众传达一些意图，但读者可能的阅读反应却千姿百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张力。对于一个文本，有受容和认同，就一定有调整和偏离，甚至抗拒。^②

夏氏的拈借说，改变了关于阅读行为的传统认识。人们对印刷品的使用，随时空变换而改变，而且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阐释社群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文本本身就有不确定性，其解读有各种可能，读者“闯入”（借用德·塞托的说法）文本的方法和效果也千差万别。在文本与意义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思索过程，涉及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历史环境。把一种文化模式强加到读者身上，并不能保证他们会按照设定的方式使用、改编和理解文本。有了拈借说，阅读史就可以界定为一门社会史，它假定读者属于一个阅读社群，共享一些基本的特征，要研究的就是这些读者使用和理解文本的历史（同样受年鉴学派影响，丹顿最初也把书籍史界定为印本书

① Chartier 1987b, 6-7.

② Chartier 1987b, 7, 9; Chartier 1995, 92-93.

籍的社会史)。①

就方法论而言，拈借说最初是为了挑战法国文化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这种方法在夏氏之前盛行一时，现在也余势未消。计量方法用来量化物品（包括书籍）、观点和行为（包括阅读）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不均衡分配。夏氏认为，这样就把社会分层和文化差异的联系过于简单化了，既不能解释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于同一主题或书籍物质形态的不同使用方式和效果，也无法描述对这个主题和物质形态的各种阐释方式。② 拈借说还挑战了另外一个盛行的假设：人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文化产品的意义，只是基于它的语言学或符号学功能，此外无它；夏氏则认为，读者赋予文本的意义是多样的，变动的，并不向文本自身看齐，也不跟它保持一致高度。③ 历史上的阅读行为是表现为多层面的，传统规范与读者的实际体验之间是有距离的。④

在应用拈借说研究阅读史时，要避开两个风险：一是轻率地认为文化活动的社会特性是单一的、标签性的；二是屈从僵硬的二分法，认为无权无势的人只能拾人牙慧，强势群体给他们什么，他们就直接拿来使用，尽管主旨不同。这样一来，拈借就成了弱势群体的利己之术，一个小伎俩。简而言之，拈借说要避开的，正是把拈借的社会属性和作为方法的文化行为联系起来。⑤ 另一方面，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包括阅读行为，是多样的，但强调差异，并不就是说研究拈借的历史只需要平行罗列各种不同的文化行为，拌成一锅只见色彩差异的大杂烩。为了克服这些误用，夏氏建议，阅读史的中心应该是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交汇的地带，阅读史要研究的，应该是“符号控制机制”（mechanism of symbolic domination）与阐释策略中的逻辑之间的关系——前者产生传统和规范，后者则决定具体的阅读行为和意义抽绎过程。⑥

① Chartier 1995, 90-92.

② Chartier 1987b, 7.

③ Chartier 1995, 3.

④ Chartier 1987b, 9.

⑤ Chartier 1995, 3-4.

⑥同上，90.

俗与雅

夏氏的拈借说，还挑战了关于时俗文化的两种传统观点：一种认为时俗文化是完全自主的一个符号世界；另一种则强调它是高雅文化的产物，受高雅文化操持。^① 劳伦斯·列文和彼得·伯克分别是这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一个在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红极一时，另一个则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史研究。列文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福音派的文化生活是被宗教夯实了的，有极浓烈的宗教色彩，当时的社会精英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它与引车卖浆者流喜欢的时行娱乐没有什么关系。^② 伯克认为，在近代早期的西欧，两股潮流改变了有传统渊源的时俗文化。一股由天主教和新教的僧侣主导，意在改变其他教派民众的宗教态度和价值观，并抑制或者净化时俗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另一股，就是上层贵族退出时俗文化。伯克认为，在十六世纪，时俗文化是大家的文化，是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的第二文化，是其他所有人的惟一的文化。到了十九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僧侣、贵族、商人、高级从业人员，还有他们的家室，都不再涉足时俗文化，认为这只是下层人士的东西。上下两个阶层在文化上正式分道扬镳，世界观也截然不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③ 夏蒂埃提出拈借说，却强调读者使用文本的方式是多样的，对文本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他怀疑伯克提出的两个历史时间段里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文化变迁。他说，不管文化模式强加于人时多么霸道，人们在直面它时，反应会各种各样，有不信任，更有直接了当的反抗。^④ 伯克认为，十九世纪的时俗文化为下层所独有，精英阶层往往不屑一顾；夏氏则反驳说，时俗其实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联系，反映了人们使用共通文化产品或规范的方式。^⑤ 文本和书籍广泛传播，跨越了社会界限，读者来自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层，因此，我们有必要保持谨慎，不要给读者预设任何社会分层，不要从一开始就认定他们是“俗人”

① Chartier 1995, 83-84.

② Levine 1988.

③ Burke 1978, 207-208, 270.

④ Chartier 1995, 85, 86.

⑤同上, 89.



图 9-5: 十九世纪英国的阅读公众

十九世纪的英国，由于印刷工业化、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和教育发展，具备阅读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雅与俗的界限不得不重新划定。此图中四人，代表四种读者，上方标明他们的社会身份和阅读习惯。左起第一人为女仆，喜欢读言情小说。第二人为老年绅士，偏爱当时的名妓夏丽蒂·威尔逊 (Harritte Wilson, 1786-1845) 的诗文。第三人为环卫工人，政治立场激进，爱读当时流行的小报《政治要闻》(Political Register, 1802-1835)。第四人为法国派头的时髦青年，爱读司各特 (Walter Scott, 1771-1832) 的最新小说。原题 *Four Specimens of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J. Fairburn, 1826), A. Crowquill 绘图，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 印制。原件藏耶鲁大学沃波尔图书馆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或“雅士”。^①

阅读史家还得小心使用“俗读者”（popular reader）和“时俗阅读”这两个术语。基于自己的拈借说和对时俗的定义，夏蒂埃对这两个术语作了界定。他在研究近代早期法国的阅读行为时，把小农、游民、工匠、商贩等视作“俗读者”，后两者通常被当作布尔乔亚。他检查了1503-1576年的亚眠（Amiens）、1601-1670年的巴黎和1645-1668年的格勒诺尔（Grenoble）三地的书籍持有状况，认为俗读者只占读者群的一小部分，他们通常不买书，或者只有很少的几种书。这些读者，社会地位很卑微，根本没有自己特有的阅读期待。他们不读大人先生们读的东西，他们持有或谋到的区区几种书，其实也不能说是他们自己的读物。他们接触的书，都是印刷商为了开拓市场生产的产品，同时服务好几个社会阶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法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俗”读者群。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与印刷品保持联系，对印刷商和出版商来说，这时候还开辟不了什么专门的市场只为特定的人群生产图书。^②

在重构俗读者和时俗阅读时，我们需要意识到，阅读与背诵的差别一直存在，在口耳相传还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共存，印本就有可能切入口头传播渠道，影响口头传统，这样口头传统也就不再纯粹。传统故事的文字形态是有学问的人加工过的，有雅文化的印记。夏氏认为，所谓时俗阅读，也只有一个具体的符号环境中存在；它的特殊性，不是自生的，而恰恰来自它对主流精英模式和雅传统的依赖，来自有人居中嫁接作媒。^③ 因此，和金兹堡一样，^④ 夏氏也认定，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俗读者，不能依据他读什么，而是要基于他的阅读方式，还有他拈借所读文本为己所用的方式。没有什么读物是专供一个社会群体阅读的而其他人翻看不得的。^⑤

关于时俗阅读和俗读者，历史文献记载很少。夏氏的拈借说对于进行

① Chartier 1989, 4.

② Chartier 1987b, 146-151.

③ Chartier 1995, 94-95.

④ Ginzburg 1992.

⑤ Chartier 1999, 271-272.

这方面的探索很有启发。精英主导的传统规范，在读者使用文本的过程中总会被改造，甚至受到挑战，这种传统与个人的关系，就是我们了解时俗阅读和俗读者的一个重要线索。

学科渗透

阅读史研究已经渗入其他史学研究，比如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和宗教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书籍史研究兴起后，思想史研究九十年代就开始使用新材料，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折。一些勇于革新的思想史学者着手研究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认为阅读史研究对于重现近代文化有重要的作用。到了二十一世纪，思想史学者对于欧洲抄本和印本上边批的兴趣有增无减。^① 现在的宗教史研究也认为，宗教和阅读是彼此关联的两种人类行为，认识阅读行为，有利于增加对宗教的认识。阅读是表达宗教关怀的一个平台，宗教又反过来部分决定阅读方法和模式。近年来的宗教史研究，把阅读作为一种宗教行为，并讨论识字教育对于宗教身份认同、宗教文化和宗教意识的影响。

在美国，一个困扰众多学者的问题便是福音派神学与阅读的关系。福音派神学奉《圣经》为圭臬，极其强调和依赖文本阅读，以强化文本的权威和信众对文本的认同。福音派阅读《圣经》，被认为是在借用古代信仰和道德以应对众多的当代问题。^② 保罗·戈里菲斯（Paul Griffiths）对宗教群体中阅读行为的性质和作用作过一番理论说明，主张首先要把宗教阅读和消费主义阅读区分开来。他说的消费主义阅读，是指近代才出现的一种阅读行为，其首要目的是消费文本，因为里面含有文化生产价值，是文化生产商业化的产物。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本身就是目的，文本不过是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对专业读者而言，阅读是为了获取专业成就。在消费

^① Grafton 2006, 27-29.

^② Brown 2005.

主义阅读模式中，目的达到了，文本就可以扔到一边了。宗教阅读却不一样。宗教的性质决定宗教阅读的目的，是要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建立多重联系，读者首先要有虔敬的态度，要把圣典看作认知神圣的途径，甚至要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建立道德的联系。阅读圣典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在文本中发现美感。圣典文本的意义是没有穷尽的，终生都参不透，应该常置左右，要反复地读，心怀敬畏，沉醉入神。^① 宗教阅读既然有这样的目的，就要求背诵和揣摩文本，并把从里面参悟的道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此，宗教文本笼括了心、情和志，信众在阅读时就会顺从这个文本。这样高度融合，意味着宗教文本主导了读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经过努力和思索，读者才能摆脱文本对他的控制。^② 戈里菲斯理论中宗教阅读和消费主义阅读的区别，有点类似精读和泛读的差别。宗教阅读要求读者身心与文本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地融合，这种现象在阅读非宗教文本时也存在，俗世里叫“书痴”（bibliomania）。^③ 精读和泛读互有彼此，宗教阅读和消费主义阅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阅读宗教文本可以保持消费的态度，阅读俗世文本也可以像对宗教圣典那样心怀虔敬。因此，宗教阅读和消费主义阅读代表两种阅读态度、两种阅读目的。宗教阅读不一定是宗教活动，可以出于世俗目的；消费主义阅读不一定是世俗行为，可以出于宗教目的。

阅读史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足以说明它在学术世界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阅读史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学术身份。根据格拉夫敦和戈里菲斯的说法，阅读史的话题很难和思想史、宗教史的话题截然分开。学者们做了各种努力，划定阅读史的学科领域，为它确立特定的研究范围，寻求独特的材料，提出各种假说，一些理论概括和研究成果也获得学界承认，但是，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阅读史的研究技巧和理论水平还是相对较低，还需要有兴趣的人作大量的研究。

① Griffiths 1999, 42-43.

② 同上, 47.

③ Littau 2006.

赘语

阅读史研究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它的理论框架来自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德国文学批评家和他们在北美的信徒贡献巨大。他们以读者和阅读为立论基点，认为读者主动、积极地生成文本意义，有时会与作者意图背道而驰。有了读者和阅读行为，文本才成其为文本，才有了意义。这从理论上重新定义了读者、文本与作者的关系。读者反应批评家在理论上把阅读行为放大，描述读者的认知过程，讨论阅读能力养成和意义生成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其中的重要概念和假说，成为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依托。文学批评中的理论阐释当然不能替代历史认识。阅读史研究虽然借用了读者反应批评中的许多理论范畴，但它关注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读者，读者实际接触过的书本，书里面具有特定历史特征的文本，以及读者从书本和文本抽绎意义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从文本推演读者和阅读行为。不同的关注点，把阅读史和读者反应批评区别开来。阅读史是书籍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读者和阅读行为是书籍史其他分支学科和传统目录学不能涵括的研究对象。

借用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研究历史上的阅读行为，必须将理论范畴纳入史学规范中重新界定，其研究面貌则受可用史料和书籍史研究传统的约束。英美的分析目录学传统、法国的年鉴学派传统、德国的接受美学，在当前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中彼此杂糅，互相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究，关注书籍流通和阅读背后的社会、经济以及法律因素，这部分得益于法国书籍史史料保留了许多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内容，因此法国人更倾向假定书籍是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动力。英国的书籍史研究把书籍视为一种

可触可感的历史陈迹，丰富的出版史史料和目录学传统决定了英国书籍史研究的目录学倾向，他们更关注书籍的物质形态以及物质形态如何影响书籍流通和阅读。^①德国的出版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十五世纪以来延续至今的法兰克福书展和莱比锡书展，但他们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影响更大——我们足足用了一章来讲述德国人的理论贡献。因此，要说哪种传统占据主流，哪种忝居其次，并不符合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性质和学科现状。现在这三种传统彼此渗透。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就是受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和法国当代哲学的启发。英美经典的分析目录学对法国书籍史研究影响有限，法国史家更愿意坚守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关怀，但麦肯锡关于书籍物质形态表述功能的理论，被夏蒂埃采纳，成为他主持编纂法国出版通史的理论基础之一。^②这三种书籍史研究传统，虽然各有渊源，但在研究实践中不是体现为国别的差异，而是代表问题的不同性质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有法国年鉴学派式的问题和解答方式，但不能说这些问题和解法就是法国人独有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做就不合适。

最近出版的阅读史研究基础读本，也糅合了以上三种传统，沿袭了相同的学科理论构架。^③理论总是很抽象。把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用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中，就会歧义纷呈，很难从各个文化传统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中梳理出一个共同的历史发展逻辑，通过比较研究为世界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作铺垫。尽管如此，大多数书籍史和阅读史专家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理论预设，比如阐释社群、阐释策略、书籍形态的表述功能、读者的能动作用，以及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在阅读行为中产生的距离，等等。这些假设，其实都试图理清阅读行为中读者、文本、作者三者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这些关系，自有阅读行为以来，就一直存在。技术进步和媒介变革，其实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变读者、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或阅读、文本、书写之间的关系；当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革命也是如此。这些关系，应该是阅读史关注的中心。

^①关于英法在史料和研究传统上的差异，见 Feather 1980.

^② Chartier 1987a.

^③ Towheed, Crone, and Halsey 2011.

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尽管源自不同的传统，或许有益于深化对中国书籍传统和历史上阅读行为的认识。本书的读者，料想对国内的目录学、印刷史、出版史、书籍史及相关领域的传统和成就已相对熟悉。欧美学者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则经历了从印刷技术史、出版史，到书籍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历程，这显然是受欧美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卡特（Thomas Carter）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西传，钱存训研究中国印刷术和造纸术，中文读者都已经熟悉。^①在此之前，恒慕义（Arthur Hummel）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介绍过中国书籍史。自1927年至1954年，恒氏一直主掌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经眼和经手的中文古籍数量巨大，相关文章散见图书馆和亚洲研究专业学报。^②但当时重要的两个研究都是华裔学者的贡献：一是谭卓垣（Cheuk-woon Taam）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讨论清代的藏书史；一是吴光清（K. T. Wu）1943年发表的论文，概述明代的印刷出版业。^③此后，方志彤（Achilles Fang）把叶德辉的《藏书十约》和孙从添的《藏书纪要》翻译成英文发表。^④中国书籍史上的部分重要文献，大抵在这二十年里逐一展示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这个时期，北美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主要议题是藏书史，以及古籍形制和分类。当时有一些华裔图书馆学家参与入藏和整理中文古籍，这些都是他们在与同事交流中避不开的议题。

印刷史、藏书史和古籍形制研究，直接启发了欧美学者对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史的兴趣。钱存训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他关于先秦书籍史的研究，至今仍然无法取代。^⑤他的书籍史研究偏重书籍的技术内涵，不管这书是抄本还是印本。七十年代末起，这种重技术的倾向减弱，书籍承载的文本和目录学特征成为新的突破口。受欧洲传统的古典研究和《圣经》研究启发，谭朴森（Paul Thompson）和罗浩（Harold D. Roth）把欧洲的文本研究方法分别用于整理考释《慎子》和《淮南子》，勾勒了这两个文本的

① Carter 1955; Tsien 1985. 国内均有中文译本。

② 比如 Hummel 1931; Hummel, 1941; 关于恒氏的学术贡献和中文古籍收藏成就，见 Beal 1984.

③ Taam 1933; Wu 1943.

④ Sun 1951; Ye 1950.

⑤ Tsien 1962.

传播演变史。^① 基于目录学的出版史研究，大体涵盖唐至民国时期，对宋、明、清三代尤其着力。敦煌卷子的书籍史意义和雕版印刷的起源，是唐代书籍史研究的两个焦点，前者以巴黎的戴仁（Jean-Pierre Drège）为代表，后者则以伦敦的巴瑞特（Timothy H. Barrett）为领军。^② 牛津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则继承了英国汉学传统，他研究唐及唐以后印本和抄本白话文学的文本演变，对于文本和传世目录都很重视。^③ 宋、元、明、清的出版文化史研究，争论的焦点是“出版高潮”（publishing boom）到底何时出现。艾思仁（Sören Edgren）研究南宋杭州的书铺，贾晋珠（Lucille Chia）则研究建阳书坊，他们认可传统的观点，认为十二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出版高潮，书籍很普遍。^④ 十二世纪兴起的道学，为南宋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思想基础，尽管当时的人对印本爱恨交加。^⑤ 研究明清出版史的人则认为，出版高潮并非出现于十二世纪，而是出现于十六世纪末，这时印本在种类和数量上终于超过了抄本，流传更广，地位更稳固。名古屋大学的井上进和东京大学的大木康是这一派的中坚，对欧美学者影响很大。剑桥的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则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即便明末出现了出版高潮，十八世纪的读书人还是抱怨找不到书读，手抄仍然是书籍传播的重要手段。^⑥ 这些研究，都关注宋元明清中心城市的出版活动或重要的出版中心，依据的都是传世目录，设想的读者也都是城镇读者和精英读者。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研究闽西四堡出版业，突破了这些局限。四堡地处偏僻，从十九世纪中叶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该地书坊出版的书籍大抵销往乡村和边远地区，直达云贵川。书籍内容也主要迎合村塾和普通读者的需要。^⑦ 民国出版史研究，重点是欧洲近代印刷技术传入和中国出版文化近代化。戴仁也是这一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78年法兰西学院就出版了他关于商务印书馆的

① Shen Dao 1979; Roth 1992.

② Drège 1991; Barrett 2008.

③ Dudbridge 2000; Dudbridge 2005, 3-93.

④ Edgren 1989; Chia 2002; Chia 2003.

⑤ Cherniack 1994; De Weerd 2007.

⑥ 大木康 2004; 井上进 2006; McDermott 2006.

⑦ Brokaw 2007.

研究；二十多年后，芮哲非 (Christopher A. Reed) 出版关于上海印刷出版业近代化的专著。^①

欧美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如此侧重出版史，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切入点很契合丹顿的传播循环模式，由此可上溯著作史，下延至书籍流通和阅读史，最终涵括书籍文化史。这其实也是欧美书籍史研究的发展路径。但包筠雅和梅尔清 (Tobie Meyer-Fong) 意识到，中国书籍史研究应该凸显中国传统书籍文化的独特性。在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历时变化和地域差异时，她们建议，学者也应该从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角度问一些独特的问题，以避免欧美书籍史研究模式中的“欧洲中心论”。所谓中国传统的独特性，当然是基于雕版印刷技术和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以及书籍制作、流通和使用赖以展开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和教育模式，这里面除了出版商和制作者、作者和读者，还涉及书籍在社会分层、政治运作、文化演变等方面扮演的角色。^② 书籍在其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与周围的人物和环境紧密互动，这其实就是丹顿的传播循环模式在中国书籍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阅读是体现文本意义和书籍文化的最终环节。在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和他们在北美的传人提出阅读史概念后不久，汉学界就有人跟进。最先进入这个领域的是思想史和哲学史学者，然后是研究明清小说和戏曲的专家。在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圈子里，朱熹的读书法最受瞩目，因为它涉及儒家经典注疏传统、知识论、道学的学问观和教育史。朱熹在读书法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畴，经由思想史和哲学史专家阐释，已经足够清晰，^③ 但这些阅读观念如何影响后来的阅读理论和实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文学专家中，何谷理 (Robert Hegel) 和马兰安 (Anne McLaren) 的研究比较早，也受人瞩目。何氏关心印本小说的物质形态对阅读的影响。他注意到明末出版物大多以半叶十行二十字为行格标准，他称之为出版标准化。他还发现，不同形态的出版物，为不同的目标读者制作：绣像的豪华本当然是给有钱

^① Drège 1978; Reed 2004.

^② 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书籍史研究状况和讨论的主要问题，可参看 Brokaw 2005a; Brokaw 2005b; Brokaw 2007; Meyer-Fong 2007; Reed 2007.

^③ 仅列举数例：van Zoeren 1991, 230–249; Gardner 1986; Gardner 1990; Gardner 2003; Gardner 2007; De Weerdt 2007.

人刻印的，穷人只能读到俗滥的坊刻本。^① 马氏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白话小说的读者群如何扩展到“愚夫愚妇”，她明确借用“阅读公众”这个概念，指代明清白话小说的隐含读者。^② 由于史料零散稀少，还原历史上的真实阅读行为很困难，这样模糊地讨论白话文学的隐含读者，也是迫不得已。这种史料、方法和理论的困境，何予明在她新出版的明末书籍文化史中有所突破。她不再费力地去寻找真实读者和阅读遗迹，转而关注文本生产和使用的模式，她的描述可能更接近明末某些真实的阅读习惯。何予明的切入点是书本身，她考察了当时坊刻俗本的文本特征及形式特征（尤其是页面布局），推断读者如何使用这些时俗的文本，认为这些明代俗本的读者，能与文本互动，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进而赋予明代坊刻俗本文化意义，而这一意义，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为崇尚正统精英文化的人忽略甚至鄙弃。^③ 至于长时段的中国阅读史，现在尚无著作面世。2003年出现的一部博士论文，试图描述1000-1800年中国出现的阅读模式，以及儿童、妇人、男子和非汉族读者的阅读观念、阅读方法，^④ 但这是一个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式的考察，没有把阅读模式纳入书籍史中，也算不得历史学研究，因为在作者看来，这八百年中，中国的读者似乎一直遵循既定的几种模式，读同样的书，没有变化。

书籍史和阅读史正在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但其他学科，尤其是思想史，仍然在这个新的领域受到尊崇，一些基本的思想史假设被视为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历史假设，它们需要默认这些假设，并通过研究证明这些假设。进步和启蒙史观当然影响最大。印刷在近代启蒙运动和科学进步中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早期的书籍史研究一直给以积极肯定，艾森斯坦的三卷本著作，其中心就是支持这个思想史假设。但约翰斯认为，书籍在文化中的作用，与传统假想去甚远，因为作者意图和读者阐释往往有差距，甚至悖离。^⑤ 书籍带来的不一定是进步，有时是束缚。这种启蒙假设，在中国书籍

① Hegel 1985; Hegel 1998; Hegel 2005.

② McLaren 1995; McLaren 2005.

③ He 2013.

④ Yu 2003.

⑤ Eisenstein 1980; Baron et al 2007 支持艾森斯坦；Johns 1998.

史研究中也很有市场。突出的例子就是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它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一直是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话题。十六世纪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变革，不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半革命性的，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观念变革，思想史家当然津津乐道，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精神生活，包括阅读行为，以及如何通过阅读生成新的思想，还得小心求证，因为在哲学生产中，实践大抵落后于理论。井上进认为，十六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出版高潮，便是得益于阳明心学的推动。^①周启荣也持类似的启蒙史观，认为十六世纪的出版高潮，阳明心学厥功甚伟，而士商积极参与出版活动，造就了一个“士人公共空间”（*literati's public sphere*），挑战正统的经典阐释，并通过选刻时文影响科举和政治决策——这都是出版高潮的效应。^②事实上，考察实践，考察实践遵循的机理，不仅会揭示思想生产的过程，也能告诉我们传统如何延续和断裂，进而帮助我们重新衡量思想史和观念史上的变革。阐释阳明心学的理论逻辑和思想史意义固然重要，了解这种哲学观念的生产过程，重估它与前代传统的关系，会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开辟新的领域。

阅读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自我提升，有的甚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崇高。读者使用一个文本，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阅读本是复杂多样的行为，史家可以选择史料，根据预设立场裁剪和阐释，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并不代表历史上的读者的理解。书籍史和阅读史，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科规范，而不仅仅是回应其他学科的问题和假设——读者在历史上真的存在，他们的阅读行为真的发生过，他们的文本具有特定的历史特征，他们凝固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阅读史家的任务就是重现和阐释他们的阅读行为，不是演绎个别明星读者生产的观念——那只是行为的产物，并不代表行为本身。如果说，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了解了阅读史如何从文学批评、目录学和书籍史中独立出来，划定自己的学科疆界，那么摆脱思想史假设的羁绊，是阅读史家在实际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又一个难题。

①井上进 2002.

②Chow 2004.

参考文献

- Adams, Thomas R., and Nicolas Barker. 2001. "A New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Book." In *A Potencie of Life: Books in Society*, edited by Nicolas Barker, 5–43. London: British Library and Oak Knoll.
- Allan, David. 2003. "Some Methods and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Reading: Georgian England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3 (1): 91–124.
- Allen, James Smith. 1983. "History and the Novel: Mentalite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22 (3): 233–52.
- . 1987.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Modern France, 1800-1940."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5 (2): 263–86.
- . 1991. *In the Public Eye: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Modern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to the History of Reading: Review Essay." *Libraries and Culture* 28 (3): 319–26.
- Altick, Richard D. 1957.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mtower, Laurel. 2000. *Engaging Words: The Culture of Read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New York: Palgrave.
- Baron, Sabrina A, Eric N Lindquist, and Eleanor F Shevlin, ed. 2007. *Agent of Change: Print Culture Studies After Elizabeth L*.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Barrett, Timothy H. 2008. *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rthes, Roland. 1977. *Image, Music, Text*.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 Beal, Edwin G. 1984. "Arthur W. Hummel and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74 (1): 7–15.
- Bender, John. 1992. "A New Hi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Life* 16: 1–20.
- Bennett, H. S. 1952. *English Books & Readers, 1475-1557: Being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Trade from Caxton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Stationer's Comp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65. *English Books & Readers, 1558-1603: Being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Trad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70. *English Books & Readers 1603 to 1640: Being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Trade in the Reigns of James I and Charles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rn, Raymond. 1976. "Livre Et Société After Ten Years: 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51 (1): 287–312.
- Blair, Ann. 1992. "Humanist Methods in Natural Philosophy: The Commonplace Book."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3 (4): 541–51.
- . 1997. *The Theater of Nature: Jean Bodin and Renaissance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lum, Rudolf. 1991. *Kallimachos: 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 Translated by Hans H. Wellisch.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Booth, Wayne C. 1974. *A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Press.
- .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yarin, Jonathan, ed. 1993. *The Ethnography of Rea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yman Hackel, Heidi. 2005. *Reading Materia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rint, Gender, and Lite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kaw, Cynthia J. 2005a.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3–5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5b.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 (1): 135–65.
- . 2007.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Brown, Candy. 2004. *The Word in the World: Evangelical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in America, 1789-188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rown, Robert E. 2005. "Reading (Writing) and Religion."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31 (3-4): 171–77.
- Burke, Peter. 1978.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Temple Smith.
- Burnett, John, David Vincent, and David Mayall, ed. 1984.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Working Class: An Annotated*. Brighton: Harvester.
- Carter, Thomas Francis. 1955.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Edit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2d ed. New York: Ronald Press.
- Cavallo, Guglielmo, and Roger Chartier, ed. 1999.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Oxford: Polity Press.

- Chartier, Roger. 1987a.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Book: From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to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Proceedings* 97 (1): 299–329.
- . 1987b.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ed. 1989. *The Culture of Print: Power and the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 . 1994.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 . 1995.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 1997a.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1997b.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he Book." Translated by Eric D. Friedman. *SubStance* 26.1 (82): 9–11.
- . 1999. "Reading Matter and 'popular' Read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edited by 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269–84. Oxford: Polity Press.
- . 2007. *Inscription and Erasure: Literature and Written Culture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haytor, H. J. 1966. *From Script to Print: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Vernacular Literature*.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 Cherniack, Susan. 1994. "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 (1): 5–125.
- Chia, Lucille. 2002.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 . 2003.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284–3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Chow, Kai-wing. 2004.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clough, Stephen. 1998. “Recovering the Reader: Commonplace Books and Diaries as Sources of Reading Experience.” *Publishing History* (44): 5–37.
- . 2007a. *Consuming Texts: Readers and Reading Communities, 1695-187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 2007b. “Reader: Books and Biography.”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edited by Simon Eliot and Jonathan Rose, 50–61. Oxford: Blackwell.
- Collins, Arthur Simons. 1928. *The Profession of Letter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Author to Patron, Publisher, and Public, 1780-1832*.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Ltd.
- Cranney, A. Garr, and Janet Smith Miller. 1987. “History of Reading: Status and Sources of A Growing Field.” *Journal of Reading* 30 (5): 288–98.
- Culler, Jonathan D. 2002.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Darnton, Robert. 1971.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Daedalus* 100: 214–56.
- . 1979.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 1985.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 1987. "Histoire Du Livre,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 An Agenda for Comparative History." *Publishing History* (22): 33–41.
- . 1990.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 2010. *The Devil in the Holy Water or the Art of Slander from Louis XIV to Napole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Davidson, Cathy N., ed. 1989.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Natalie Z. 1975.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3. "Beyond the Market: Books as Gift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Prothero Lec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Fifth Series, 33: 69–88.
-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 Weerdt, Hilde. 2007.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l Col, Andrea, ed. 1996. *Domenico Scandella, Known as Menocchio: His Trials Before the Inquisition (1583-1599)*. Translated by John Tedeschi and Anne C. Tedeschi. Binghamton, N.Y: Medieval & Renaissance Texts & Studies.
- Drège, Jean Pierre. 1978. *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 . 1991.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Dudbridge, Glen. 2000. *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 London: British Library.
- . 2005. *Books, Tales and Vernacular Culture: Selected Papers on China*. Leiden: Brill.

- Edgren, Sören. 1989. "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Hangzhou."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61: 1–212.
- Edwards, Mark U. 1994.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isenstein, Elizabeth L. 1980.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iot, Simon. 1994. "What Are We to Do about the History of Reading?" *The Author* 55 (2): 69–70.
- Engelsing, Rolf. 1974. *Der Bürger Als Leser: Leser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1500-1800*. Stuttgart: Metzler.
- Erickson, Lee. 1990. "The Economy of Novel Reading: Jane Austen and the Circulating Librar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30 (4): 573–90.
- Escarpit, Robert. 1958.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 1971.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Ernest Pick. 2nd ed. London: Frank Cass.
- Feather, John. 1980. "Cross-Channel Currents: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and l'histoire Du Livre." *The Library* s6-II (1): 1–15.
- Febvre, Lucien P. 1942.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aris: Albin Michel.
- Febvre, Lucien P., and Henri-Jean Martin. 1958.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Albin Michel.
- Finkelstein, David,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 2006.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Fish, Stanley E. 1970.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2 (1): 123–62.
- . 1976a.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 *Critical Inquiry* 3 (1):

191–96.

———. 1976b. “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 *Critical Inquiry* 2 (3): 465–85.

Freund, Elizabeth. 2003.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New ed. London: Routledge.

Frykholm, Amy Johnson. 2004. *Rapture Culture: Left Behind in Evangelical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dner, Daniel K. 1986. *Chu Hsi and the Ta-Hsüeh: 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2003. *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7. *The Four Books: The Basic Teachings of the Later Confucian Tradition*. Indianapolis, Ind: Hackett.

Gardner, Daniel K., trans. 1990. *Learning to Be a S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nette, Gérard. 1972. *Figures III*. Paris: Seuil.

Gerrard, Teresa. 1998. “New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nswers to Correspondents’ in the Family Herald, 1860-1900.” *Publishing History* 43: 53–69.

Gibson, Walker. 1950. “Authors, Speakers, Readers, and Mock Readers.” *College English* 11 (5): 265–69.

Gilmont, Jean-François, ed. 1998.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ook*. Translated by Karin Maag. Aldershot: Ashgate.

Gilmore-Lehne, William J. 1989. *Reading Becomes a Necessity of Life: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Rural New England, 1780-1835*. 1st ed.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Ginzburg, Carlo. 1992.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 Tedeschi and Anne C. 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oodman, Kenneth S. 1984. "Unity in Reading." In *Becoming Readers in a Complex Society*, edited by Alan C Purves and Olive S Niles, 79–114. Chicago, Ill: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 Goody, Jack, ed.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6. *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7.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0.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 Goulemot, Jean Marie. 1994. *Forbidden Texts: Erotic Literature and Its Read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ranslated by James Simpson. Cambridge: Polity.
- Graff, Harvey J. 1991. "Literacy, Libraries, Lives: New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ies." *Libraries and Culture* 26 (1): 24–45.
- Grafton, Anthony. 1997. "Is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 Marginal Enterprise?: Guillaume Budé and His Books."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91 (2): 139–57.
- . 2006. "The History of Ideas: Precept and Practice, 1950–2000 and Beyo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7 (1): 1–32.
- Greenblatt, Stephen. 1980.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 ed. 1982. *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Norman, OK: Pilgrim.

- . 1987.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1990. *Learning to Curse: Essays in Early Modern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Greg, W. W. 1966.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Maxwell J.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riffiths, Paul J. 1999. *Religious Reading: The Place of Reading in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David D. 1995.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In *Histoires Du Livre: Nouvelles Orientations*, edited by Hans Erich Bodeker, 47–60. Paris: IMEC: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 . 1996. *Cultures of Pri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He, Yuming. 2013.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Hegel, Robert E. 1998.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gel, Robert E. 1985. "Distinguishing Levels of Audience for Ming-Ch'ing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akakida Rawski, 112–42.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5. "Niche Marketing for Late Imperial Fiction."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235–6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nkin, David M. 1998. *City Reading: Written Words and Public Spaces in Antebellum New Y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ggart, Richard.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Howard, Jean. 1986. "The New Historicism in Renaissance Studies."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6: 13–43.
- Howsam, Leslie. 2006. *Old Books and New Histories: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and Print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Huey, Edmund B. 1922. *The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of Reading: With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of Methods, Texts, and Hygiene in Reading*. New York: Macmillan.
- Hummel, Arthur W. 1931. "Ts'ung Sh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1 (1): 40–46.
- . 194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1 (2): 71–76.
- Hunt, Lynn Avery, ed.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Iser, Wolfgang. 1972.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New Literary History* 3 (2): 279–99.
- . 1974.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H. J. 2001. *Marginalia: 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Romantic Readers: The Evidence of Marginal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Ian. 2004.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Readers and Rea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 (4): 1041–54.
- Jajdelska, Elspeth. 2007. "Pepys in the History of Reading."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0 (3): 549–69.
- Jardine, Lisa, and Anthony Grafton. 1990. "'Studied for Action': How Gabriel

- Harvey Read His Livy." *Past & Present* 129 (1): 30–78.
- Jauss, Hans Robert. 1970.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Benzinger. *New Literary History* 2 (1): 7–37.
- . 1982.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lated by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2001. "The Identity of the Poetic Text in the Changing Horizon of Understanding." In *Reception Study: From Literary Theory to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James L Machor and Philip Goldstein, 7–28. New York: Routledge.
- Johns, Adrian. 1998.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ntgen, Eugene R. 1990. "Reconstructing Elizabethan Reading."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Rice)* 30 (1): 1–18.
- Lehan, Richard. 1990.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21 (3): 533–53.
- Levine, Lawrence W. 1988. *Highbrow / Lowbrow: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ttau, Karin. 2006. *Theories of Reading: Books, Bodies and Bibliomania*. Cambridge: Polity.
- Lovell, Stephen. 2000. *The Russian Reading Revolution: Print Culture in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Era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Lyons, Martyn. 1999. "The History of Reading from Gutenberg to Gates." *The European Legacy* 4 (5): 50–57.
- Lyons, Martyn, and Lucy Taksa. 1992. *Australian Readers Remember: An Oral History of Reading 1890-1930*.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hor, James L., ed. 1993. *Readers in 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ontext of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chor, James L., and Philip Goldstein, ed. 2001. *Reception Study: From*

- Literary Theory to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Martin, Henri-Jean. 1994.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Dermott, Joseph P. 200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McGann, Jerome J. 1991. *The Textual Con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cHenry, Elizabeth. 2002. *Forgotten Readers: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Socie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cKenzie, D. F. 1986.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 . 2002. *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Peter D. McDonald and Michael Felix Suarez.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McLaren, Anne E. 1995. "Ming Audiences and Vernacular Hermeneutics: The Use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ung Pao* 81 (1/3): 51–80.
- . 2005. "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152–83.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lton, James Van Horn. 2001.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Fong, Tobie. 2007.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 (3): 787–817.
- Mornet, Daniel. 1910. "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ées (1750-1780)."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17: 449–96.

- . 1926. *La Pensé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 Colin.
- . 1933.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Paris: A. Colin.
- Moss, Ann. 1996. *Printed Commonplace-Book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Renaissance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Nalle, Sara T. 1989. "Liter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astile." *Past and Present*, no. 125 (November): 65–96.
- Nord, David Paul. 2001. *Communities of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Their Readers*.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 2004. *Faith in Reading: Religious Publishing and the Birth of Mass Media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kker, Patricia. 2003. *Social Stories: The Magazine Nove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 Ong, Walter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Methuen.
- Parkes, M. B. 1992. *Pause and Eff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unctuation in the West*. Aldershot: Scolar Press.
- Pels, Dick. 1997. "Mixing Metaphors: Politics or Economics of Knowledge?" *Theory and Society* 26 (5): 685–717.
- Pieters, Jürgen. 2001. *Moments of Negotiation: The New Historicism of Stephen Greenblat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Leah. 2004. "Reading: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Book History* 7: 303–20.
- Radway, Janice A. 1986. "Reading Is Not Eating: Mass-Produced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Metaphor." *Book Research Quarterly* 2: 7–29.
- Raven, James. 1998. "New Reading Histories, Print Cultur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ange: The Cas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Social History* 23 (3): 268–87.

- Raven, James, Helen Small, and Naomi Tadmor, ed. 1996. *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ed, Christopher A. 2004.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BC Press.
- . 2007. "Gutenberg and Modern Print Cultur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Book History* 10: 291–315.
- Ricœur, Paul. 1984-1988. *Time and Narrative*.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 Jonathan. 1992.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3 (1): 47–70.
- . 1998. "The History of Books: Revised and Enlarged."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59).
- . 2001.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the History of Read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36 (4-5): 595–605.
- Ross, Marlon B. 1990. "Contingent Predilections: The Newest Historicisms and the Question of Method." *Centennial Review* 34: 485–538.
- Roth, Harold D. 1992.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 Ann Arbor, MI.: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Rubin, Joan Shelley. 2003. "W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Book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0 (2): 555–75.
- Saenger, Paul Henry. 1997. *Space Between Words: 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cord, James A. 2000. *Victorian Sensation: The Extraordinary Publication, Reception, and Secret Authorship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arpe, Kevin. 1979. *Sir Robert Cotton, 1586-1631: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Early*

-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0a. *Reading Revolu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2000b. *Remapping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Culture of Seventeenth-Century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Reading Revelations: Prophecy, Hermeneutics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In *Readin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ited by Kevin Sharpe and Steven N. Zwicker, 122–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rpe, Kevin, and Steven Zwicker, ed. 1987. *Politics of Discourse: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ed. 2003. *Readin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n Tao. *The Shen Tzu Fragments*. Edited by Paul M. Thomp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rman, William H. 1995. *John Dee: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Spufford, Margaret. 1979. "First Steps in Literacy: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Experiences of the Humblest Seventeenth-Century Spiritual Autobiographers." *Social History* 4 (3): 407–35.
- . 1981.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St. Clair, William. 2004.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ading." *The John Coffin Memorial Lectu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School of Advanced Study, University of London*. URL: <http://ies.sas.ac.uk/Publications/johncoffin/stclair.pdf>.
- Stewart, Garrett. 2006. *The Look of Reading: Book, Painting, 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ock, Brian. 2006a. "Commentary: Reading and Heal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37 (3): 643–54.
- . 2006b. "Minds, Bodies, Readers: I. Healing, Medi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37 (3): 489–501.
- . 2006c. "Minds, Bodies, Readers: II. Healers without Books, Readers without Souls." *New Literary History* 37 (3): 503–13.
- . 2006d. "Minds, Bodies, Readers: III. Clinical Therapies, Readerly Mental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37 (3): 515–24.
- Suleiman, Susan Rubin, and Inge Crosman Wimmers, ed. 1980. *The Reader in the Text: 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n, Ts'ung-T'ien. 1951. "Bookman's Manual." Translated by Achilles F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1-2): 215–60.
- Sutherland, John. 1988. "Publishing History: A Hole at the Centre of Literary Sociology." *Critical Inquiry* 14 (3): 574–89.
- Taam, Cheuk-woon. 1933.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Ph.D. Dissertation, Chicago, I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Tanselle, G. Thomas. 1981. *The History of Books as a Field of Study: A Paper*. Chapel Hill: Hanes Foundation, Rare Book.
- . 1998. *Literature and Artifacts*. Charlottesvill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Tompkins, Jane P, ed. 1980.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owheed, Shafquat, W.R. Owens, Katie Halsey, and Rosalind Crone, eds. 2011. *The History of Reading*. 3 vol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Tsien, Tsuen-hsuei. 1962.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5. *Paper and Printing*. Vol. 5, part 1.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Zoeren, Steven Jay. 1991. *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enstra, Jan R. 1995. "The New Historicism of Stephen Greenblatt: On Poetics of Cultu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 *History and Theory* 34 (3): 174–98.
- Vincent, David. 1981. *Bread, Knowledge, and Freedom: 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 Class Autobiography*. London: Europa.
- . 2000. *The Rise of Mass Literacy: Reading and Writing in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 Waples, Douglas, Bernard Berelson, and Franklyn R Bradshaw. 1940. *What Reading Does to People: A Summary of Evidence on the Social Effects of Reading and a Statement of Problems for Research*. Chicago, I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rner, Michael. 1990.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tt, Ian P. 1957.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 Williams, Raymond.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Verso.
- Wimsatt, William K. 1954.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Wolf, D. R. 2000. *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K.T. 1943. "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 (3): 203–260.

- Ye, Tehui. 1950. "Bookman's Decalogue." Translated by Achilles F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 (1-2): 132-173.
- Yu, Li. 2003.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80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us, OH: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井上進。2002。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
- 大木康。2004。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中文

西文

A

阿尔都塞，路易

Althusser, Louis

阿尔提克，理查德

Altick, Richard

阿卡迪亚

Arcadia

阿维利亚内达

Avellaneda

艾兰，大卫

Allan, David

艾伦，詹姆斯·史密斯

Allen, James Smith

艾瑟尔，沃尔夫冈

Iser, Wolfgang

艾森斯坦，伊丽莎白

Eisenstein, Elizabeth

艾思仁

Edgren, Sören

安道尔，劳丽儿

Amtower, Laurel

昂，沃尔特

Ong, Walter

B

巴尔扎克

Balzac, Honoré de

| | |
|-----------|------------------------|
| 巴克尔, 尼科拉斯 | Barker, Nicolas |
| 巴瑞特 | Barrett, Timothy H. |
| 巴特, 罗兰 | Barthes, Roland |
| 版权空档期 | copyright window |
| 包筠雅 | Brokaw, Cynthia J. |
| 本德, 约翰 | Bender, John |
| 毕尔兹利 | Beardsley, M. C. |
| 彼特拉克 | Petrarca, Francesco |
| 编读往来 | letters to the editor |
| 边批 | marginalia |
| 博丹, 让 | Bodin, Jean |
| 波德莱尔 | Baudelaire, Charles |
| 伯克, 彼得 | Burke, Peter |
| 伯克, 约翰·亚当 | Bergk, Johann Adam |
| 布迪厄 | Bourdieu, Pierre |
| 布朗, 坎蒂 | Brown, Candy G. |
| 布朗, 托马斯 | Browne, Thomas |
| 布斯, 韦恩 | Booth, Wayne |
| C | |
| 蔡特 | Chaytor, H. J. |
| 参与者 | participant |
| 操作性规范 | operational convention |
| 册子本 | codex |
| 阐释策略 | interpretive strategy |

| | |
|-----------------|---|
| 阐释社群 | interpretive community |
| 阐释学 | hermeneutics |
| 成长小说 | roman de formation |
| 出版高潮 | publishing boom |
| 传播循环 | communication circuit |
| 闯入 | poaching |
| 茨威克尔, 斯蒂文 | Zwicker, Steven N. |
| D | |
| 答读者问 | answer to correspondents |
| 大众读者群 | mass readership |
| 大众工业社会 | mass industrial society |
| 戴仁 | Drège, Jean-Pierre |
| 戴维斯, 娜塔莉 | Davis, Natalie Zemon |
| 丹顿, 罗伯特 | Darnton, Robert |
| 但丁 | Dante |
| 德·塞托 | de Certeau, Michel |
| 德加 | Degas, Edgar |
| 德雷克, 威廉 | Drake, William |
| 狄, 约翰 | Dee, John |
| 狄德罗 | Denis Diderot |
| 读和写的政治学 | politic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
| 《读书法》(约翰·亚当·伯克) | <i>Die Kunst, Bücher zu Lesen</i> (Johann Adam Bergk) |
| 读书指南 | reading instruction |
| 读写 | literate |

| | |
|-----------|-----------------------------------|
| 读写社会 | literate society |
| 读者反应批评 |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
| 读者世界 | world of the reader |
| 读者式方法 | readerly method |
| 读者研究 | study of readership |
| 读者自主 | readerly autonomy |
| 杜尔凯姆 | Durkheim, Émile |
| 杜米埃 | Daumier, Honoré |
| 杜威 | Dewey, John |
| E | |
| 恩格尔幸, 鲁尔夫 | Engelsing, Rolf |
| F | |
| 《法兰西书目》 | <i>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i> |
| 泛读 | extensive reading |
| 方丹 - 拉图尔 | Fantin-Latour, Henri |
| 方志彤 | Fang, Achilles |
| 非读写 | nonliterate |
| 非读写社会 | nonliterate society |
| 费弗尔, 吕西安 | Febvre, Lucien |
| 费什, 斯坦利 | Fish, Stanley |
| 分析目录学 |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
| 分析式阅读 | analytical reading |
| 封闭式文本 | closed text |

| | |
|------------|----------------------------------|
| 弗莱哥尔摩, 艾米 | Frykholm, Amy J. |
| 符号控制机制 | mechanism of symbolic domination |
| 符号学 | semiotics |
| 福楼拜 | Flaubert, Gustave |
| 福音神学 | Evangelicalism |
| 副文本 | Paratext |
| G | |
| 高度垄断 | high monopoly |
| 戈里菲斯, 保罗 | Griffiths, Paul J. |
| 格拉夫, 哈维 | Graff, Harvey J. |
| 格勒诺尔 | Grenoble |
| 格林布拉特, 斯蒂芬 | Greenblatt, Stephen |
| 个体阅读 | individual reading |
| 公共领域 | public sphere |
| 公共社群 | public community |
| 公共阅读 | public reading |
| 购买 | purchase |
| 古迪, 杰克 | Goody, Jack |
| 古勒莫, 让 | Goulemot, Jean M. |
| 观察者 | observer |
| 观念史 | history of ideas |
| 国际书籍年 | International Book Year |

H

哈贝马斯

哈克尔

海德，爱德华

汉密尔顿

郝山

何谷理

亨金，大卫

恒慕义

红与黑

华纳，迈克尔

华普勒斯，道格拉斯

霍尔，大卫

Habermas, Jürgen

Hackel, Heidi Brayman

Hyde, Edward

Hamilton

Howsam, Leslie

Hegel, Robert

Henkin, David M.

Hummel, Arthur William

Le Rouge et Le Noir

Warner, Michael

Waples, Douglas

Hall, David

J

吉布森，沃克尔

吉尔摩，威廉

集成

集体阅读

纪德

技术决定论

季尔兹，柯利福德

家访报告

济慈

贾德尔斯卡，艾尔斯培斯

Gibson, Walker

Gilmore-Lehne, William J.

librillo

collective reading

Gide, André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Geertz, Clifford

canvassers' reports

Keats, John

Jajdelska, Elspeth

| | |
|-------------|------------------------------|
| 贾晋珠 | Chia, Lucille |
| 贾维楼 | Cavallo, Guglielmo |
| 假想读者 | hypothetical readers |
| 揭示世界 | demythification of the world |
| 《子遗》 | Vestiges |
| 劫后余生 | Left Behind |
| 杰克逊, 希瑟 | Jackson, Heather J. |
| 结构主义 | structuralism |
| 解构主义 | deconstruction |
| 金艮, 尤金 | Kintgen, Eugene R. |
| 金兹堡, 卡洛 | Ginzburg, Carlo |
| 精读 | intensive reading |
| 精神生活史 / 心灵史 | history of <i>mentalité</i> |
| K | |
| 卡勒, 乔纳森 | Culler, Jonathan |
| 卡斯泰尔 | Castile |
| 开放式文本 | open text |
| 《坎特伯雷故事集》 | Canterbury Tales |
| 柯勒律治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
| 科顿, 罗伯特 | Cotton, Robert |
| 科尔克拉夫 | Colclough, Stephen |
| 克拉伦顿伯爵 | Clarendon, Earl of |
| 口述史 | oral history |

L

拉图尔, 布鲁诺

Latour, Bruno

拉文, 詹姆斯

Raven, James

兰森, 让

Ranson, Jean

朗, 伊丽莎白

Long, Elizabeth

朗读

reading aloud

雷诺阿

Renoir, Pierre-Auguste

礼仪用语

lingua sacra

李昂斯

Lyons, Martyn

李察森, 萨缪尔

Richardson, Samuel

历史读者

historical reader

利科, 保罗

Ricœur, Paul

连写抄

scriptura continua

列文, 劳伦斯

Levine, Lawrence W.

(文本) 留白

gap (in text)

娄威尔, 史蒂芬

Lovell, Stephen

卢梭

Rousseau

罗浩

Roth, Harold

罗斯, 乔纳森

Rose, Jonathan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M

马丁, 亨利 - 让

Martin, Henri-Jean

马兰安

Mclaren, Anne E.

麦甘, 杰罗姆

McGann, Jerome

| | |
|------------|-----------------------------|
| 麦克亨利, 伊丽莎白 | McHenry, Elizabeth |
| 麦克卢汉 | McLuhan, Marshall |
| 麦克斯, 沃尔特·本 | Michaels, Walter Benn |
| 麦肯锡 | McKenzie, Donald Francis |
| 曼海姆, 卡尔 | Mannheim, Karl |
| 梅尔清 | Meyer-Fong, Tobie |
| 媒体即信息 |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
| 弥尔顿, 约翰 | Milton, John |
| 《秘密》 | <i>Secretum</i> |
| 冥想式阅读 | meditative reading |
| 模拟读者 | mock reader |
| 末日幻想 | apocalyptic |
| 莫讷, 丹尼尔 | Mornet, Daniel |
| 墨守与出新 | constraint and invention |
| 默读 | silent reading |
| 目的论规范 | teleological convention |
| 目录学谬误 | bibliographical fallacy |
| 目录学文件 | bibliographical document |
| N | |
| 那勒, 萨拉 | Nalle, Sara T. |
| 内证 | internal evidence |
| 拈借 | appropriate / appropriation |
| 纽约杂志 | <i>New York Magazine</i> |
| 诺德, 大卫 | Nord, David Paul |

诺尔 - 瑟悌纳, 卡琳

Knorr-Cetina, Karin

O

欧克尔, 帕特丽霞

Okker, Patricia

P

皮普斯, 萨缪尔

Pepys, Samuel

普林斯, 杰拉尔德

Prince, Gerald

普鲁斯特

Proust, Marcel

普通读者

common reader

普通读者研究

study of common reader

Q

期待视域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起首字母

litterae notabilior

嵌入式读者

inscribed reader

强制力量

compelling force

乔叟

Chaucer

乔治王时代

Georgian Era (1717-1830)

情感谬误

affective fallacy

求知自得

reading intended to please (*plaire*)

劝世文

books of piety

R

热奈特，热拉尔

Genette, Gerard

人文主义阅读

humanist reading

芮哲非

Reed, Christopher A.

S

塞万提斯

de Cervantes, Miguel

瑟阔德，詹姆斯

Secord, James A.

舍勒，马克斯

Scheler, Max

社会控制

social domination

社会能量

social energy

社会属性

sociality

社会知识论

social epistemology

社群

social community

社群空间

communitarian space

圣克莱，威廉

St. Clair, William

时俗

popular

时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时俗阅读

popular reading

实用主义阅读

utilitarian reading

士人公共空间

literati's public sphere

世俗主义

secularism

受容谬误

receptive fallacy

受述者

narratee

| | |
|-----------|--|
| 受众史 | history of audience |
| 书钞 | commonplace book |
| 书钞新法（洛克） | “A New Method of a Common-Place Book” (John Locke) |
| 书痴 | bibliomania |
| 书籍史 | <i>histoire du livre</i> ; history of the book |
| 书迷来信 | fan mails |
| 书写 | writing |
| 书写物体 | written object |
| 说书艺人 | jongleur |
| 司汤达 | Stendhal |
| 私密化 | privatization |
| 私密阅读 | private reading |
| 思辨的技术 | technology of intellect |
| 斯切曼，芭芭拉 | Sicherman, Barbara |
| 寺院模式 | monastic model |
| 《苏格兰统计报告》 | <i>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i> |
| 苏雷曼 | Suleiman |
| 俗读者 | popular reader |
| 琐忆集成 | <i>librillo de memoria</i> |
| T | |
| 谭朴森 | Thompson, Paul |
| 谭瑟尔 | Tanselle, G. Thomas |
| 谭卓垣 | Taam, Cheuk-woon |
| 《堂吉诃德》 | <i>Don Quixote</i> |

| | |
|--------------|-----------------------------------|
| 《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 | <i>Troilus and Criseyde</i> |
| 《天地法则》 | <i>Universae naturae theatrum</i> |
| 图卢兹 - 罗特列克 | de Toulouse-Lautrec, Henri |
| 拓克萨 | Taksa |
| W | |
| 瓦特, 伊安 | Watt, Ian |
| 维姆萨特 | Wimsatt, W. K., Jr. |
| 魏特曼 | Wittmann, R. |
| 文本不确定性 | textual indeterminacy |
| 文本批评 | textual criticism |
| 文本社会化 | socialization of texts |
| 文本社会学 | sociology of text |
| 文本社群 | textual community |
| 文本世界 | world of the text |
| 文化材料 | cultural material |
| 文化扩散 | cultural diffusion |
| 文化诗学 | poetics of culture |
| 文化素养 | literacy |
| 文化素养谬误 | literate fallacy |
| 文化素养史 | history of literacy |
| 文学复制 | literary replication |
| 文学能力 | literary competence |
| 吴光清 | Wu, K. T. |
| 伍尔福 | Woolf, D. R. |

| | |
|---------|---|
| 物理表征 | physical features |
| X | |
| 《西方阅读史》 | <i>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i> |
| 锡德尼，菲利普 | Sydney, Philip |
| 夏蒂埃，罗杰 | Chartier, Roger |
| 夏丕，凯文 | Sharpe, Kevin |
| 现代受容研究 | modern reception study |
| 现象学 | phenomenology |
| 象征性获取 | symbolic acquisition |
| 消费主义 | consumerism |
| 消费主义阅读 | consumerist reading |
| 消遣读物 | occasionnels |
| 协同生产 | concurrent production |
| 谢曼，威廉 | Sherman, William H. |
| 心理分析 | psychoanalysis |
| 《新爱洛伊丝》 | <i>La Nouvelle Héloïse</i> |
| 新历史主义 | New Historicism |
| 新批评 | New Criticism |
| 《新生》 | <i>La Vita Nuova</i> |
| 形式主义 | formalism |
| 修辞 | rhetoric |
| 叙述者 | narrator |
| 学院模式 | scholastic model |
| 学院式阅读 | scholastic reading |

Y

| | |
|------------|--|
| 亚当斯, 托马斯 | Adams, Thomas R. |
| 亚眠 | Amiens |
| 姚斯, 汉斯·罗伯特 | Jauss, Hans Robert |
| 伊斯卡丕, 罗伯特 | Escarpit, Robert |
| 意图谬误 | intentional fallacy |
| 隐含读者 | implied reader |
| 隐含作者 | implied author |
| 印本 | printed book |
| 印本稳定说 | typographical fixity |
| 《印刷书的诞生》 | <i>L'apparition du Livre</i> |
| 印刷文化 | print culture |
| 英国出版同业公会 | Stationers' Company |
| 娱情自适 | reading intended to amuse (<i>distraindre</i>) |
| 语言能力 | linguistic competence |
| 语义学 | semantics |
| 源作品 | source work |
| 约翰斯, 阿德里安 | Johns, Adrian |
| 约翰逊, 塞缪尔 | Johnson, Samuel |
| 阅读革命 | <i>Leserevolution</i> ; reading revolution |
| 阅读即拈借 | reading as appropriating |
| 阅读社群 | reading community |
| 阅读史 | history of reading |
| 阅读政治学 | politics of reading |

Z

真实读者

real reader

政治价

political valence

中证

intermediate evidence

周绍明

McDermott, Joseph P.

宗教阅读

religious reading

左拉

Zola, Emile

左雷，罗纳德

Zboray, Ronald

作者

author

作者谬误

authorial fallacy

作者之死

death of the author

索引

A

阿尔都塞, 43

阿尔提克, 25, 67

艾兰, 93

艾伦, 27, 64, 82, 93, 99, 100, 124, 125, 126, 127, 128, 138, 139

艾瑟尔, 33, 34, 35, 41, 79, 126

艾森斯坦, 10, 13, 86, 124, 143, 168

艾思仁, 166

安道尔, 127, 128

昂, 沃尔特, 86, 143

B

巴克尔, 55, 114

巴瑞特, 166

巴特, 78, 79

版权保护, 133

包筠雅, 166, 167

背诵, 160

本德, 48

毕尔兹利, 80

彼特拉克, 127
边批, 92, 93, 103, 106 - 08, 132, 161
博丹, 20
伯克, 彼得, 86, 158
伯克, 约翰·亚当, 149
伯希和, 165
布迪厄, 18
布尔乔亚, 160
布朗, 坎蒂, 110, 112, 126
布朗爵士, 106
布斯, 32, 33

C

财产清单, 95
蔡特, 141
 《藏书纪要》, 165
藏书目录, 67, 92, 93, 95, 96, 97
 《藏书十约》, 165
册子本, 77, 143, 152
茨威克尔, 斯蒂文, 72, 132
查禁, 24
阐释策略, 17, 18, 19, 34, 37, 38, 40, 41, 49, 50, 94, 164
阐释社群, 37, 38, 40, 49, 60, 62, 63, 65, 71, 72, 88, 109, 112, 121, 126, 156, 164
抄本, 141 - 42, 152
 词间空, 142, 143, 144
 连写抄, 141 - 42, 144
抄本文化, 153
抄本学, 13
出版标准化, 167

出版高潮, 166
出版商, 82, 83
传播循环, 13, 14, 53, 54, 114, 115, 167
 缺陷, 55
 与书籍史研究, 54

D

大木康, 166
戴仁, 166
戴维斯, 娜塔莉, 26, 109
但丁, 127
丹顿, 13, 14, 26, 27, 49, 54, 61, 66, 99, 114, 115, 124, 133, 136, 149, 156, 167
 传播循环模型, 124
 《何谓书籍史? 》, 10, 54
 论阅读革命假说, 150
 论阅读史史料, 92 - 93
 论阅读史研究方法, 115
 《启蒙运动的生意》, 10
 与书籍史学科, 54
 《阅读史初阶》, 10, 15, 49, 92
德雷克爵士, 130, 132
德·塞托, 74, 75, 78, 80, 83, 90, 155, 156
狄德罗, 10, 151
杜德桥, 166
杜尔凯姆, 18
读书法, 94; 参见“阅读规范”
 约翰·伯克, 149
 朱熹, 167
读书指南, 参见“读书法”

杜威, 23

读写传统, 88

 非读写传统, 86, 88

读写技能, 85, 86, 89

读者, 15

 被动角色, 35

 假想读者, 83

 界定, 31 - 34, 34

 历史读者, 58 - 59

 理想读者, 32, 37, 40, 41

 模拟读者, 32

 偏见, 38

 普通读者, 9, 14, 59, 67, 84, 89, 92, 124, 125, 150, 161, 166

 嵌入式读者, 33

 社会分层, 21

 身份确认, 16, 17, 59 - 60

 虚拟读者, 32, 126

 隐含读者, 17, 32 - 33, 34, 35, 36, 41, 58, 59, 120, 125, 126, 128, 168

 与副文本, 16

 与书籍, 142

 与文本, 16, 17, 31, 62, 63, 74 - 75, 78

 与知识传播, 19

 与作者, 80

 在读者反应批评中, 16

 作为阅读史研究对象, 15 - 16

 真实读者, 18, 32, 33, 70, 83, 120, 122, 125, 126, 128, 134, 135, 168

 主动角色, 35, 36, 126

读者反应, 92

 历史特征, 34

读者反应批评, 10, 14, 17, 22, 26, 27, 29, 30, 47, 60, 70, 74, 75, 76, 83, 125, 126, 127, 129, 134, 163, 164

阐释学, 26, 30, 31, 38, 70, 125

方法论, 30 - 31

符号学, 30, 80, 122

结构主义, 26, 30

史学改造, 39 - 40

史学缺陷, 41 - 42

文本意义的产生, 17

现象学, 30

心理分析批评, 30

修辞类方法, 30

与新批评理论, 29

主观主义批评, 30

读者社群, 112

读者世界, 60, 63, 121, 143; 参见“文本世界”

E

恩格尔幸, 148, 149, 150, 151; 参见“阅读革命”

F

法兰克福书展, 67, 164

《法兰西书目》, 92

坊刻, 168

方志彤, 165

费弗尔, 13, 14, 23, 25, 67

费什, 35, 37, 38, 40, 60, 63, 112, 126

分析目录学, 13, 14, 25, 52, 70, 74, 76, 79, 80, 93, 115, 163, 164

福柯, 18, 43, 72, 79

福克斯, 147
弗莱哥尔摩, 112
副文本, 16
福音派, 108, 110, 126, 158, 161

G

个案研究, 65
格拉夫, 97
格拉夫顿, 162
戈里菲斯, 161, 162
格林布拉特, 43, 45, 47, 48, 49
公共社群, 110, 112
古迪, 23, 84 - 86, 88, 89
古勒莫, 117
谷腾堡, 13, 14, 141, 152, 153
观念史, 161, 169
国际书籍年, 10

H

哈贝马斯, 112
海德, 爱德华, 130
汉考克, 105
郝山, 51 - 52
何谷理, 167
哈克尔, 65
贺兰勋爵, 131
何予明, 168
亨金, 139
恒慕义, 165

华纳, 迈克尔, 109
华普勒斯, 道格拉斯, 23
华兹华斯, 96
 《淮南子》, 166
霍尔, 62, 67, 70, 148
 论阅读革命, 149, 150 - 51

J

吉布森, 30, 31
吉尔摩, 95, 148
济慈, 103
季尔兹, 47
计量史学, 67, 97, 122, 134, 157
技术决定论, 86, 121, 143, 151
贾德尔斯卡, 139
贾晋珠, 166
贾维楼, 136, 148
教学法, 94
教育史, 58, 92, 167
解构主义, 26, 42, 70, 125
 《劫后余生》, 112
杰克逊, 103
 说边批, 105 - 06
接受美学, 16, 22, 25, 31, 58, 163
 《子遗》, 123, 124
金艮, 94
金兹堡, 113, 160
井上進, 166
精神生活史, 23, 124, 126; 参见“心灵史”

精英文化, 63, 146, 168

卷子, 77, 152

K

卡勒, 36, 38, 40, 94

卡特, 托马斯, 165

《坎特伯雷故事集》, 127

科顿爵士, 129, 132

科尔克拉夫, 60

克拉伦顿伯爵, 130

柯勒律治, 96, 103, 106

口头传统, 84, 85, 86, 160; 参见“书写传统”

L

拉图尔, 布鲁诺, 18

拉文, 71, 72, 116

莱比锡书展, 67, 92, 164

朗, 伊丽莎白, 109

浪漫主义时期, 103, 106, 133, 134

李昂斯, 98

李察森, 151

利科, 60, 63, 75, 155

历史研究

 与政治参与, 129 - 30

历史主义, 4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

列文, 劳伦斯, 86, 158

留白, 35, 79

刘向, 13

垄断, 110, 133
娄威尔, 108
罗浩, 165
洛克, 102 - 03, 104
罗斯, 59, 67, 70, 83, 84, 93, 126

M

马丁, 13, 14, 25, 26, 67
马兰安, 167
麦甘, 61, 70
麦克亨利, 108
麦克鲁汉, 78, 143
麦克斯, 39
麦肯锡, 57, 61, 70, 74, 76, 78, 79, 80, 82, 90, 116, 120, 121, 154, 164
曼海姆, 18
梅尔清, 167
美国公理会差会达科塔教团, 87
弥尔顿, 130
《秘密》, 127
莫讷, 23, 25
目的论, 71, 88, 89, 95
目录, 96, 97
目录学, 10, 13, 124
目录学文件, 55
目录学元素, 90

N

那勒, 113
年鉴学派, 13, 14, 25, 27, 52, 54, 67, 70, 74, 89, 97, 134, 156, 163, 164, 167, 168

拈借, 63, 70, 75, 121, 122, 123, 155, 156, 157, 160

拈借说, 63, 156, 160

 应用, 157

 与符号学, 157

 与计量史学, 157

 与时俗文化, 161

 与阅读史, 156

诺德, 58, 99, 108, 110, 112

诺尔 - 瑟梯纳, 18

O

欧克尔, 110, 112

P

普林斯, 32

Q

期待视域, 38 - 39, 40 - 41, 49, 50

启蒙假设, 88, 169

启蒙史观, 168 - 69

钱存训, 165

乔叟, 127

R

热奈特, 33

芮哲非, 167

S

塞万提斯, 128

桑格尔, 141, 142, 143, 145, 153
瑟阔德, 123 - 24
斯切曼, 149
私人藏书, 131
思想史, 129, 161, 168
俗读者, 160
苏格兰统计报告, 108
苏雷曼, 30, 33
孙从添, 165
琐忆集成, 128
社会文化史, 51, 63, 70
舍勒, 18
 《慎子》, 166
 《圣经》, 13, 77, 86, 100, 102, 132, 147, 148, 150, 151, 152, 161, 165
 读《圣经》图, 101
圣克莱, 126, 132, 133, 134
时俗文化, 63, 70, 86, 158
时俗阅读, 160
实用主义, 39
识字率, 89
受容史, 39
受众史, 67, 70
书钞, 105
 《书钞新法》(约翰·洛克), 102
书痴, 162
书籍
 界定, 11 - 12
 历史认识在欧洲, 13
 牛津英语大词典, 11

三要素, 12, 115, 116, 117, 124, 154
物质形态, 16, 90
消费, 133, 135, 136
以意义为中心, 12
与历史学, 11
与目录学, 13
与社会关系, 109
与文学批评, 11
书籍史, 11, 42, 135, 168
 比较书籍史, 136
 德国传统, 14
 分析目录学模式, 14
 界定, 13 - 15
 跨学科性质, 15, 51 - 52
 目录学模式, 55, 56, 114
 书籍文化史, 168
 新书籍史, 13, 25 - 26, 66 - 67, 127
 学科形成, 10
 与读者反应批评, 14
 与分析目录学, 13, 14
 与目录学, 52 - 57
 与年鉴学派, 13 - 14
 与文学批评, 57 - 61
 中心任务, 58
书价, 133
书轮, 68, 69
书写, 86, 153
 功能, 153
 书写文化, 128

书写物体, 60, 61

书写传统, 84 - 86

与口头传统, 84 - 85

说唱艺术, 141

T

拓克萨, 98

谭朴森, 165

谭瑟尔, 10, 57

谭卓垣, 165

《堂吉诃德》, 128

《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 127

图书馆史, 97, 135

W

瓦特, 伊安, 85, 86

王阳明, 169

韦伯, 97

维姆萨特, 80

魏特曼, 149

文本, 16, 154

不确定性, 35, 79

阐释, 116

封闭式, 78, 79

副文本, 16

开放式, 79

类型, 134

社会化, 61, 70

稳定性, 122, 124

物质形态, 60, 61, 122, 124
消费, 133
意义, 41
与读者, 156
与书籍, 60
与作者, 139
文本目录学, 80
文本批评, 124
文本社会学, 57, 70, 76, 78, 79, 116, 120, 154, 164
 理论贡献, 79
 理论缺陷, 80
 与分析目录学, 76
 与书籍史, 57
 与阅读史, 79
文本社群, 110, 112
文本生产, 133, 168
 与权力, 129
文本世界, 63, 121, 143; 参见“读者世界”
文本受容史, 59
文化扩散, 112, 113
文化史, 3, 23, 27, 51, 52, 53, 55, 58, 63, 70, 71, 99, 109, 124, 125, 126, 150,
152, 157, 158, 164, 165, 166, 167, 168
文化诗学, 45 - 47
文化素养, 86, 88, 89
文化素养史, 92, 97
文盲, 86
文学复制, 123, 124
文学能力, 36, 40, 49, 80
文学批评理论, 9, 10, 25, 63, 115, 125, 127, 164

文学社会学, 26 - 27

文学文本, 30, 35, 36, 38, 40, 41, 42, 45 - 50, 61, 70, 81 - 82, 129

 与非文学文本, 42, 48 - 50

文艺复兴, 44, 129, 130

文字传统, 160

文字狱档, 113

伍尔福, 135

吴光清, 165

物质形态, 124, 154, 155

 表达功能, 78, 120

X

锡德尼, 103

 《西方阅读史》, 136

夏丕, 72 - 73, 129, 130, 132

夏蒂埃, 26, 60, 62, 63, 75, 79, 89, 90, 100, 113, 115, 116, 120, 122, 124, 126, 128, 133, 136, 148, 150, 154, 155, 158, 160, 164

 界定阅读, 121

 论读书图, 100

 论时俗文化, 160

 论书籍物质形态, 120 - 21

 论阅读革命, 151

 拈借理论, 122 - 23

 与阅读史研究, 62 - 64

 阅读史研究方法, 116

现代受容研究, 41

小布尔乔亚, 86

消费主义, 112; 参见“阅读类型: 消费主义阅读”

谢曼, 72 注 3, 103

协同生产, 76

新历史主义, 42, 49, 72, 115, 129, 132, 134

- 读和写的政治学, 72
- 文本理论, 42 - 43
- 与读者反应批评, 49
- 与历史主义, 43, 48
- 与阅读史, 48 - 49

心灵史, 23; 参见“精神生活史”

新批评, 27, 29, 60, 80 - 82

- 方法论谬误, 84

《新生》, 127

心学, 169

形式主义, 27, 31, 39, 43, 48, 49, 80, 82, 83, 125

叙事学, 120

- 受述者, 32, 33
- 叙事策略, 120
- 叙述者, 31, 32, 102, 120, 124

《殉道录》, 147

Y

亚当斯, 55, 114

雅文化, 158

艳情文学, 117

姚斯, 38, 39, 40, 41, 75, 126

叶德辉, 165

伊斯卡丕, 26

印本, 55, 141, 152, 160

- 权威性, 18

印本文化, 153

隐含作者, 32 - 33, 35

印刷出版史, 70

印刷工业化, 159

印刷技术, 44, 86, 153

 与文学审美, 128

 与知识传播, 18 - 19

印刷商, 82, 83

印刷史, 25

 《印刷书的诞生》, 13, 25

英国出版同业公会, 67, 92

语言能力, 36

语言学, 80, 122

阅读, 160

 定义, 58, 61 - 62

 多层次, 88 - 89

 历史存在, 60

 私密化, 137, 138, 139, 140

 社会属性, 109

 文化地位, 127

 与藏书, 89 - 90, 89 - 90

 与拈借, 123

 与启蒙, 168 - 69

 与社会变化, 146

 与社会协商, 111 - 12

 与社群, 111 - 12

 与身份, 110

 与书籍物质形态, 75 - 76, 78, 121

 与文本, 78

 与文学批评, 84

- 与消费, 64
- 与意识形态, 84
- 与印刷, 86
- 与隐私, 138, 139
- 与宗教, 161
- 与政治文化, 132
- 阅读变革, 137, 155; 参见“阅读革命”
- 阅读方式, 9, 78, 86, 89, 100, 112, 122, 135, 145, 146, 155, 160
 - 社会差异, 155
- 阅读革命, 141, 148 - 54
 - 标准, 154
 - 互联网时代, 148, 154
 - 与印刷术, 153
- 阅读公众, 17, 60, 86, 97, 149, 159, 168
- 阅读观念, 17, 92, 150, 167, 168
- 阅读规范, 17, 18, 19, 37, 60, 64, 71, 88, 91, 94 - 95, 122, 126; 参见“读书指南”, “读书法”
- 阅读过程, 11, 16, 17, 27, 30, 33, 34 - 39, 41, 58, 60, 62, 64, 75, 84, 89, 121, 127, 142, 150, 154
 - 产生文本意义, 35
 - 内在张力, 62
- 阅读技能, 16, 17, 23, 84, 92, 94, 115
- 阅读经验, 18, 22, 26, 28, 30, 59, 62, 64, 66, 71 - 73, 92 - 94, 97 - 98, 103, 107, 112
- 阅读类型, 137 - 46
 - 对应关系, 146
 - 泛读, 137, 138, 146, 148 - 51, 154, 155, 162
 - 分析式阅读, 144 - 45
 - 个体阅读, 146

公共阅读, 137, 146
公开阅读, 147
集体阅读, 137, 146, 147, 149, 155
精读, 137, 139, 146, 148 - 51, 154, 155, 162
朗读, 141 - 46, 148, 149, 153
冥想式阅读, 144 - 45
默读, 86, 122, 137, 139, 141 - 46, 148, 153, 155
私密阅读, 138, 142, 143, 146
实用主义阅读, 137, 139
消费主义阅读, 137, 161, 162
宗教阅读, 137, 147, 150, 161, 162
阅读模式, 41, 62, 67, 72, 122, 134, 136, 137, 139, 141, 146, 148, 150, 153, 154, 162, 168
 寺院模式, 153
 学院模式, 153
阅读能力, 60, 62, 67, 87 - 88, 153, 155, 159, 163
阅读期待, 18, 41, 71, 73, 75, 89, 121, 132, 154, 155, 160
阅读社群, 59, 96, 112, 136, 156
阅读史, 42, 70, 123, 135, 150, 168
 德国目录学传统, 67
 方法论, 64, 91
 基本问题, 58, 66, 68
 年鉴学派传统, 23, 67
 文本的物质形态, 61
 新阅读史, 66 - 67, 72
 学科地位, 162
 研究传统, 163 - 64
 研究对象, 19
 英国目录学传统, 25, 67

与读者, 34
与读者反应批评, 16, 27 - 28, 163
与教育史, 94 - 95
与目录学, 89 - 90
与人文素养史, 97
与社会史, 70 - 71
与书籍史, 26, 42, 61 - 64, 163
与思想史, 69 - 70, 169
与图书馆史, 97
与文本批评, 124
与文本受容史, 58 - 61
与文化人类学, 88
与文学批评, 27 - 28
与文学研究, 127 - 28
与新历史主义, 48 - 49
与新批评, 82
与政治史, 72 - 73
与知识史, 19
与宗教史, 161 - 62
中心任务, 63, 64

阅读实践, 59

阅读史史料, 64, 92 - 114

编读往来, 99

边批, 107, 105 - 08

财产清单, 97

读书会, 108 - 09, 111

读书图, 99 - 100, 101

读书指南 / 读书法, 94

读者来信, 93

法律案卷, 113
分类, 94
回忆录, 98
家访报告, 108
间接史料, 93
教育史史料, 94
口述史, 99
目录, 97 - 98
日记, 98
社会学调查, 108
书钞, 102 - 03
书迷来信, 99
图书馆借阅记录, 97
文学社, 108 - 09
小说, 102, 124 - 26
直接史料, 93

阅读史研究方法, 134

- 读者式方法, 122
- 方法论困境, 22 - 28
- 个案研究, 116
- 基于文本, 117 - 20, 122
- 基于物质形态, 120 - 21, 122
- 目录学谬误, 89, 90
- 拈借理论, 122 - 23
- 情感谬误, 81 - 82, 82, 83
- 三要素模型变异, 154 - 55
- 受容谬误, 83
- 文本分析, 134 - 35
- 文本选择, 134

文化素养谬误, 89
新历史主义, 129 - 32
形式主义, 116
意图谬误, 80, 81, 82
与书籍三要素, 117
作者谬误, 80 - 81
阅读习惯, 9, 17, 18, 28, 49, 60, 63, 65, 66, 67, 71, 90, 94, 99, 100, 108, 113, 122, 136, 139, 149, 159, 168
阅读行为, 17, 35, 70, 93, 108, 112, 122, 123, 125, 127, 128, 130, 134, 135, 138
 个体特征, 71
 社会属性, 17
 与抄本学, 23
 与古希腊文化, 23
 与精神生活史(心灵史), 23
 与历史学, 22 - 26
 与群际划分, 112 - 13
 与书籍三要素, 17
 与图书馆学, 23
 与文学研究, 26 - 28
 与政治行为, 130
阅读政治经济学, 133
阅读政治学, 73, 129
阅读自由, 24
约翰斯, 18, 19, 124, 168
约翰逊, 萨缪尔, 107, 130

Z
宗教史, 137, 161 - 62
宗教小说, 112

左雷, 151

作者

- 与读者, 80 - 83

作者意图, 82, 83

- 与文本物质形态, 82 - 83

《哲学家》, 119

政治文化, 49, 129, 132

知识传播, 18

知识社会学, 18

知识生产, 18

制作意图, 83

中国出版史, 165

中国书籍史, 165

- 独特性, 167
- 主要问题, 165 - 67

中国阅读史, 167 - 68

- 与中国思想史, 168 - 69

周启荣, 169

周绍明, 166

朱熹, 167

不仅书籍可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阅读行为本身也值得史学家专门探讨，这是欧洲学者最近几十年来的重要发现。这本清新畅达的小书，讲的就是这个新的史学贡献。对于欧美的历史和文化，戴联斌是一个旁观者，他知识丰富，眼光敏锐独到，向读者展示了西方阅读史研究的整体面貌，亲切而洒落。在这本书中，他不仅梳理了阅读史上的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检讨了阅读史的研究方法。最妙之处在于，他讲阅读史和阅读史研究法，同时给人带来阅读的乐趣。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 教授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 讲座教授

加拿大皇家学会 会士

亚洲研究协会 主席 (2015)

阅读史研究以一切与读者和阅读过程有关的事物及问题为对象，属于广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本书严谨而精到地论述欧美数十年来阅读史研究的理论预设和讨论的问题，研究资料和方法、成果，终章兼述近年欧美学者对中国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全书脉络分明，章节连贯，富有考据而言简意赅，图版和示意图、人名术语双语对照表，均能为认真的读者设想，必能促进中国的相关研究。

朱鸿林 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院长

香港孔子学院 院长

邝美云文化及艺术教授

中国文化讲座教授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中国古代史)

上架建议：历史·理论

ISBN 978-7-5133-2474-



9 787513 324748 >

定价：48.00 元



扫我。有惊喜



新星好书，尽收于此